

目 录

CONTENTS

往事漫忆	劳伦斯·嘉道理(1)
The Kadoorie Memoir.....	Lord Lawrence Kadoorie
附:嘉道理勋爵会见记.....	潘 光(13)
Appendix: With Lord Kadoorie	
in Hong Kong	Pan Guang
沪上救难亲历记	劳拉·马戈利斯(18)
Rescure Efforts in Shanghai.....	Laura Margolis
上海避难地	乔治·赖尼希(35)
Shanghai Haven.....	George Reinisch
一个俄国犹太人在上海	亚伯拉罕·弗拉德金(55)
A Russian Jew in Shanghai.....	Abraham Fradkin
与日本当局抗争记.....	朱迪丝·本-埃莉莎(65)
Resistance to Japanes Occupation	
.....	Judith Ben-Eliezer
亡命上海杂忆	伊斯雷尔·基彭(79)
Struggle for Survival in Shanghai.....	Israel Kipen
特别使命——帮助犹太难民进上海	
.....	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95)
Special Mission in 1941: Obtain	
Shanghai Permits.....	Zorach Warhaftig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	威廉·肖特曼(107)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in Shanghai.....	William Schurtman
上海谋生记	
——莉丝贝斯·洛温伯格采访录	
.....	史蒂夫·霍赫斯塔德(117)
Make A Livelihood in Shanghai	
Interview with Lisbeth Loewenberg	
.....	Steve Hochstadt
战时上海纪事(1945年).....	瑞娜·克拉斯诺(125)
Shanghai Diaries during Wartime (1945)	
.....	Rena Krasno
闯荡上海记实	弗兰克·塞莱格(145)
My Venture in Wartime Shanghai.....	Frank Theyleg
难忘的岁月	莉莉·芬克尔斯坦(159)
Memorable Years.....	Lilli Finkelstein

往事漫忆*

劳伦斯·嘉道理
(Lord Lawrence Kadoorie)①

亲爱的柳芭，

您 1979 年 1 月 7 日的来信，连同瑞娜·克拉斯诺夫人要求我谈一些我们家族与上海犹太人之间关系的信，我都已收到。

随着中国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纲领，香港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以致我很少有时间来回忆历史往事。不过，我相信下面的一些记述可能还是有价值的。

—

自 2000 多年前罗马人捣毁我们的圣殿开始，犹太人便流散到四方；有些人到北方去了；另一些人往西去了希腊的萨洛尼卡、摩洛哥和西班牙；还有一些人则向东方迁移，形成了一个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巴格达为中心的庞大的犹太人社区。

这个社区在那儿繁衍了开来。到近代，它的子孙们又跋山涉水去了印度、中国、欧洲和美洲。

巴格达犹太人中显赫的家族有：沙逊家族、嘉道理家族，索姆奇家族，索福家族和葛培家族等。有姻亲关系的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曾是经商的牧人。在那个时候，做生意用的货币是羊毛束，通常由牧民们经营，因此在业主们眼中，牧人们就像银行家。

* 本文是劳伦斯·嘉道理勋爵 1979 年 2 月 6 日从香港写给前秘书柳芭·阿尔金的信，编者加了题目并将全文分成若干章节。

我父亲埃利沙·西拉斯·嘉道理(艾利爵士),是家中7个孩子中的一个。1880年5月20日他经孟买到达香港,进入E.D.沙逊公司②的一家商行当书记员,一开始月工资只有37卢比。他的哥哥摩西比他先来,也在沙逊公司中任职;1883年,他的弟弟艾利斯(即后来的艾利斯爵士)也来港与他一起共事。

后来,我父亲被派往中国北方。在那儿,他时常要到开放的5个口岸——上海、威海卫、天津、芜湖和宁波呆一段时间。他给我们讲述的有关他早年生活的故事有许许多多,但只有其中一件他在宁波时发生的小事对我们家族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缺少一位经理,我父亲便留在宁波暂时掌管沙逊公司宁波办事处。这时城市里爆发了一场瘟疫,我父亲没有征得上级经理的同意便从仓库中提取了一桶消毒剂。为此,他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他感到这很不公正,提出了抗议,以至事态扩大到他被送回上海向公司本部解释此事。后者要他不必再作解释,只能服从。他又提出了抗议,结果被开除了,只得返回香港。哥哥摩西给了他500港元,并告诉他这是他能得到的一切。然而这一事件却为我们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一桶消毒剂带来了嘉道理家族的盾形纹章③。

此后我父亲做起了经纪人生意。他以天生的聪颖勤奋地工作着,很受人欢迎,在积聚财产方面运气不错。

1890年末,这位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凯利”的年青人访问了英国,在那里结识了F·摩卡塔先生,一位著名的塞法迪④犹太慈善家。在这位先生的家中,我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劳拉·摩卡塔。1897年,他们结了婚,婚后一周他带着妻子回到了香港。

摩卡塔家族祖籍西班牙,在西班牙设立宗教裁判所时离开那里到了荷兰,后来又去了英国。在英国,他们与哥德斯密茨家族合

作于 1684 年创建了摩卡塔—哥德斯密茨有限公司。自 1696 年后，这个公司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银币经纪人。

初到香港，我母亲觉得生活有点困难，因为与她已习惯了的伦敦氛围很不一样。但有一位葛培夫人对她很友善，她是位非常迷人而有特色的女士，为使我母亲熟悉变化莫测的东方生活做了很多工作。

1899 年我在香港出生，我弟弟霍瑞斯 1902 年生于伦敦。

此后的 10 年里，我父亲与他的合伙人乔治·波特先生和沙逊·本杰明先生成功地创办了本杰明、凯利与波特商行，成为香港第一家经纪行。

有一件有趣的轶事形象地说明了罗伯特·伯恩斯的这首诗句，“最优秀的人制定了胆小的计划，而计划却常常失败。”海军上将德威率领的美国舰队将要攻占马尼拉城^⑤，一切都处在近乎混乱的不景气状态之中。我父亲和他的合伙人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为了发财致富，现在正是一个“买进”的时机。因而他们在香港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式的联合商行，专门收购马尼拉几乎所有准备出售的产业——卷烟厂、自来水工程、电车公司、金矿、办公楼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等美军登陆后才能“大发”起来。不幸，“大发”并没有出现。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才小有亏本地逐渐卖掉他们所买下的产业。

1910 年，父母亲决定离开远东去英国定居。他们在伊斯特本镇租了一所房子，我和弟弟便在那儿上学。

1911 年，我父亲听说他公司的总经理用公司的资金在香港投机，公司却严重亏损。他再次回到远东，重整公司。

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后，父亲去了上海。在汇丰银行经理史蒂文斯先生的坚持下，他留在上海重新组建了大批橡

胶公司——这些公司因行业不景气都面临破产。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后，决定重开自己的业务，并把总部设在上海。

1914年，父母亲和本杰明夫妇同去加拿大的般夫，与从英国去那儿的孩子们共度暑假。

正当我弟弟、我和本杰明夫妇的两个女儿在家庭女教师们带领下坐船穿越大西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结果我们不能再返回英国上学。经过一连串冒险经历后，我们这帮人用完了所有现钱，但所有的人总算回到了上海，整个战争时期就在那儿度过。

没有一个城市，以后也不会有另一个城市像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这是一个混合着东西方特色、带有强烈反差的都市。这个既有善、又有恶的东方的巴黎，为冒险家提供了一个乐园。我弟弟和我在上海继续念书——上海所提供的国际环境开扩了我们的视野，并使我们懂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1919年，我们在上海的家遭遇了一场火灾，我母亲因返回屋中寻找家庭女教师而丧生，她是一位受到人爱戴的杰出妇女。从此以后，霍瑞斯和我担负起了以前由我母亲所担负的许多责任，为在整个亚洲确立嘉道理家族的影响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20年代初，我们在欧洲度过了3—4年的日子。父亲在伦敦买下一幢房子。阿拉伯半岛的费萨尔一世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是那里的常客。在这些年月中，我们在法国和英国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关系网。

至于我个人的学历，除了在父亲的办公室中受到训练外，就是师从著名的世界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专家 J. E. 萨尔蒙大律师学习法律。我成了英国林肯律师学院^⑥的学生。我在那儿吃过几顿午饭，然而却一直没有时间完成我的法律学业，但我还是取得了律师资格。

我弟弟霍瑞斯想当农场主，但家庭事务的压力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开始做大理石大厦(又名嘉道理大厦)的管理工作。由此积累的经验对他后来成为香港—上海旅店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有帮助(我们家族在该公司中享有股权一直可追溯至上一世纪，在半岛酒店中更是如此，该酒店现已闻名世界，为亚洲第一宾馆)。大理石大厦是我父亲不在上海时委托他人建造的。不幸的是，建筑师格拉汉·布朗酗酒成性，把住宅楼造成了一幢宫殿式的建筑。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回到上海时，看到的是一个烂醉如泥、正躺在医院中的建筑师，和一幢拥有一个高 65 英尺、长 80 英尺、宽 50 英尺的舞厅、一条长 225 英尺的长廊再加上其他大房间的建筑。我们大吃一惊，而真正的打击则是承包商寄来的帐单上所标明的巨额付款数。

我父亲喜欢款待朋友，大理石大厦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中出了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被改为市少年宫，从各个学校中挑选出来的小学生们在那里接受艺术培训。岁月流逝，得知我父亲特别喜欢的这幢建筑现被成千上万的儿童使用着，他们从那儿提供的课程中受益，这对我来说确是件高兴的事。

嘉道理家族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好运。叔叔艾利斯·嘉道理爵士在香港、广东和上海兴办了一批学校，目的是为中国学生提供学习英语的基地，以便他们能在外国公司中熟练工作。当时中国人与教会及其学校之间有鸿沟隔阂，所以特别欢迎这些非教会学校。

父亲特别重视在中东地区建造女子学校和医院，这样当地妇女就可以享受到除了家庭教育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教育。学校由巴黎犹太人联盟和伦敦盎格鲁—犹太人协会管理。父亲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学校应不计宗教信仰欢迎任何儿童入学。

这些学校带来的冲击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择偶时要求未来的丈夫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不再一味服从她们的父母。也许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已经发动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叔叔、父亲、霍瑞斯和我对香港、上海及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事务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做了一些工作。1937—1938年，霍瑞斯在救助最后一批逃离俄国、奥地利和德国的数千名犹太难民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创立了上海犹太青年会及所属学校。他鼓励青少年们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要懂得当时受到的良好训练是为了在新的环境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正是这些难民生涯中不易找到的学校为他们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他们的子女相当部分后来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美国成了有成就的公民。

除了商业来往和在金融界中的巨大影响外，父亲在上海还捐赠了一所肺结核病防治所、中山医院皮肤病防治所及其他医疗设施。

父亲因在世界各地兴办许多慈善事业，于1926年荣获大英帝国二级爵士称号。

我在30年代回到香港，重开了我们的办事处；不久，你，柳芭（我记得当时你16岁）便成了我的秘书。你对那个时期一定记忆犹新。我弟弟留在上海的公司总部，与父亲在一起。

1938年，我与老葛培夫人的孙女穆丽尔·葛培结婚。前面我已经说过，我母亲到香港后，她们便成了好朋友。

二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于日军之手。冬天一到便来港的父亲、我夫人、我以及我们18个月的女儿和6个月的儿子均被关进了斯坦利集中营，随身只携带了一些能带的东西。

战争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也有它光辉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父亲得了病，常常坐在一棵大树下与其他难友交谈。他从未丧失信心，更重要的是，正如下面一段轶事所显示的，他从未丧失幽默感。

集中营里的食物很少，每天的热量约 900 卡路里。这自然会影响集体生活的条件并造成反应。一天，我正在领取我的那份定量——一香烟罐头米、煮莴苣和一小碗汤，一个高大壮实的人穿过屋子大喊：“你，该死的嘉道理，你父亲不能带着这帮人溜走。我是香港警察，我想留在这儿。”我不知道他是何人，便问他想要干什么，他答道：“你父亲说他把集中营里这些人统统带到上海去，但我不想去。”我未置可否，后来把此事告诉了父亲，说这是件很可笑的事。父亲听后说：“劳伦斯，日本人已占领并控制了整个香港和新加坡，但仍有人相信我能够在—场战争中把 3500 人从香港带到上海，这说明我的信誉仍是很好的。”

5 个月后，由于只有关押我们的人才知道的理由，我被确认为加拿大记者，我们一家被允许与外交官一起搭乘“台南·马鲁号”船去上海。那是一艘 2000 吨的船，载着 2000 名乘客。用海水洗婴儿尿布不但对我这个洗衣人是件苦差事，而且对幼小的米歇尔也是件痛苦的事，他大声哭喊着抗议给他穿上这种带有腐蚀性的衣物。

海上旅程共 9 天。到上海后，弟弟与我们见了面，他住在亲戚家中，他把我们带到以前的住所——大理石大厦，大厦已被日本人接管。

我们作为英国公民，佩带着有“B”字母的红色袖章。由于是敌国公民，日本人只允许我们去一些指定的商店购买食品。我们的所有物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均被没收。尽管如此，当我们在

中国人社区和俄国社区遇到老朋友时，他们的忠诚、友善给了我们希望和信心——深信情况会好转，这实在是一种温暖人心的体验。

1943年，我和妻子及孩子们被关进闸北集中营。父亲有病，和一些病残者呆在集中营外面，由我弟弟照料。

在集中营的两年中，我们与原籍黎巴嫩的一家美国人（由父亲、已成年的一对儿女及他们的姑姑组成）同住在一间长18英尺宽15英尺的房间中。这位先生原是位“帕夏”（贵族），被关进集中营前曾拥有一片上海最好的亚麻布店。他妹妹能把许许多多橄榄油肥皂带进集中营真是件幸运的事，她慷慨地让我们分享这些当时可称无价之宝的肥皂。

这是一种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经历，它对我们以后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有如一剂苦口的良药。从我个人后来的经历看，它使我更为明察事理，更理解真正的价值观，为人更加宽容。

近1944年末，日本宪兵队允许我们离开集中营去看望病危的父亲，我们被软禁在老家大理石大厦的职工宿舍区内，该建筑已被日本傀儡汪精卫占用，日本人让他建立和领导一个伪政府。

一天傍晚，正值上海全城灯火管制，传来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原来是上海法国领事馆前首席法官考夫曼来访。他是法国公民，未被关进集中营^⑦。考夫曼非常紧张，他说维希政府在上海的支持者正在搜捕他，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一面说话，一面把一个有7公斤重的用报纸包着的包裹交给我们。在我们的追问下，他说：“这是一根金条，你们是我认识的唯一能够相信的人。”他又说了一句：“把它藏起来！”随后便走了。作为一贫如洗并被软禁起来的战俘，我们的感情十分复杂。尽管如此，约在半夜时分，我弟弟和我偷偷溜出屋子，跑到花园中，找了一棵树，把那条金子埋到树下。9个多月

后，战争结束了，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那条金子，并把它还给了它真正的主人。

一天深夜，一位好友溜进我们的住地，他从一家地下电台听到原子弹爆炸和日本人投降的消息，赶来告诉我们。

1945年8月25日，第一批美军在上海登陆，他们是由肖耶少校（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率领的一支20人小队。战争尚未正式结束，他们通过瑞士领事馆设法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要求住在我们家中。我们极为高兴地迎接了这些客人。5年来，我们第一次打开了大理石大厦中的电灯，用“K”字^⑧特制食品（一种我们还从未吃过的食品）来举行庆祝。不久，我们家便成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军人活动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嘉道理家族实际上失去了所有散布在敌国占领国家中的财产。

从战争结束直至共产党人占领上海这一段时间，霍瑞斯全力应付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我则去香港再谋发展。

驻华美军指挥官海斯将军当时住在我们大理石大厦的家中，后来刚从重庆飞抵上海的英国总领事沃登先生也搬来同住。我急于回香港，便问他们是否可以使用沃登先生即将飞回重庆的飞机，再从那儿乘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去香港。他们同意，并为我写了请给予最优惠照顾和享受贵宾待遇的介绍信。我到重庆后被安置在英国领事馆中，很快与皇家空军取得了联系，但后者断然拒绝将我作为一名乘客带走，这样便把我撂在了重庆。

一天，他们安排我乘吉普车去观光市容。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吉普车的座垫上有颗露出的钉子，把我裤子撕破了一个大口子。我郁郁不乐地站在英国领事馆的台阶上，看上去一定很狼狈。正好一辆吉普车路过，上面满载美国兵。他们很同情我，问我遇到

什么麻烦了，我回答说：“如果你们只有一条裤子的话，那你们就会明白了！”

美国兵们要我跟他们一起走。40 分钟后，我那唯一的便服换成了一套道地的美军制服。当问起谁应当向谁敬礼时，我自信地说道：“在这里，谁也不向谁敬礼！”这套军服对我极其合身。离开上海前，人们要我与当局中说话算数的人取得联系，以便下达命令，通过瑞士银行解冻并汇出我们存款中的一笔钱以救济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他们中 7000 人左右是天主教徒，10000 人左右是犹太人。

日本投降后，这笔钱被冻结，因而也就带来了一些困难。我向前来帮助我的美国兵们叙述了上述事宜。他们认为这是随军牧师的事，便找了 5 位随军牧师来见我。通过这次会见，我被带去拜见驻重庆美军司令奥兰德将军。他听了我的叙述，深表同情，下达了一些命令，还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广州。我表示感谢，但觉得最好还是先去见见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他们仍然很强硬，坚持不带旅客，我提出我也许可被当作“货物”运输，他们同意了。他们让我坐在一大堆钞票上，这些钞票要空运香港，替换日本军用币。

1945 年 11 月 11 日，我穿着美军军服，作为“货物”到了香港。我以前任沪港旅店业公司董事长的影响使我在半岛饭店得到了一间房间。3 个月后，妇女被允许返回香港，穆丽尔能够和我在一起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弟弟也来香港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几乎是从头干起，经历了一段相当紧张的时期。我们两人在重建家族的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勤奋的工作和好运气帮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原有的地位。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帮助一些运气不及我们的朋友，使他们逐渐

过上较好的日子。

三

去年,我妻子和我再次访问了阔别 30 年的中国。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可以欣慰地说,中国政府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是心怀感激之情的,我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麻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怨恨,而只是使我们认识到,为使世界更美好,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做。

以上一系列对往事的追忆实际上并没有回答克拉斯诺夫人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家族生活于世界这一地区的百年中,“嘉道理”这一姓氏已成为香港和上海犹太人社团的同义词,其影响有助于创造外国人社区及与之有联系的中国人的历史。现在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可写,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鼓舞的时代,并继续发挥着我们的作用,这就使重述那个无疑具有魅力的故事变得困难了。

您忠实的

劳伦斯·嘉道理

注:

① 劳伦斯·嘉道理(1899—1993),习称嘉道理勋爵。1899年6月2日生于香港,曾在上海和英国就读,获法学博士学位。1945年以来一直是嘉道理集团的最高负责人,任该集团系统众多公司的董事长。1985年访华时受到邓小平接见。他晚年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投资大亚湾核电站,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② E.D. 沙逊公司(亦称沙逊洋行),由伊利亚斯·沙逊创办于1872年,一般被称为新沙逊洋行,以示与创办于1832年的老沙逊洋行有所区别。该洋行在上海的业务发展迅速,曾在房地产、纺织、建筑、交通、食品、金融等行业拥有雄厚实力。

③ 英国的贵族每家都有一枚代表其家族的纹章,一般为盾形。

④ 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原指从西班牙被驱赶出来的犹太人,后

泛指从地中海沿岸,特别是西亚北非移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⑤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为争夺古巴、菲律宾等地爆发战争,5月,美国舰队攻占马尼拉。

⑥ 英国伦敦培养律师的四大学院之一。

⑦ 当时法国名义上由纳粹德国扶持的维希政府管理,与德、意、日为同盟国,因而法国人不被日本视为敌对国侨民。

⑧ 嘉道理姓氏——Kadoorie 的第一个字母为“K”。

张家哲节译自《香港犹太历史学会专论集》第1卷 (Monograph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Volume I, Hong Kong Jewish Chronicle, 1985)

附： 嘉道理勋爵会见记

潘 光

转眼间，嘉道理勋爵去世已两年了。两年来，人们写了许多关于他的文字。每每看到关于他的记述和评论，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6年前与他的难忘会见，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样历历在目。

1989年4月19日中午，我登上香港圣乔治大厦24层，走进一间大会客厅。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与我握手，对我表示热烈欢迎。他，就是90高龄的劳伦斯·嘉道理勋爵(Lord Lawrence Kadoorie)，著名的嘉道理家族的最年长者，财力雄厚的嘉道理集团的象征。

提起嘉道理(准确的译音应为“卡杜里”)，老上海恐怕没有谁不知道的。上个世纪末叶，英国籍犹太人埃利·嘉道理先生来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经商办实业。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他在建筑、公用、地产、金融等业获得长足进展。1926年，英王授予埃利·嘉道理爵士封号。到30年代，以埃利·嘉道理爵士父子公司为核心的嘉道理集团已成为上海滩上一大犹太商财团，与沙逊、哈同、海亦姆、埃兹拉、安诺德等大财团齐名。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嘉道理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因为我们儿时常去的上海市少年宫便是当年嘉道理的宅邸。当我开始研究犹太史，特别是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的关系史之后，我对嘉道理家族的了解就更多了。我个人以为，这个家族在上海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从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中叶上海犹太商界历史的缩影。

现在,大名鼎鼎的埃利·嘉道理爵士的长子就坐在我的对面。从外表看,他并不像一个90岁的老人。他起立和坐下时无须别人搀扶,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响亮,听力也不差。我一边向他问候,一边回想着我所知道的他的简历。据国内最新版本的《当代国际人物词典》介绍,他1899年6月2日出生于香港,少年时代曾在上海就读,后在英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和专业律师资格。1944年埃利·嘉道理爵士去世后,他和弟弟霍瑞斯·嘉道理共同掌管嘉道理财团的业务。现在,他是埃利·嘉道理爵士继承人公司、圣乔治建筑公司、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施罗德和渣打公司、香港地毯制造商公司、南洋棉纺厂公司等许多公司的董事长和香港大学董事会董事,还兼任许多协会、委员会的主席、总裁等职。

我是以研究犹太学的学者身份拜访他的,我们的交谈很自然地首先从犹太学研究开始。我告诉他,由于一些“敏感”因素,中国大陆的犹太学研究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1988年8月在杭州召开全国首届犹太文化历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地的犹太学研究者才第一次有机会在一起进行交流。正是那次学术讨论会后,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哈尔滨、西安、开封等地的犹太学研究发展迅速,并且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香港等地的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嘉道理勋爵听了这些非常高兴,关切地询问中国的犹太学研究有些什么成果。趁此机会,我将国内学者发表的一些犹太学研究著作送给勋爵,并转达了学者们对他的问候,他连声说:“谢谢!”

谈到下一段的研究计划,勋爵说:“上海曾有过一个数万人的犹太社团,犹太人对上海有一种亲切感,他们不会忘记上海,你们应该研究上海的犹太人。”我说:“你提得很对,上海的犹太人正是我们的一个研究重点。”我告诉他,我这次去美国访问研究的一个

课题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上海犹太难民，我在纽约、旧金山等地会见了许多当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难民，他们都对上海充满感情，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援助表示感谢，也清楚地记得嘉道理家为救助他们所作的有益贡献。听了这些，勋爵似乎又回忆起了那艰苦的战争岁月。他深沉地说：“当时，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救助这些难民，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勋爵的话使我想起了许多当年的犹太难民向我介绍的情况。1938年10月，正当大批来自希特勒德国的犹太难民开始进入上海之时，勋爵的弟弟霍瑞斯·嘉道理先生出面召集会议商讨救助事宜，上海的所有犹太团体和社会救济组织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决定建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以采取联合行动帮助难民。同时，嘉道理家捐出许多钱物救助犹太难民，还出资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专门招收欧洲犹太难民的子女。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嘉道理勋爵及其父亲、弟弟、妻子、子女均被日军囚禁，先是在香港，后又被送到上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勋爵的父亲正是在被囚禁的困苦折磨中去世的。勋爵一家在艰苦的年代与犹太难民及中国人民共患难，对此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话题转到了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政策上。勋爵兴奋地谈起近年来访问中国的印象及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的情况。他特别提到了1985年访华时受到邓小平接见，两人共商建立大亚湾核电站计划的难忘情景，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只要中国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信心的。”接着，他又向我问起上海的市政建设情况。我尽可能向他作了些介绍，并对他说：“上海是你的故乡城(homecity)，欢迎你多去上海看看。”他笑着回答说：“当然，我们这些老上海都愿意回去看看，”接着又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如果上海把门开得更大些，我们这些当年的上海

居民也许还会再去上海定居的。”这使我想起了勋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下的一句对中国充满感情的话：“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始终心怀感激之情。”

这时，谈话接触到了一个敏感的内容。勋爵问我：“从电视中看，北京的学生正在举行游行，不知事态会如何发展？”言语中流露出忧虑之意。众所周知，勋爵对在中国大陆投资一直持积极态度，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巨额投资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他对中国国内出现动乱的迹象表示担心是很自然的。说实在的，我对当时已持续几天的北京学生游行情况并不了解多少，但是我还是颇为自信地对勋爵说：“不管事态如何发展，中国政府是会控制局势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勋爵听了点点头，并没有再谈下去。

我知道，90 高龄的勋爵现在一般是不客客的，此次破例已是不易，因此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会见前我曾答应勋爵的秘书将会见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内，眼看时间快到了，我便转谈轻松的话题，以便为结束作准备。我说：“勋爵您的身体仍然是那么健康，几乎很难看出是 90 岁的人。”他听了笑了，对我说：“前几年我还自己驾驶汽车呢，现在视力不行了，不敢开车了。”我问：“您写东西有困难吗？”他答道：“当然有困难，手颤抖得厉害，只能请秘书代劳了。”我祝他健康长寿，与我们一起迎接 21 世纪的来临。他听后诙谐地说：“那我就是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伟人了！”

该是会见结束的时候了，我站起来对他的接见表示衷心感谢。他却好像仍谈兴未尽，又递给我一篇材料说：“这对你们的研究可能有用。”我接过来一看，是但戈先生(M·E·Dangoor)写的《上海的犹太人》一文的复印件。我答道：“当然，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用，谢谢您！”他高兴地说：“我将尽力支持你们的工作，包括你们与外国学者之间的合作，祝你们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果。”这时，我

突然想到应该与勋爵合影留念，便冒昧地问道：“我可以与您一起照个相吗？”“当然可以。”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站在勋爵父亲埃利·嘉道理爵士的像前合影，当他的秘书拍了第一张之后，勋爵大声地说：“再来一张。”在闪光灯频频发亮之时，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与一位90高龄的名人合影。

1993年8月，我应邀赴港开会。行前，我给勋爵发了传真，告诉在港日程，希望能约个时间去看他。没想到他立即回了传真，表示欢迎。到港后，我即给勋爵的秘书打电话，约好8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点与勋爵见面，勋爵还接过电话对我说：“星期三上午见。”谁料，这竟成了勋爵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8月24晚，我正参加香港犹太俱乐部的一个宴会，突接勋爵秘书来电话，说勋爵身体“有些不适”，第二天的见面改到8月26日（星期四）上午。然而，8月25日晚香港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报道了勋爵当天下午在医院去世的消息。就这样，94岁高龄的勋爵安详地离去了。我至今仍深感遗憾的不仅是我失去了再见他的最后机会，也是因为他没有再次“重返故里”。

勋爵去世两年来，中国和上海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勋爵生前最为关怀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于1994年2月6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李鹏总理在庆典上特别赞扬了“港方开拓者”嘉道理勋爵的功绩。我想，热情支持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勋爵如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笑逐颜开的。

沪上救难亲历记

劳拉·马戈利斯^①

(Laura Margolis)

以下是从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变至 1943 年 2 月 25 日这段时期上海的事态发展和见闻,此后我就身陷囹圄,我的同事曼奴埃尔·西格尔也先于我几日遭囚禁。这是我俩的共同经历,大部分凭记忆所及,难免有不精确之处,有待于西格尔的更正修改。

一

我们原与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②商定 12 月 8 日到虹口去改组行政机构,上海的战事与珍珠港事变一起爆发,这个大都会随即被占领,打破了我们预定的计划。在头一周里,属于敌国侨民的人都奉命留在家中,等待向宪兵登记。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和我们一样属敌国侨民,主席是荷兰人,其余大都是英国人,能自由活动 and 行使职责的只有前船长赫尔茨伯格(专职执行委员),他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无国籍侨民,父母是德国人。12 月份的拨款尚未从美国方面到来,赫尔茨伯格立即把 8000 名受救济难民的伙食从每天两餐改为一餐,面包从 12 盎司减至 6 盎司。以每天餐费花 5000 元中央储备券^③计算,他估计至少可维持到 12 月底。同时他通知 500 名雇员,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可能不得不在 1 月份关闭,不会再发给他们工资。这在难民、雇员中引起了对饥饿和生活无着

落的恐慌。

12月15日，我们被告知日本人“目前”暂不将敌国侨民禁闭，只要乖乖地遵守军事当局颁布的规章，就有在市内活动的自由。我们去见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主席斯皮尔曼和副主席海伊姆，建议他们通知日本当局，该组织至月底不再能得到资金，让日本人知道难民的困厄。斯皮尔曼、海伊姆等3人去向负责犹太人事务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犬冢大佐陈述情况，但犬冢根本不愿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在珍珠港事变前从不把他和控制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放在眼里，犬冢大佐几乎是把他们赶出了办公室。

二

当时我们收到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电报，授权我们筹措相当于6个月拨款的借款，约18万美元。此前我们已向美国红十字会请求给予可能的帮助，它允诺，只要日本人放行，就提供5000袋面粉给我们。我们觉得最好与日本人联系一下。在提出面谈的要求后，我们受到犬冢大佐有礼貌的接待。我们用日本人爱听的口气陈述了如不能筹到款将发生的实际情况，并告诉他委员会的应急资金都冻结在银行里。犬冢要我们信赖他，答应调查冻结资金的事，说只要从中立国取得贷款就行，并同意放行红十字会的面粉，但附加条件是要我们负责解散援欧来沪犹难委员会。他对该组织极其反感，还提出要把赫尔茨伯格解职。犬冢对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这是维克托·沙逊爵士出资建立的组织）^④也很反感。他同意继续让斯皮尔曼留任，他觉得这人不像其他人那样瞧不起他。

12月余下的日子里我们始终与犬冢保持着联系，他的办事处就在华懋饭店里。我们也住那里，直至1942年1月15日。12月

末，大家解冻了3万元储备券给我们，这笔钱够我们在1月份用6天。

三

与此同时，虹口难民的恐慌与日俱增。我们即到那里召集雇员开了一次会，如实说明情况，并在12月30日发放了当月的薪金，才暂时平息了风潮。

一位雇员提议我们与一个名叫野上夫人的日本女子接触，她在宪兵队中替宪兵首脑当翻译，很有势力。这个女人以同情犹太人闻名，是德国犹太人布拉恩先生的朋友。我们回答说迄今一直与日海军打交道，不便找其他部门（日本陆、海军、宪兵、领事馆之间存在激烈的争权夺利，利用一方招惹另一方极端危险）。

1月5日，斯皮尔曼先生在其办公室里召集30位著名的犹太富豪开会，他们属于不同国籍，包括敌国侨民。我们也邀请了阿兹肯纳齐^⑤社团和代表难民的中欧犹太协会^⑥的代表到会。斯皮尔曼先生和我们恳求这些人帮助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筹集资金。唯一肯定的答复来自两位阿兹肯纳齐社团的代表，他们说在这方面必须做并且肯定能做一些事。一个捷克人E.坎先生以前在委员会中十分活跃，现在以“健康”为由提出了辞职。亚伯拉罕先生（英国籍）代表塞法迪犹太人社团和最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说：“既然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们也会为难民问题担心。”最后决定由一个5人小组探索筹措借款的可能性。

两天后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约我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有事相商。我们在那里见到一个名叫齐默曼的西伯利亚犹太人，他得知贷款的事，提出如能让10名左右上海最富有的犹太人背书担保，他愿意贷给我们一笔350万元中国货币的钱款。我们都为出

现这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感到惊愕振奋，立即向斯皮尔曼先生转达。他开始找人作保，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因此未能得到贷款。

四

1月初，一批日后在救助难民计划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难民把我们找去会面，设法在一个“紧急行动”中就地筹措资金。为首的是普尔弗马赫先生、西尔伯斯坦先生和格拉泽先生，这些人在较富有的难民中组织了这次行动，在一周内筹募到3万储备券，这样我们又度过了6天。

同时，与日本人、各委员会和个人的谈判都在进行。我们派秘书格卢克曼先生常驻虹口，但关闭了斯皮尔曼先生在公共租界的办事处，解除了赫尔茨伯格船长的职务。

1月10日，尽管我们费了很大力气，以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商借救济款，贷款仍遥遥无期。我们意识到，如我们不能筹到一定数额的钱款以维持数月，这个救济组织就不得不关门大吉，将整个难民事务移交给日本人。而日本人则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能再对犹太人问题作出比其他事情更多的努力了，因为上海到处是饥饿穷困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我们当即召集中欧犹太协会开会，告知现有的资金只够供8000人吃4天，或4000人吃8天了，唯一的办法是集中救济最困难的人以争取时间。在征得他们同意采取措施后，只剩下2500名贫病交加的人（我们去除了所有的单身汉）和老人孩子，都是最急需救济的人，仍住在我们的营地。我们仍使两家医院和一个妇产医院勉强维持下去。

当我们明白从塞法迪犹太社团和形形色色的富人行列里再也得不到帮助时，就去向阿兹肯纳齐社团的头面人物比特克先生和

拉宾诺维茨先生求助。两人答应想想办法。布拉恩先生也邀我们到他家去讨论此事，他说最怕的是虹口局势失去控制，日本宪兵借口平息骚动前来接管，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同意他把事情告诉野上夫人，如果她叫宪兵队的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不反对。不久宪兵队把我们召去，听我们讲了难民的情况和筹款的打算。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日军刚占领上海时避免发生混乱，急切要在虹口保持局势平静，希望本地犹太人能帮助募款。

五

1月15日，我们实际上已囊空如洗了。虽然日本海军答应解冻银行储蓄，放行面粉，但不可能关心难民问题；宪兵队竭力要强行执法；当地犹太社团还在研究和辩论如何筹集贷款。我们明白必须让人们从冷漠状态中惊醒过来。16日下午，《上海时报》记者采访我们。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避免向报界披露救济犹太难民的内情，因为日本人不赞成对此进行宣传。现在只有冒险一试了，将虹口难民快要饿死的情况公诸报端。1月18日，报上出现了大幅新闻标题。宪兵队对报道上海阴暗面大为震怒，海军方面的犬冢大佐也把我们叫了去，十分冒火，日本驻沪领事馆也要我们解释。从布拉恩先生处得知宪兵队下了逮捕令，后来还是靠了野上夫人出面才撤销了命令。

电台也转播了有关难民情况的报道，并呼吁犹太社团及社会各界捐款。我们预期的反应产生了，钱款开始涓涓滴滴地流入。然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此之前的1月16日。上海大通银行董事舒马赫认识一个名叫考夫曼的主顾，是长期住沪的德国犹太人，最近赚了一大笔钱，舒马赫劝他把钱借给我们，这样可以避免被作为“移民的储蓄存款”冻结的命运。这个建议很合考夫曼的心意。在他来

接洽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写了一张字条，说明这些钱不是移民的储蓄。我们知道这张字条会送到纽约去兑现，成为18万美元的贷款中的一部分。当天我们从考夫曼先生那里得到相当于1万美元的钱。

阿兹肯纳齐社团也任命了一个财金委员会，为我们筹措借款。在他们帮助下，我们认识了一个持挪威护照的俄国犹太人J·施里罗。此人是一个巨富，急于在财产被日本人没收前把它转移到美国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他打交道更容易些，他是个极难对付的精明的生意人。由于我们急需资金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不得不在利率上作很多让步。除他之外上海没有第二个人会拿出这些钱来借给我们。在我们筹借到的第一笔18万美元的贷款中，从他就借到了13.8万美元。另有几笔贷款数额仅15—20美元。

阿兹肯纳齐社团的比特克先生(波兰籍)，是少数对局势的严重性认识得十分清楚的人，他力主犹太人必须自觉地负起责任。他在所有的谈判中担任我们的财政顾问；对日本人把某一货币贬值的消息很灵通，使我们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1942年6月，日本人把重庆方面发行的法币全部收回去，限期以2:1的比率兑换中央储备券。我们事先得到比特克先生的通知，早已用所有的法币买了食物储藏起来，因此未受损失。1942年4月末，我们的18万美元贷款已有了保证，我们制订计划使这笔钱足够维持8个月，而不是半年。5月21日接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从南美洲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通知我们停止一切联系，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前我们虽然已不能从纽约总部直接得到钱，但总希望与总部保持联系，可能找到最终解决办法，现在这已不再可能了。

六

同时，我们也在改组援欧在沪难民委员会。我们早就注意到

这个臃肿的管理机构多达 500 名雇员，长期以来效率不高。它的中式大厨房耗煤量奇大，但效率特别差。现决定除了主席斯皮尔曼先生外，所有的机构全部解散。我们召集所有 3 个难民营的代表和在营外接受救济者的代表开会，要他们自己承担起管理事务。波兰籍的犹太工程师列文斯皮尔早就主张改造厨房，他计算出难民每餐 5 角钱内 4 角是煤钱。我们采纳他的建议，花 10 万法币把它改成一个简单有效的现代化蒸气式厨房，可供 1 万人用餐。最需要的设备是蒸气锅炉，但这一设备在中国买不到。列文斯皮尔想起华懋房地产公司有弃置不用的锅炉，我们就到那里向他们商借使用，但遭到英国雇员的回绝。我们知道这锅炉迟早要被日本人没收，取来使用是合乎情理的，于是通过野上夫人从宪兵队取得许可证，把这些锅炉搬来了。监督华懋公司的日本人很乐意地把这些锅炉给了我们。我们立了一张借据，说明只是暂时借用，随即花 10 万法币为新厨房配置物品。

我们觉得有责任把事务性工作向援欧在沪犹太委员会，或者不如说向残缺不全的委员会（一些人辞职了，海伊姆先生被捕了）汇报。我们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只有斯皮尔曼、亚伯拉罕和霍瑞斯·嘉道理^⑦ 3 位。西格尔在汇报中直率地指责委员会组织极差，贪污盛行，对待难民像对待苦力。我们告诉他们必须解散这个委员会，另行组成一个新的、更有代表性的社团委员会。嘉道理先生和亚伯拉罕先生当即提出辞职，不愿在新委员会里任职，而斯皮尔曼先生很乐意地接受批评，同意帮助我们。

新委员会要能代表在沪的犹太教的所有派别。为此我们与代表巴格达和中东犹太人的塞法迪社团、主要是白俄的阿兹肯纳齐社团和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中欧犹太协会的领袖们接触。3 月初，新的援欧在沪犹太委员会在斯皮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开会，近 25

名委员出席。斯皮尔曼先生作了开场白后，我们就在委员会下面建立了管理住房、伙食、财金、募款、预算、采购等机构，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上海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是临时性的，一旦当地社团的首领来接管，我们就立即退出。委员会所作的第一个决定是批准建立新厨房。

七

1942年4月，重建复兴委员会开始与各营地里的难民一起把场地改造成菜园。兆丰路营地周围几英亩的土地变成了一片茂盛的菜园。在一个吃不饱的年代里，这些人显示的精神是惊人的。我们也请职业培训组织^⑧到难民营开课，但这个组织坚持要年轻人到他们办的学校里去上课。

1942年4—6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营地房舍严重破旧需要修缮，因资金缺少未能如愿。难民们住处充满污秽和虱子。春夏伤寒流行，医院人满为患。每天有几百人申请进难民营，有些在外的难民比营内的难民更需要帮助。我们必须对困难情况重新调查，但手头资料数字都是过时和不准确的。幸而我们找到负责住房问题的委员、中欧犹太协会的卢茨·瓦赫纳先生，他在我们的指导下学得很快，最后把接纳入营者及有关调查的事务管了起来。我们解雇了原来管帐的人员，雇用了难民中一个称职的会计师埃德尔，以杜绝帐目上的纰漏。列文斯皮尔负责指导园艺计划。布拉恩利用他与日本宪兵的关系帮我们随时取得搬运东西的许可证。从公共租界过桥运送几乎任何物资到虹口都要有许可证，包括每天必需的面包。我们得到了在沪公谊会（贵格教派）的全面协作，他们在熙华德路容纳1000人的最大的难民营内工作，教导难民们自己进行民主管理，开办英语课和组织讨论会等。在

一个前所未有的忍饥受饿的年代里，难民社团中有如此之多的活动和生活情趣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这一实践使人确信：要是钱款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要是经管资金的人对难民更关怀些，这个小群体在得到温饱后能干下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八

在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总部来电嘱咐我们停止一切联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白上海的犹太人只能依靠自己了。在沪的犹太富豪现在成了敌国侨民，不能指望总部了。小额的个人捐款已成为必要，每个人都应为之捐赠。瓦赫纳想出了一个称之为“监护职责”的主意。估计每月 50 元（中国货币）就够一个难民糊口，犹太社团中每一承担“监护职责”的人每月捐献 50 元以救助一个难民。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的佩雷茨先生很起劲地推行这一做法。

这里我要提一下佩雷茨。1942 年 2 月，犬冢大佐勒令关闭了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把该委员会的资金交给佩雷茨先生。此人是个声名狼藉的德国难民，从 1937 年起就与日本人勾结，出售难民许可证给那些想让亲戚移民来上海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海对外门户敞开，根本不需要许可证。他是犬冢大佐的办事人员，犬冢总是邀他出席委员会会议，我们也不好不让他与会。不过佩雷茨在代表难民而作出的努力方面也起了相当有建设性的作用。他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资金用于分发牛奶、煤，补充救济和资助幼儿园。

九

到了 6 月，经费困难又趋严重。美犹联合救济会的贷款最多只能维持到 9 月末。两家医院每月要耗费 5 万中央储备券，内部

问题重重。我们觉得，与当务之急相比，维持这两家医院是不必要的和耗资过于巨大了，我们与上海总医院联系，与医院院长、意大利人维奥商定，在该院同意接收我们的病人后就把两家医院的开支从预算中砍掉。截止7月1日，所有未出院的病人都转移到了上海总医院。

同时我们又向瑞典、土耳其、葡萄牙和瑞士等中立国发电报，要求汇款。1943年，分别收到斯德哥尔摩救济欧洲犹太人组织、里斯本犹太社团委员会汇来的总数相当于977716元中央储备券的瑞士法郎，稍微缓解了面临的急难。

我们觉得阿兹肯纳齐社团没有理由把他们的救济仅限于帮助波兰难民，就要求他们参加资助德国难民的“监护职责”计划，但社团主席托帕斯先生拒绝考虑。这在该社团中引起了争议，一度严重到分裂的地步，甚至闹到一家中兄弟反目互不理睬。与托帕斯先生意见相左的一批人自己组织了中欧难民委员会，负责募款救济500名德国儿童。我们觉得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表明了俄国犹太人社团对他们的德国兄弟承担了部分责任。

十

7月，我们正式提出辞职，把事务交给瓦赫纳先生等人，他们已能自己处理行政工作了。我们允诺只要能自由活动就一定给予帮助。这时日本占领当局反西方情绪明显高涨，从东京新来的宪兵军官每天光顾虹口地区。犬冢大佐已离开上海，取代他的实吉大佐对犹太人问题不像他那样感兴趣。某天，佩雷茨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对犹太难民策划一场灾难性的事件，将把难民装在船上驶到海上去沉掉，要我们想对策。我们从其他可靠来源也听到了同样消息。

接着好一阵子未听到佩雷茨的音讯，直至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斯皮尔曼、海伊姆（曾被捕获释）、比特克与佩雷茨及其日本朋友都被宪兵抓了起来。听说佩雷茨和他的日本伙伴在斯皮尔曼那里召集被捕的那些人集会，告诉他们日本人要除掉犹太难民的计划^⑨。他的目的何在至今仍不清楚，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日本陆海军与宪兵确实开会讨论了关于遣返犹太难民的计划。布拉恩莽撞地向宪兵首脑询问此事，结果把他们私下开会的事泄露了出来。宪兵首脑对尚未确定的计划过早曝光勃然大怒，下令把这些人抓了起来。

斯皮尔曼等人未几就获释了，他辞去了委员会中的职务，以免与难民问题沾上边。这时我们感到有必要组织一个当地的委员会来处理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事务。由于布拉恩与日本人的关系，让他出任主席最适宜，瓦赫纳等几个我们信得过的诚实可靠的人都进入了委员会。此前不久，普尔弗马赫先生、西尔伯斯坦博士集中了一些境况稍好的犹太难民组成一个叫做厨房基金会的委员会，两人都是小有资产的来沪难民，已在商业上取得了立足之地。基金会由从维也纳来沪的波兰籍人贝尔格拉泽担任名义上的主席，他们俩是实际决策人。两人都是精明的生意人，处理所有的问题带有“普鲁士作风”，除了他们自己和亲信外从不肯让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厨房基金会计划发起一个“监护职责”运动来筹款，中欧难民委员会接管了供养 500 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工作。我们已唤醒了所有的人，正在发掘所有救济难民的潜在资财。

十一

风声越来越紧急，我们面临着马上要被遣返回国的前景，在临行前我们必须为救济工作作好安排。我们赶紧召集厨房基金会、

中欧犹太协会举行紧急会议，提议它们分别接管膳食和住房工作，美犹联合救济会则以其名义借款，按照需要支付基金。会议持续了4小时，中欧犹太协会回绝了我们的要求，厨房基金会在退席商议后接受了膳食和住房两项工作，实际执行上海救济难民计划。

遣返令在临动身的那天撤销了，但我们在一周内就与厨房基金会发生了摩擦。在所有的银行存款转给他们后，他们表示不需要瓦赫纳了，并把 we 打算留任的百来名雇员全部解职。我们指出原来说定移交后须在美犹联合救济会同意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但对方一意孤行。鉴于没有别的组织会出来接管，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必须承认，他们有志于救济事业，工作非常努力，确实在当地募捐到比以前募集的更多的钱。不管怎么说，救济计划仍然在执行。

美犹联合救济会仍然在筹款。1942年秋，阿兹肯纳齐社团的J·施里罗先生来找我们谈借款的事，我们从他那里以大大低于官方汇率、仅3元储备券兑1瑞士法郎的代价借到了相当10万瑞士法郎的储备券，因为除他之外无人可借这么大的数额给我们，而救济资金已日趋枯竭。

12月5日，英美侨民一清早醒来吃惊地发现日本人已开始拘留敌国侨民。我们估计在一二天内也会遭拘留，就委托比特克先生代替我们，继续与施里罗先生谈判再借贷40.5万瑞士法郎。我们把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的借款限额定为21万美元。使我们极其惊愕的是：当天傍晚得知施里罗也被拘留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向他借钱了。

当月，美犹联合救济会出资建立的新厨房正式开张，由厨房基金会出面举行开张仪式，许多日本官员出席了仪式。面对日本人反英美情绪的激化，我们被劝说不要出席，当时我们作为敌国侨民

臂上带着红袖章。

西格尔于1943年1月3日被捕，幸而我尚是自由之身，可以处理完借款事宜。我以6元储备券比1瑞士法郎的比价借到了相当于40.5万瑞士法郎的储备券，并与当事人商定不让社团和委员会知道此事，由比特克先生拿去投资，用投资收入作为无名氏的捐款送给美犹联救会，让难民得到每一分的利益。因为当地社团已受到鼓励就地募款，为了免得助长他们的依赖心理，还是不告诉他们为好。

十二

1943年初，我们通过机密的消息来源获知有一个把犹太难民隔离的计划，这是日本在沪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2月6日，《上海时报》上登载了一篇极丑恶的典型反犹文章，点了亚伯拉罕家族、海伊姆家族、维克托·沙逊爵士和许多上海著名的犹太富豪的名，提到他们如何靠贩卖鸦片和其他不光采的手段致富，把这些人作为国际犹太人的典型例子。2月18日，报纸和电台都宣布了设立隔离区的通告，从1937年起来沪的所有无国籍者必须限期迁入指定地区^⑩。通告在猝不及防的上海犹太人中无疑是扔了一颗炸弹，这意味着那些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商业上已立足的人必须清偿产业，搬至不到1/2至3/4平方英里的隔离区去，我们的难民营和厨房正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对于经过了如此之多的苦难的难民来说，这似乎是最后一个难关，有趣的是难民团体对通告泰然处之，远较俄国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镇定，这两种人首次面临威胁。有些难民变得很歇斯底里，但大部分难民只把它看成是经受重重打击后的另一次打击，他们总的态度是，盟国已快赢得战争胜利，只要勒紧裤带捱过这段时间，就能盼到胜利之日。我必须对大

多数难民所持的态度表示赞扬。

23日晚，主管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在犹太俱乐部召集阿兹肯纳齐犹太人社团开会，告诉几百名与会者，发布这一通告并不反映日本人民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住房与食品供应问题严重，必须对几千名无国籍者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他呼吁俄国犹太人与他合作，实际上他的讲话是一份最后通牒，要么与日本人合作，要么由日本人用他们的方式来处理。我接到的报告是日本人将把这个计划推行到底。

久保田同意厨房基金会继续活动，允许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如同以前一样，以总部的名义贷款。然而，日本人不想与除了俄国犹太人社团外的任何其他组织打交道。为此组成了一个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①。日本人只跟这个救济会打交道，该救济会转而与厨房基金会和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打交道。

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感到必须单独从该社团里募款，用以建造营房和修葺房舍，为搬迁到隔离区的人员提供额外的住房设施。至1943年8月，该会已募捐到一笔150万元储备券的钱款。救济会营建的房屋净赚到一笔极可观的收入，因为迁入隔离区的人员至少90%都付得起房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房产的收益减少了，难民穷困，难以付租。9月间，久保田下令所有供难民用经费都要转交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这就是说，厨房基金会在当地募到的所有经费必须转交给该救济会。这时厨房基金会已成功地争取到900宗“监护职责”，每宗“监护职责”的捐助款从每月50元储备券增加到100元，的确干得相当好，显示了当地社团在救济工作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同时，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募集的经费也必须交给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阿兹肯纳齐社团又向其成员推行了一种税收制度，规定每人要向社团救济

会交纳税收,为维持难民的生活作出贡献。

据统计,在8月1日时有16000人住在隔离区,其中至少有1万人需要全面救济或补助,但当时的经费只够供给3600人每天一餐,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计划在短时间内增加到5000人。此外,还有2870人住在我们5个营地内。有4669人每天领取6盎司面包的救济(包括一些每天可供给一餐的人和住在我们营地中的人)。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估计,若要继续维持上述开支每月将需要100万储备券。他们预计每月能筹集40万储备券,希望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能提供余下的预算。

从1942年8月8日厨房基金会开始运作至1943年6月30日止,基金来源情况如下:

厨房基金会本身(监护职责和一次性捐款)	17%
来自难民的收入(某些难民交付最低限度的面包费和食品券费)	14.75%
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	59.5%
中欧难民委员会	8.75%

让所有无国籍侨民在5月8日前迁入隔离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把截止期延长到1943年8月8日。在此日期之后,有特殊情况还可有例外,最多再延长3个月。1943年8月中,仅有170个家庭、60名医生、30名病人和老人以及80名其他身份的人得到例外对待,可暂时住在隔离区外。难民如能向无国籍侨民办事处证明有特殊需要且不违背“大东亚利益”,可取得通行证在白天离开隔离区去办事。8月份有7000人申请通行证出入隔离区,只发放了3000张有效期为3个月的通行证,700张有效期为3星期的通行证,上面注明可往何地、何时必须返回。发放通行证成了“勒索”,通行证可以用钱买到,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后不发任何通行证。

1943年2月25日以后的事态发展是我间接获悉的，这时我已在拘留中。在我被遣返离沪之前，比特克先生终于同意正式成为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委员，希夫林先生也进了委员会。至此，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共有6名成员：主席布拉恩，秘书格卢克曼，财务主管比特克，委员兰格、希夫林、瓦赫纳。但实际工作都是比特克、格卢克曼、兰格做的。他们往往冒着自身的危险，忠于职守，不倦地工作。

战争终于结束了，这些历尽劫难的人们冲破长夜迎来了曙光。战后，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和红十字会是最早进入远东地区展开救济工作的，但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将在救济上海的难民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一委员会已成为上海21000名难民生活中的一支有生力量，所以我们被再次召回上海，继续向他们伸出援手，积极帮助那些准备离开上海的难民。

十三

希望这份报告提供的情况能对当时愁云密布、十分复杂的局势有所澄清。我真诚地觉得，为拯救尽可能多的难民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不利条件太多了，除了日本占领者，上海的一些犹太人社会觉悟不高，对社团无责任感。加之还有一批吃不饱、营养不良、意志特别消沉的难民。如果战争再持续两年，我想其中的半数将再也不能恢复过来。不过，谁知道日本人在不断打败仗后会怎么对待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呢。出于对日本人的了解，我敢斗胆说“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们的唯一希望，诚如各国人民的希望一样，都寄托在盟军的胜利上。

注：

① 劳拉·马戈利斯，是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当时派驻上海的代表,1943年2月被作为敌国侨民监禁,后被遣返美国,战后返回上海。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简称JDC,是美国犹太人成立的专门救助世界各地穷困犹太人或难民的慈善组织,经费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犹太人的资助。本文是马戈利斯写给JDC总部的报告。

② 援欧在沪犹太委员会(Committee for Assistance of European Refugees in Shanghai)即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38年由上海各犹太社团、组织组建,主要目的是援助避难在沪的欧洲犹太难民。

③ 中央储备券是日本占领时期南京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

④ 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Granting Relief to European Refugees),另一个在上海的救助欧洲犹太难民的组织,曾得到沙逊家族资助。因其主席是科莫尔(Paul Komer),也称科莫尔委员会。

⑤ 阿兹肯纳齐(Ashkenazi),原意指欧洲犹太人,后主要指中欧、东欧及俄罗斯的犹太人。

⑥ 中欧犹太协会(Judische Gemeinde),当时在沪的中欧犹太难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建立的组织,成员大部分来自德国、奥地利。

⑦ 霍瑞斯·嘉道理,劳伦斯·嘉道理之弟,积极参与救助犹太难民,见本书《往事漫忆》一文。

⑧ 职业培训组织,简称ORT,是专为犹太人进行职业培训的组织。

⑨ 此处提到的计划指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代表梅辛格上校1942年向日本占领军提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当局将上海犹太人全部除掉,后因种种复杂原因未能实施。

⑩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在虹口设立“无国籍难民”特定居住区,限令1937年起来沪的“无国籍难民”(即来自纳粹统治区的犹太难民)在一个月內迁入该地区。

⑪ 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简称SACRA,系日本当局设立“无国籍难民”特定居住区后建立的救助犹太难民组织,以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为主,在与日本当局打交道时发挥了协调各救济组织的作用。

邓新裕节译自劳拉·马戈利斯所写《在中国上海活动情况报告1941.12.8—1943.9》(Laura Margolis: Report of Activities in Shanghai, China, from December 8, 1941 to September 1943)

上海避难地

乔治·赖尼希
(George Reinisch)

一

我们泊抵上海时，伯父早已等在码头边的计程车里，随即把我们带到虹口那间业已租下的小屋。他已经在上海呆了一年，是当时专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建立“海姆”(heime, 德语“家”，此处指难民居宿地)的共同创建人之一。由于长途跋涉造成的劳累和病痛，大家都为有此栖身之处而庆幸。母亲首先安排我睡下，然后才和父亲一起就寝，以期能睡个好觉。但事与愿违，我们在香港经历的那场台风，那晚又在上海以强劲的势头肆虐，一夜大雨滂沱，屋漏如注。开头几天，我们的膳食由一处“海姆”供给，饭菜虽不怎么可口，但我们仍为能受到如此接济而感激不尽。不过，大家对上海的最初印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台风过后，我们对全新的周围环境作了番了解。新居座落在虹口公共租界中最贫穷最底层的地段。除了中国人外，还住有日本人、锡克族印度人及新近到来的德国、奥地利难民。当时后者差不多正以每月 1000 人的速率涌入上海。起初，新来的人离欧时还被允许随身带些钱，但自 1939 年起，犹太人到达上海时就全然身无分文了。

时值 1939 年 8 月底，正是上海一年中的夏天。热浪和恶臭搅得人心烦意乱，上海的欧洲难民援助委员会^①建立的“海姆”已不堪承受与满足难民们对哪怕是狭窄住房的需求，众生相在街头毕

现,适者生存的原则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公共厕所,人们随地大小便。街上是各类营生,饮食、理发、牙医摊,还有代写书信的。无家可归、贫穷潦倒的难民也不知是病了还是死了,无声息地躺在街隅拐角。商店里传来收音机的喧嚣,整条街差不多都被人佔满了。荷重的脚伏苦力们走过时哼着号子,女人们怀抱着婴孩,男人们嚼着瓜子并把瓜子壳吐得满地狼籍,更兼成群的苍蝇和发着腐臭的成堆垃圾,其间穿梭着大汗淋漓衣衫湿透的黄包车伏。随处可见因轰炸和大火造成的残壁断垣,整个虹口仍遭受着自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的苦难。

父母每次回家都神情沮丧,虽然我们享有对有孩子难民家庭的补助,但还不足以缴房租。在中国人干同样工作只能得到1/4报酬的情况下,欧洲人的就业境遇也就更希望渺茫了。虹口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令人惊骇。我们居住的那幢房子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作为该房屋的看管人,他们竟住在堆满扫帚和其他清洁用具的储藏室里!我们搬进去的第二天,那个女的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产下了一个女婴,孩子刚一落地,即被系上蜡烛形的襁褓,头上戴上一顶红色小帽(据说是祝愿幸运),母亲就撇下婴儿干活去了。当天我们回家时,正在擦楼梯的小男仆以洋泾浜英语告诉我母亲:“太太,小囡死了。”“哦!太遗憾了……”母亲刚刚开口,怎料那个男的却边干活边说了句“不要紧的,明年再生一个。”

母亲经常因我们生活艰难而流泪哭泣,父亲安慰她说:“应该为逃出纳粹地狱而感到庆幸,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度过这番新的痛苦劫难。”鉴于房租太贵,父母亲经常留意寻找一个较便宜的住宿,几经周折,最终我们在虹口偏僻地段一幢房子的二楼租到了一间房,房间拐角处带一个小厨房。底楼住着两个同样是外来

移民的家庭。一家是夫妇俩和 17 岁的女儿；另一家则是一对中年夫妇及女儿女婿。他们都各自蜚居一室。但三家公用一间厕所和一间浴室。要用热水须到附近一家中国人开的老虎灶去买。最初几个晚上，父母整夜都忙着捕杀成群结队的臭虫，不然根本就无法入睡。

作为热衷于慈善事业，又属当时上海最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家族之一的亚伯拉罕的朋友，我伯父大概曾与他们谈起过我家的情形，我们应邀前往他家作客。他们住在一幢带有一个可爱花园的豪华住宅里，当时正举行露天交谊酒会。亚伯拉罕夫人用英语和我母亲交谈，随即叫仆人拿来一顶“供孩子使用”的蚊帐和一些食物，母亲对此千恩万谢。在我们住在上海的第一年里，她不断送来我们自己根本无力购置的食物。后来亚伯拉罕全家与其他英国公民一起遭日本人囚禁时，我们也知恩图报地给他们寄去了一些食品包裹，以期增加他们单靠米饭籍以生存的营养。

掌握多种外语的父亲曾想谋求一份当教师的工作，可后来发现那是无薪俸的，就辞职不干了。母亲曾在维也纳学过艺术和工艺学，她想依靠制作当时流行的手工制花来维持家庭生计。这样她既能在家工作又能同时照看刚刚会走路的我。父亲则走家串巷里兜售“鲜”花。幸运的是，从欧洲出走时他们总算随身带着工具，唯一必须的是要购置一些合适的材料。可那需要钱，我们手头又很拮据。经过反复商量，出于无奈，父母被迫出售了一只祖传的水晶花瓶，才换回了少许中国货币。

母亲准备了一些用麂皮制作的样花供父亲拿出去卖。按说他要搭乘电车进城，但在上海，登上一辆行驶中的电车几乎无异于自杀。电车一停，中国人即自车厢四处（包括车窗）奋力地蜂拥而上，在此过程中可怜的父亲几乎被挤得窒息而死。不管怎样，好歹终于

在电车的上下踏脚上谋得了一席之地。到达位于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后，他就逐家拜访那些豪华典雅的商店。有一家店主，一位欧洲籍的太太订了一打紫罗兰花后，问我父亲“打哪儿来”，“已在上海呆多久了”，了解了我家的境遇，一阵唏嘘，她深受感动地说，以后无论何时他需要什么，她都乐于帮助。

二

1939年9月4日，英国因其盟国波兰遭受入侵而对德宣战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上海震惊了，难民们惶惶不可终日，身家性命顷刻处在危急之中。

宣战后，上海不再是个自由出入的城市了。要想进入上海，必须从日本当局获取准许。听到这一消息，母亲泪流满面：“必须竭尽全力使我的父母早日逃出维也纳，否则他们将死在集中营里，一想到那悲惨的结局我就受不了。”随后母亲日以继夜拼命地干活，以尽速交货攒钱。当父亲把手工制花交给那位太太，并提起要将我外祖父母接来上海时，她说：“让我试试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我有很多关系。顺便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编制像这个样子的草包？”说着她拿出一只上面绣着花的白色手提草包，“我想帮助你们。我认为你们家不能单靠制作手工制花来维持生计。我在香港还有几家店铺，它们会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手提草包。”

这时许多难民感染上了在欧洲几乎闻所未闻的热带病，作为罹病者之一的父亲，被迫与严重的痢疾作一番抗争。他腹泻不止，病得很重。由于该病属于高度接触性传染，他不得不上医院并被安置在隔离病房内。那些难民医生对这种热带传染病的治疗不太有经验。大多数难民本身就营养不良，加上虹口地区垃圾遍地，疾病得以流行和蔓延，再强健体魄的人也无法抵挡那么多健康敌人

的同时侵袭。病前，父亲曾去一家专门制作手提包的工厂接洽，厂主是德国难民，答应先生产几只样品，但条件是原料须由父亲提供。经过一段时期的打针治疗，父亲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但仍感到虚弱，迫于生计，他急于出院，经过在家短暂的康复静养，他迫不及待地带上样包去城里找那位太太。

那位太太对样品欢喜不已，一下子订了3打。接着告诉父亲，有关他岳父母申请来沪的批准手续大体上已经办妥，但日本总领事馆还要了解一些详细情况，他得准备近期内被传唤。

几周后，父亲果真被叫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并经历了一场简短的诘问。1940年3月的一个雨天，在经过一阵望眼欲穿的焦虑和几乎放弃希望的等待后，一纸允准终于颁发了，不过有效期只有4个月。欣喜之余父母亲立即把好消息通知了维也纳。

父母亲找了一套包括两个大房间及一个小厨房的新住处。那幢6层楼的宅第先前曾被中国人辟作公馆或别墅，如今单单我们居住的二楼就住有20来人，且只有一个盥洗浴室兼厕所。房前有一个院子，种了几棵树。四周是高墙，上面垒砌了许多碎玻璃以防外人侵入。一天，那家手提包厂的一位工人郭先生找上门来，告诉我们他与德国老板闹翻离开了工厂，希望能与我们一起干。不久他又带来了他自己的全套工具，我们请木匠做了一张很大的工作台和一些架子，加上家里的那台脚踏缝纫机，我们自己的作坊就这样开张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接到了许多订货，我们的草包销往哈尔滨、天津、中国内地，甚而前法属印度支那。因生产的扩大我们还雇用了一些中国工人，至于包上的绣花则派给了乐于赚两个小钱的邻居们去完成。郭先生随之成了“拿摩温”②，他负责翻译、落实和安排工人们该做的一切。好在中国工人都很勤勉和聪明，他们凭籍原始的工具创新地制作出了由我母亲设计的一只只

漂亮而时髦的手提草包。有趣的是在劳动的交往中，中国工人很快就能讲上一两句英语和德语，改变了早先我们难民一味地学中文的情形。遇到特别忙的日子，工人们会唤来他们的妻子帮忙，午饭时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大碗的米饭，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满意足，竟还不加掩饰地大打饱嗝。起初父母亲都吓坏了，后来才被告知，那是对被诚意款待表示感谢的习惯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们虽被本地文化逐渐融化，但也竭力保留他们源自欧洲中部的生活方式。不久，在虹口开设了许许多多的咖啡馆和小饭店。人们在那里闲谈，议论时事，一桩无稽之谈的小事会不径而走，传遍虹口的每一个角落。剧院也没有闲置，那里甚至还上演维也纳的轻歌剧和话剧。一位维也纳的艺术家还开办了教授绘画的专门学校。日子渐渐好过了，在我的怂恿下，我们全家在星期六的下午经常去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散步。首先得走过外白渡桥，那是连接虹口与上海闹市的必由之路。苏州河上杂乱地行驶和停泊着无数中国人籍以世代休养生息的船屋和舢舨。外滩公园座落在黄浦江边，空气新鲜，植有美丽的树木和各色姹紫嫣红的鲜花，从那里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吴淞。

翘首盼望的外祖父母回信终于来了。他们将乘火车离开维也纳经由柏林和布列斯特，再转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前来中国。这可是途经莫斯科，穿越乌拉尔并进入俄国的亚洲地区，再经满洲里直抵当时已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大连的陆路洲际大旅行。然后再由搭船到上海，全程 6000 英里。同行的还有另外 15 名难民。信中说他们十分迫切地期待着与我们，特别是我（小乔治）的见面。

我们全家终于在码头边迎来外公外婆。后来知道，陆路行程还算舒适，列车员在过往车厢走道时不时随手拉上窗帘，大概是为了不让旅客看到窗外发生的一切。总体说来，俄国人还算友好，但

不免带有些许怀疑。海上旅途则截然不同。旅客们像沙丁鱼般地挤在绝无新鲜空气的昏暗底舱里，外加糟糕恶劣的膳食，折腾得令人够呛。

这段日子我们家日子过得很安宁和谐，大家都恪守自己在家庭中的职能。父亲和外公专跑客户，并用人力车进料送货；母亲去市场采购，打扫屋子，而后与中国雇工一起编制草包；外婆则负责烧饭和照料我；日子过得还算顺利。后来我们甚至还雇了一个廉价的中国娘姨负责清洁打扫并帮助外婆干些日常杂活。

三

对在上海的难民来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和随之美国的宣战更使人忧心忡忡。形势的发展已进入多方位的全球性冲突，不知又有多少无辜的青年人要为此付出生命。我们这些流落在上海的难民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人将作何举措。答案很快就见分晓：自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中止了移民进一步流入上海，上海已不再是自由港。犹太难民的地位岌岌可危，几乎被剥夺了自由，他们在虹口处于日本占领军的半囚禁管制之下。进城得凭通行证，有时为了得到通行证需排队站上好几个小时。接着又签发了每人必须时刻携带在身上以资识别的拘留营居民证。^⑧食品供应、煤、电、煤油和煤气等日益匮乏，货币贬值而黑市猖獗。各种季节性热带病的勃发流行夺去了许多难民的生命。犹太难民当时还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只是每天维持着仅以果腹的日子，惴度日本人是否会效法德国人对自己下毒手。他们深感自己被抛弃在了这一世界的偏远角落。那些英国移民的境况也不妙，许多人被强制住进拥挤不堪的拘留营，仅靠米饭和自来水维持生命。不少人遭到囚禁和严刑

拷打。日本领事馆和日军当局还发布了下述警告：“国际情势的主流已剥夺了你们自由生活的权利，为此你们必须本着和睦共存的精神勉力遵守各项法规条例。若有违抗者，将依照刑事条例予以严惩不贷。”

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还不知道，负责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事务的纳粹盖世太保头目，曾屠杀成千上万波兰犹太人而素有“华沙屠夫”之称的约瑟夫·梅辛格，已奉命离开他在东京的总部前往上海，协助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他一到上海就向犹太事务署的代表，特别是难民事务所主任久保田勤交底：“现在在上海的犹太人共有 17,000 人。作为盟友，我们感到你们自己也必须驱除整个犹太瘟疫。”然后他又概述了处理犹太人问题的一整套计划：“我的第一个建议是：9 月犹太人新年到来时，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将聚集在各处犹太教堂内，届时一锅端把他们包围起来，剥光衣服，赶上船只任其漂流，那些船只慢慢会自行沉没，这样也就不用操心尸体了。第二个建议：江河湖海边废弃着众多盐场盐矿，可驱使犹太人前往挖盐，仅供应最低限度的食物，这样他们也就活不了多久了。第三个建议是：在长江口的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以犹太人作为对象，进行包括对神经系统进行研究的各项医学实验。”梅辛格的建议连日本人也吓了一跳，他们表面上谦恭地微笑表示同意，事实上并未打算执行。作为折衷办法，他们在亚洲建立起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隔都”(ghetto)。1942 年 11 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接到来自东京的训示：“拟在虹口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区。一应看守、管制、领导等职能将基于军事上的目的。”这一指定区域方圆尚不足 3 平方公里，除了 15,000 名犹太难民外，还住有几千日本人，大约 10 万中国人和几千印度锡克人。战后，久保因没有采取行动杀戮犹太人而未被作为战犯审判。

在犹太人隔离区内，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煤气和电力的供应受到严格的限制，连煤也很难搞到。心灵手巧的中国人用垃圾和褐土掺水揉合，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土煤，再伴以废纸和木柴来助燃烧，可缺点是烟雾弥漫呛人不息，还得用扇子搨个不停。尽管困难重重，我那仁慈而善良的外婆仍不顾自身的心脏病，几乎每天都要邀请那些缺衣少食、饥饿难忍的难民上我们家吃晚饭。通货膨胀使上海蕴育着骚动，许多移民再也忍受不了他们所承受的一切，一些妇女甚至沦为靠卖淫为生的娼妓。持续的动荡变幻使一部分人产生了宿命的情绪。许多难民晚间麇集在各处咖啡馆内收听有关战事进展的越洋广播。当时最新的消息是：德国人继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开始其“巴巴露莎”行动计划后已逼近列宁格勒。一时上海纷纷传说欧洲的犹太人正在集中营内被纳粹用毒气成批处死，日本人也将驱逐犹太人并采取类似的措施。更有消息说日本人正在吴淞营建集中营，以期大规模灭绝犹太人。

日本人在虹口“隔都”组织推行起所谓的保甲制度。那是一种源自中国古代居民的自我救助形式。所有年龄在20岁至45岁的强壮犹太人都被强制编入名册。大家十分憎恶，各项差役都被众人看作是一种无奈的罪孽。作为进一步措施，当局还宣布了宵禁。鉴于当时上海霍乱、疟疾、伤寒、阿米巴痢疾和各种流行性疾病肆虐流行，“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SACRA）^④属下的医学委员会为难民们接种防疫，帮助他们度过那漫无止境的种种危机和厄运。该组织还建立过一所医院，然而规模太小，难民不能隔离住院。加上盟军的封锁，致使救援物资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当地百姓的少量捐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难民社区的需求。

自1942年初到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里，食物匮乏，黑市价格

扶摇直上。印度锡克人贩卖一种山羊奶，泛青的色泽与牛奶绝无相同之处，它们肯定被加水稀释，又未经过消毒，饮用这种代用奶无疑是对霍乱的公然邀请。食用黄油简直是种奢侈享受，五口之家享用一盎司的黄油就如同参加了一次盛宴。餐桌上的鸡也因瘦弱不堪而显得先天营养不足。菜市里的鱼为表明其新鲜而在鳃上涂上了红颜色。最好最便宜的肉食是肝脏和畜脑。罕见的水果价格贵得让人咋舌。为了吃得经济实惠，主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超乎想象的困难处境驱使许多人走上了歪道。难民中男人超过了女人，一些妇女为了生存便丢弃尊严和廉耻当上了妓女。她们的理由是：“我们要活下去！礼义道德于我们一事无补，我们或许活不到明天，但我们有资格今天活着！”

苦难的历程随着 1942 年冬天的到来益加难捱。那年天气格外寒冷。许多没有遮蔽无家可归的中国人晚上就冻死在街上。我们在家里也冷得几乎无法忍受。那个日当作坊夜当卧室的大房间，尽管坐满了操作的中国工人也绝无热气可言。大家都一个劲地呵气取暖。母亲除了照料病中的外婆和我外，还得忙里忙外照应一切，每当夜晚降临时，总是累得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外公建议父母傍晚带我去附近新开的咖啡馆坐坐，顺便会会朋友松弛一下。可在咖啡馆内，战争的发展却是朋友们见面时谈论的焦点。除了伊比利亚半岛、瑞士和瑞典外，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都已陷入了纳粹的魔爪。俄国正与德寇激战，双方死伤已逾数百万人。日本人也不甘落在德国征服者之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乃至新几内亚北部的岛屿均被其鲸吞，香港和新加坡也相继沦陷。

这时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读的那所学校是由一位富裕的塞法迪犹太人霍瑞斯·嘉道理先生创办的^⑤。作为慈善家，他为

贫苦的难民做了很多好事。学校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少量费用，对那些实在负担不起学费的也绝不逐之门外。当时约有学生 550 名，记得校长是露西·哈特维格小姐，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士。除了每天早上供应早餐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位学生都发一张身份证，籍以免除日本人的盘查。象大多数同龄的孩子一样，我凡事都好刨根问底，有时给父母增添了不少麻烦。我对地理深感兴趣，父亲常对我讲授一些世界各大城市的知识。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雨天，当我问起我的出生地时，父亲摊开地图指着维也纳告诉我：“维也纳是个非常大的城市，位于欧洲正中央，历史悠久，世代受哈布斯堡家族君临统治。1918 年经过一场大战后，奥地利变成共和国，也就是说从此再没有皇帝了。维也纳十分美丽，它的郊区就是我们经常在著名的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众多乐曲中所听到的维也纳森林所在。”“既然它是那么美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开呢？”我忍不住问道。父亲沉思良久，竭其所能向我解释：“有一个不喜欢我们种族和宗教的坏人现在正统治着奥地利，他使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可是爸爸，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宗教，我们刚在学校里学到它那十大戒律呀！”“亲爱的孩子，你是对的，”父亲回答说，“但是那个坏人根本不相信十戒中的一条：‘你们不得杀戮！’象众多神话故事里所说的那样，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终将不会有好下场。”

俄国战场戏剧性的帷幕终于揭开，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结局。业已推进到通往亚洲大门的德国军队，遭到了俄国人的当头棒喝：“到此为止！不准再肆无忌惮了！”1943 年初斯大林格勒激烈的巷战，随着弗雷德里克·冯·保罗斯将军率领的不下 22 个纳粹步兵师的投降，使整个战争扭转了局面。我们在上海听到这一好消息都禁不住欢呼雀跃。虽然我们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善，但战

争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多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憧憬。为了表示庆祝。父母还特地去虹口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接着，日本当局依照德国领事馆的提议，允许嫁给犹太难民的亚利安种族妇女⑥搬出虹口犹太人隔离区，住到较为舒适的城里以俾受到保护。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当事者充满蔑视的拒绝，只有极个别的人因不堪忍受隔离区的清贫而选择了前者。那年年底，德国人还间或在城里散发反犹的传单，但老百姓们普遍都对之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社区的“难民之家”当时每天要准备供应多达 5000 客饭菜。由于财政拮据，每份饭菜都要斤斤计较地予以过磅。每天 1350 卡路里的食物热量根本不足以使人抵御饥饿的威胁，更不要说疾病的侵扰了。尽管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社会捐助的支持，毕竟供不应求。就美国方面来说，它似乎有着某种顾虑，不太愿意把钱投往上海：该城市仍处于作为交战国的日本占领之下，后者可以轻易地将钱没收充公。于是向上海借贷巨款的提议被搁置起来。通货膨胀已猛涨至 100 元（当时的中国货币）兑换 1 美元。如果在银行里存款的话，一不在意就会暴跌至几乎一文不值。这时差不多有 7000 名犹太难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死亡边缘，指望着各救援组织的各种援助。此外，随着美军轰炸的逐渐频繁，以及美军接连攻占吉尔伯特、马绍尔、马里亚纳等濒近日本的那些太平洋岛屿，难民们生怕横遭日本人最终灭绝种族行动的恐惧重新又抬了头。

这时外祖母的病情已日渐严重，人也消瘦得变了形。医生诊断说是癌症，恐怕拖不到几个月了。这一消息犹如当头一棒，母亲悲痛得揪心如焚。尽管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设法搞来了通行证，且每周两次用人力车送她去城里医院接受放射治疗，期间还施用了吗啡以减缓她日益加剧的痛苦，最终她还是长逝于亲属膝绕的

床榻之上。大家都为失去了这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慈爱长者哀恸不已。当时根本没有木材，她老人家的遗体被放置在竹制棺材里，葬于市郊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的犹太公墓内，愿她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1944 年来到了，战局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盟军无论是在太平洋地区还是欧洲前线都节节胜利。当英美登陆莱特岛时，麦克阿瑟将军许诺的“我会回来的”预言得到了实现。纵使双方均蒙受很大损失，但日军伤亡犹甚。与此同时，德军已被迫自俄罗斯后撤，狼狈逃回本土。希特勒本人也劫数难逃，于该年底蜷缩到他构筑在柏林的地下碉堡里去了。美国飞机已开始直接飞临上海市区上空，不时传来空袭警报的阵阵呼啸长鸣。日本军队忙于廓清道路并强迫大家隐蔽疏散，若有违抗不从者则当场枪毙示众。11 日的某天，第一轮炸弹落在了法租界外围的一个临时机场上，致使一座油库当即焚毁。接着苏州河北岸的日军防地也遭到了袭击，日军的抵抗十分有限，只有不多几架日机起飞迎战。难民们尽管对美国飞机的出现欣喜若狂，但迫于没有防空掩体，没有红十字会或类似组织机构的救援，大家只得听天由命，各自逃生。

这段时期母亲常抱怨背部疼痛并伴有持续不退的高烧，时值冬天，起初她一直以为是风湿病。后来她晚上时常疼得尖声叫唤并恶梦频繁，医生诊断患的是肋膜炎。积水已经浸润了她的两肺，医生建议施行钙针注射以代替手术，并应注意卧床休息，辅以营养滋补。我们的邻居担负起为我们一家以及中国雇工们烧饭的任务。经过几周的治疗，上帝大概也感应到了大家特别是我母亲的祈祷，尽管十分虚弱，她终于能够起床了。母亲勉力求生和帮助全家克服难关的强烈信念支撑了她在康复的崎岖小道上奋力拼搏。

美军的轰炸越来越加剧。通常空袭差不多在中午时分进行。届时饭刚煮到一半，确保炉火不致熄灭成了伤脑筋的大问题。日军规定，一旦警报声起，必须熄灭所有的火种。空袭过后重新引燃炉子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我们家对面有幢日本人占作市政管理之用的大楼。空袭时，人们都逃往那里躲避轰炸，楼内拥挤不堪，许多中国人还要抽烟，尽管墙上贴着偌大“禁止吸烟”的告示。我们决定跑到底楼，全家蜷缩在楼梯斜坡下堆满扫帚、刷子等清洁用具的储藏室里“双重避难”。一次空袭后，父亲跑出去察看，周围幸未受到多大破坏。令他吃惊的是损失惨重的中国百姓依然若无其事地从事着各自的营生，似乎什么也未发生过。有一次空袭，美国人轰炸的目标是日本人的无线电台，炸弹却落到了与其毗邻的一座房子，一下子炸死了大约 50 多名犹太难民⑦。

这时各种疾病也与日俱增。日本人害怕大规模的流行传染病泛滥蔓延，规定所有居民都必须打预防针。尽管应难民的要求，日本人还破天荒地提供了免疫血清，可中国老百姓却普遍不予合作。这在他们来说恐怕蕴育着不可估量的潜在反抗意义。

俄国人已越过了战前的波兰边界稳步向德国境内挺进。但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仍以双方巨大的伤亡而犬牙相持着。日本人的“自杀飞机”虽然给美军造成相当的损失，但败势已定，垂死挣扎也难以挽回军国主义覆灭的命运，即使他们自己也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难民们重新产生了担心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杀戮的恐慌。除了承受这血与火的苦难之外，通货膨胀已狂升至100元中储券兑1美元。为此，一位客户兼朋友来虹口拜访我家时，劝诫我父母，与其藏钱不如抓紧时机买进黄金以备不测。他哪里知道我们所赚的钱差不多早已在食物购置、医疗费用和支付房租等

支出中消耗殆尽了。唯一引以宽慰的是我们总算还不至于依赖救济。

四

1945年初有消息传来，说美英俄三大国代表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雅尔塔会议。三方确认东欧将成为苏俄的势力范围，其中也包括布拉格和维也纳。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行将结束，而帷幕应在太平洋地区落下。4月28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活捉并吊死在米兰，两天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工事里自杀身亡，他那新婚的妻子爱娃·勃劳恩也服毒自杀。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上海，对难民们来说这场战争还未结束。日本人在加紧治安和宵禁的同时，开始将其家眷和辘重物品装船运回日本。上海四周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越益频繁活跃，并着手包围该城。美军的轰炸继续进行，日美双方仍还处于交战状态。

这时日本人已被赶出了缅甸。其本土的大城市几乎每天都遭到轰炸，东京更是被严重摧毁。距本州岛仅350英里的冲绳岛3—4月间已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尽管石油供应告罄，加上损失惨重，日本人仍继续顽抗。8月初，传来日本发生了一场令人战慄惊悚的灾难的消息，后来才知道美国的原子弹投在了广岛，炸死致残了数十万人。接着第二枚原子弹又落在了长崎……。由于害怕美国人会使用更多的原子弹，日本人被迫向盟军投降，并于8月14日午夜由天皇颁诏下令停战。战争结束的喜讯一旦传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高兴得在街头跳起舞来。当英美军舰排着队沿着黄浦江抛锚停泊时，万头攒动的人群更是近乎疯狂地欢迎盟军水兵。

和平最终到来时，我们正在学校上课。一位教师气喘嘘嘘闯

进教室，宣布了这则喜讯，我们随即全体集合在大草坪上，包括老师们在内大家洋溢着远不止是吃惊的欣喜。校长来到师生中间致辞：“我想对大家宣布，战争已经结束！我谨此还衷心祝愿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在未来的努力中交上好运。今后随便你们去哪里，都要做一个诚挚而优秀的公民，为接纳你们的国家竭诚效力。上帝保佑你们！”嗣后，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一遍遍地高呼：“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这时宗教督导走进了教室，他耐心地等在一边直到大家的激奋情绪平息后才缓缓开口：“不错，亲爱的孩子们，战争是结束了，但我们并没有赢得它。有 600 万我们的兄弟姐妹在这场战争中死于最恐怖最惨无人道的屠杀。纳粹屠杀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侥幸活着的人正忍受着饥饿和无家可归的煎熬，他们是最残酷最不人道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毫无救星可言，甚至还无容身之地。人们惧怕世界将充斥太多的犹太难民。我也说不准，如果世界各国群起而与法西斯抗争并保护他们的话，本该有多少罹难的犹太人可以得到拯救并生活得较好。我们犹太民族不善憎恨，犹太人并非天生的仇恨者，但这一切必须永远不再发生。我们现在应该拥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国家，不能再听任所有狂妄之徒的欺凌和摆布。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必须起来战斗，并不惜为自己生存的土地而献身。”他那席庄严的简短讲话使大家足足沉默了两分多钟，接着我们又为在历次战争中悲惨而又最不公平地死难的犹太人举行了简短的祈祷。宗教督导的那次谈话我毕生都铭记在心，因为它是那么地感人肺腑和令人难以忘怀。

一阵短暂的繁荣生机使上海增色不少。先前曾驻扎在中缅边境的美国大兵开始经由上海回国。他们的到来恍若天堂派来了使者，一个个慷慨大度而又兴高采烈，整个虹口的氛围风貌骤然大

变。他们是妇女老少最虔诚的崇拜者，孩子们乐于与他们嬉笑玩耍。美国人向孩子们赠送口香糖、巧克力、糖果和铅笔——多年来人们不敢企求的奢侈物品；成年人则津津乐道于获赠的香烟和羊毛毯。那阵子父母除了编制草包外，还忙于生产一种皮制的妇女专用小粉盒，上面绘有体现中国古代传说的精美图案。许多美国兵专程找上门来，为他们的妻子和母亲买去这种可爱的礼物。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长得高大而英俊的美国中尉，还送了一听咖啡。原来，他原先驻扎在靠近缅甸边境的昆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威尔医生一家。起初他对自己在中国偏远的腹地邂逅一个欧洲人家庭感到惊奇，听了他们的境况遭遇后他被深深感动了。很快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他向医生夫妇保证，一俟战争结束回到美国后，他一定设法帮助他们搞到移居美国的准许。而威尔医生的妻子，正是母亲失散了多年的胞妹，我的劳拉姨妈！中尉还告诉我们，他原先是纽约的一位建筑师，这次回国就要结婚了。我们与美国客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令人愉快的下午，临走我们诚挚地感谢他的光临及带来的好消息，并祝愿他回国一路顺风。

当美军撤离上海时，通货膨胀已到益发不可收拾的程度，商业也因美国廉价制品的大量倾销而日趋衰退凋敝。不过，美国人却通过向难民发放军队的食物配给接济了他们。其中包括一种装满了各色食品的“十合一”饭匣，既应急帮助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难民，又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健康，因而受到普遍欢迎。此外，从充斥于市的美国杂志上我们可以了解许多久违了的新鲜事物，诸如艺术、音乐，甚至最新的服装时尚。丽泰·海沃斯这位好莱坞影后的华丽服饰和倩影顿时引来众多女士们的啧啧羡慕。

我们现在终于自由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也不用任何通行证。我在学校成绩优良，母亲答应带我进城

玩玩并看上一场电影。可怜的我长那么大竟连电影都未看过。一天，得知正上映《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我们就欣然进城了。本来计划搭乘电车的，可车子太挤只得步行，幸好正赶上开映没有迟到。回家时，母亲还带我逛了几家位于静安寺路上的豪华商店和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不过最使我感到新鲜有趣的还是擦肩走过、长着瓷娃娃般面容的中国少女穿的美丽旗袍，和在马路上蹒跚而行的中国老太太裹着的“三寸金莲”。

一个偶然的机，我就读的嘉道理学校的一位老师对我父亲说，我是一名聪明上进的学生，建议父母把我送进城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中学^⑧接受更高程度的文化教育。该校无论师资还是生源的要求都很严格，经过举家研究商量，父母决定送我去那里继续学业。在上海，学校普遍早上8点钟上课。鉴于新学校位于很远的城里，我每天得很早起床，步行很长一段路程，再搭乘公共汽车到校。我得学习诸如中文、拉丁文、数学以及其他很多科目，整个课程设置都排得满满的，据说那是为了保证一个象这样高标准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尽管学习紧张，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所学校，我在该校一直呆到我们离开上海。

随着战争的结束，越来越多的难民前所未有地清醒认识到，上海只是他们栖息寄居之地而远非自己真正的家。正巧，父亲获悉了一位居住在澳洲墨尔本老朋友的地址，于是写信请他帮忙获得我们举家迁居的允准。

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在上海正式开始办公。有几万名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要求重新进行全球性安置。尽管该机构总是不紧不慢地办事，但终究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第一个我们熟识的离境者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就住在我们家附近，他有个兄弟在墨尔本。在他启程离开上海前，我们恳请那位

年青人抵达目的地后能给父亲的那位朋友打个电话，为我们多说些好话，央求其尽速办妥移民准许。所幸这一请求被后者欣然接受了。

经过相当时间的辗转周折，终于传来了喜讯——移民准许证件寄到了！我们顿时成了朋友和邻居们羡慕的对象。但经过对澳洲地图的仔细研究并找到墨尔本的位置后，大家又变得沮丧起来。“这可是地球上最偏远的一个大城市啊，离开所有地方都是那么遥远。”母亲首先叹道。“哦！妈妈，澳大利亚是个人烟稀少的民主国家。澳大利亚人民是个十分容易相处而又可爱的民族。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绵羊，此外还有袋鼠在街上到处跳跃。那里几乎总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一定是个有趣的大陆。”我搜肠刮肚一古脑儿地把所有在学校里学到的有关澳洲的知识告诉了母亲。可这些信息都是笼统概括的，除此之外谁也不知道有关这个国家更详细的情况了。不久，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位代表抵达上海。已经收到移居澳洲允准证件的难民们都被通知到一个会堂集合。作为被邀者，我们怀着焦虑忐忑地等待着。未几一位颇为年青而又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站到了我们面前，稍作自我介绍后他开始讲话：“我衷心欢迎你们成为澳大利亚的未来公民。鉴于你们大概都有兴趣知道澳大利亚是如何在各方面运作和行使职能的，大家可以向我提出任何你们感兴趣的问题。”简短发言的话音刚落，立时他就被淹没在一片刨根问底的问题海洋之中。提问结束后，大家带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回了家。

接下来面临的的就是前往澳洲的交通问题了。这时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的一位代理人已经赶来，负责安排难民们离开上海的交通事宜。他设法包租到了一艘名为“华联”（译音，Hwa Lien）号，排水为 3000 吨的海岸蒸汽轮船承担这次驶往澳大利亚

的航行。

说实在的，我们在上海的居留并不令人感到愉快。然而，我们毕竟在那里生活了7年半，且已似乎有点习惯适应了那个我们曾经住过的“家”。父母对我们现将分别的其余亲属、朋友乃至熟悉的人们已经深有感情，我们都害怕再进入一个人生地疏的陌生环境。但我们却不得不再次收拾行装踏上新的人生旅程。我们憧憬着此番前往的是一个遍处都是牛奶和蜂蜜的国土，那里街道上说不准随时都会发现黄金。

开航的那天来到了。在上海期间我们结识的所有人几乎都到码头为我们送行，那是个依依惜别令人伤心流泪的时刻。挤上“华联”号的除了难民外，还有俄国人和中国人。更有甚者，在停泊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汶时，竟还加入了一批澳大利亚士兵。1947年2月初，经过一路颠簸，父母、外公和我终于抵达了悉尼。

再见了，上海！

注：

① 即本书《沪上救难亲历记》一文中提及的“援欧在沪犹太委员会”。

② 此处指类似工头的地位。

③ 这里指的就是“无国籍难民”特定居住区，由于作者当时还是幼儿，因此对当时一些事件的性质、时间叙述得不太准确。

④ 见本书《沪上救难亲历记》注①。

⑤ 此处提到的即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人们一般称其为“嘉道理学校”，创办于1939年，学生都是犹太难民的子女。

⑥ 指非犹太裔的德国妇女。

⑦ 1945年7月，美机误炸虹口犹太难民区，31名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此处作者所提数字不确。

⑧ 此处指上海犹太学校，创办于1900年，1932年搬到西摩路。

陈无忌节译自乔治·赖尼希所著《上海避难地》(George Reinisch: Shanghai Haven, Standard Commercial Printers, Australia, 1984)

一个俄国犹太人在上海

亚伯拉罕·弗拉德金
(Abraham Fradkin)

一

1930年初，我们回到上海。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这座城市是多么现代化和发达。两年前，当我4岁离开这里去哈尔滨时，我对上海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们在法租界安下家后，我即到上海犹太学校注册，那儿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教授。不久，我加入了贝塔犹太童子军①。

修正派在上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我们的英雄是约瑟夫·特伦佩尔道和齐夫·贾波丁斯基②。我们听说过特伦佩尔道的英勇事迹。1904至1905年俄日战争期间，他是沙皇军队的一名军官，在亚瑟港（今大连）失去了手臂，后在巴勒斯坦的一次保卫战中英勇牺牲。我们也知道贾波丁斯基的事迹。1903年他参加了一个组织，该组织旨在保护敖德萨的犹太人免遭即将来临的大屠杀。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了犹太人部队，并任一名军官，1920年他曾领导耶路撒冷的哈加纳（Hagana）组织③。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3年就在上海扎下了根，该年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立，并派代表出席了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以色列国创立前夕，在华犹太人有3名代表出席该组织的1946年大会。

上海犹太社团组织良好。我们有许多犹太教堂，一所学校，一

所医院和一家俱乐部④。大多数机构由富裕的伊拉克犹太人建立。

中国人对白人居民一视同仁，因此我们从未遇到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歧视。我们与其他外国居民友好相处，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

我13岁时，父母把我转到公立托马斯·汉伯里学校上学。该校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只对外国学生开放。不同国籍的学生关系亲密。象所有的英语学校一样，体育活动在该校备受重视。

一些学生，包括我，是基督教青年会俱乐部的固定成员，该俱乐部只对外国居民开放。几乎每天放学后，我们都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毕业之后我们依然如此。我打垒球，且是一支篮球队的队长，我还踢足球，打排球，对拳击也稍作尝试。

二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上海郊区也成了战场，日军击溃了中国军队，在两块租界边界前停了下来，那里由外国军队守卫。但是；一部分公共租界被日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那里早就有大量日本百姓定居，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分遣队长期驻扎在那里。

为了加强租界的防御，外国侨民组成了上海万国商团⑤。商团士兵接受西方军官指挥的军事训练。加入商团的犹太侨民要求组建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分队，遭拒绝后，由于他们一再坚持，最终还是得到批准。犹太连成员自豪地将大卫王之星⑥的标志佩戴在军装衣领上。

沪郊之战结束后，我和几位邻居一起去参观战场。我们瞒着父母，骑上自行车，冒险远游，搜集战斗者遗留的“纪念品”。整个战场到处是燃烧着的手榴弹和其他弹药，手榴弹呈瓶状，与现在的

同。幸运的是，我们全都安全地回家。

30年代末，随着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坐船来到上海，几乎有2万名中欧犹太人最终在这个城市找到了避难之处。

按照惯例，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入境限制的地方，而当时所有国家都禁止没有签证的犹太难民入境。一旦到达上海，中欧犹太人便逃脱了迫在眉睫的大屠杀。

从事较好职业的人能够负担在上海较富裕地区的生活费用，但大多数身无分文的犹太人只能在虹口——该城最贫困地区之一——居住。顺便提一句，难民中有一位10多岁的年青人，名叫迈克尔·布鲁门撒尔，战后他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后进入商界，70年代末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部长⑦。

随着中欧难民的到来，上海的犹太社团达到约25000人，我相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白人人口的40%。那时，这个城市的华人总数在400万到500万之间。

三

1939年5月，英国政府颁布白皮书，表示要粉碎犹太复国运动⑧。犹太人备感失望，其时中欧犹太人身处极端的压力和死亡的危险之中，正在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该白皮书却阻止他们抵达故国。听到这一消息后，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嚎啕大哭。一连几天我都无法抑制这种被侮辱、痛苦和愤怒的感觉。

1939年7月初，父母和我离开上海，登上一艘去大连的日本客轮。航行持续了3天。再从大连由铁路去海滨胜地卡卡加西。几乎每年夏天我们都去这个胜地，以逃避上海的炎热和潮湿。我们

在那儿一直呆到8月底，然后及时回到上海重新开始我的学业。

1939年9月1日，在我们返回上海的路上，船长召集乘客，情绪激昂地宣布德国入侵波兰了。就英法两国是否应该对德宣战，在英国人和其他乘客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然，我站在支持宣战的人一边，并对宣战的结果作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说。我的理由与其他旅客不同，因为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在纳粹统治下我们将要遭受的痛苦。我希望英法能在最短时间内打败德国，这样就能结束我们同胞所受的痛苦和羞辱。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不幸的是，这场战争持续了6年，对于数百万犹太人来说，胜利来得太迟了。

1941年11月底我从英语学校毕业，两个星期后，我们参加了剑桥大学的附加考试。英帝国所有英语学校的学生都在同时参加考试，考卷被送回剑桥打分，一两个月后，通过考试的学生被授予剑桥大学证书，这是在未来生涯中极其重要的证明。由于欧洲战争，考卷一式两份。由于德国潜水艇可能发射鱼雷袭击运送答卷（正本）船只，有关部门决定将副本由另一艘船运送，希望至少有一份答卷安抵剑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尽管第二天日本占领了租界，我们仍然完成了考试。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得到结果。战后即1945年，我被授予剑桥证书。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抵达英国的是原本还是副本，或者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四

尽管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我们仍然过着正常的生活。日本人不干预我们的日常事务和活动。在租界几乎看不到日本兵。对美、英、荷、比等国侨民的唯一限制就是在公共场合要佩戴红袖带。1943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被集中在平民拘留营，遭受了严重的食物短缺之苦。

同年，日本人屈服于同盟国德国的压力，将中欧犹太难民（包括波兰犹太难民）集中在虹口，限制离开，难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然而，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们一直坚持到了战争结束。

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或其他外国居民，包括俄国犹太人则没有居住地域限制。

波兰犹太人是远涉重洋，备受艰难后才在上海找到避难所的。德国入侵波兰之后，数千名波兰犹太人逃离到立陶宛，当时正盛传日本领事杉原千亩在立陶宛首都考纳斯负责签证工作。波兰犹太人几乎挤满了杉原的宅邸，恳求他发给日本过境签证。苏联当局允许签证持有者经过他们的领土抵达日本。杉原理解波兰犹太人的困境和痛苦，无视日本外务省的禁令，签发了所需的签证。杉原在考纳斯工作到1940年，苏军占领这个国家后，他被要求离开。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外务省开除。

杉原的仁慈行动使几千名波兰犹太人抵达日本。他们在日本稍作停留，大部分人继续前往其他目的地。后来担任以色列宗教部长的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和议会发言人的梅那西姆·萨维多也在这些人之中。战后，为了表彰他的高尚行为，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授予他“正直的非犹太人”的称号。

抵达日本的波兰犹太人中，大约有1000人除了上海别无他处可去。这群人中有数百人是犹太经学院的学生，其中一部分人住在曾作为我们俱乐部的房屋里。假期的某一天，我向他们赠送装有新鲜水果的礼品袋。学生们欣喜万分，表示由衷的谢意。接着，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用希伯来语唱起了以色列歌曲。突然，他们的感激之情变成了满腔愤怒，冲着我们用意第绪语^⑨大声喊叫，

“滚出去！”我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十分惊讶，感到受了伤害和侮辱，离开了他们。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存在着反犹太复国主义者^⑩，以前从未想象过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尤其是它涉及到虔诚的犹太人。

占领期间，大多数学校照常上课。1942年1月，我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入学，主修化学。当时担忧：日本人可能会关闭这所大学。使人惊讶的是，整个战争期间它未受任何干扰。我们从未在校园里附近看见过一个日本兵。该校由数千名中国学生，约30名欧洲学生，以及几乎所有的俄国犹太学生组成。4年后我获得了理科学士学位。

大约一年内，我们仍然能欣赏到英美电影。后来，我们只能观看苏联电影^⑪。我对正式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片更感兴趣，从中跟踪了解战争的进程。我们看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军队的撤退以及同盟国的胜利，我们目睹了梅达尼克集中营的解放以及红军在那里发现的敌人的残暴行为。我们天真地以为这些都是苏联的宣传，战后我们才得知这次大屠杀的真实情况。

1945年8月，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太平洋战争终于结束了。一天晚上，一位葡萄牙朋友向我透露了一个绝密消息：那天他去拜访一位亲戚，从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我立刻行动。当晚父母外出与朋友闲聊，我就把父亲做生意挣的钱分成4份，并分别到4个钱币兑换商那里换银元。我避免在一处兑换一大笔钱，以免引起他的怀疑，猜想我知道一些他尚不知晓的事情。

父母回到家里并发现储藏柜打开着，钱不见了。几分钟后我回到家里，对我的所为作了解释。当我给他们看满满一包银元时，他们平静下来并紧抱住我。

第二天上午，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野火般地迅速传开，银元汇率直冲云霄。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了。不久美国和中国士兵进入上海，受到了热烈欢迎。西方列强声明放弃他们享有的治外领事权，100多年来上海第一次回到中国人手中。

美军对打反共内战的国民党提供后勤支援，需要额外的人力。他们开始在外国侨民中招募新人。我的一位在上海通讯部队服役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部队有一个空缺位置，并主动安排我与人事官员会面。

当时我还在圣约翰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对任何职业都没有兴趣。然而出于纯粹的好奇，我决定去会面。面试开始时，有人打电话告诉人事官员，陆军军需部油料处急需一位文职人员。这位官员朝我转过身来，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愿去军需部工作而不是到通讯部队工作。我说我没有什么偏好，但我还在读书，不得不作通盘考虑。

我来到位于同一个大院内的军需部总部。部主任听取了我的意见，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在我学习期间，即1945年10月至11月期间，我从下午4点到半夜在码头上第二班，美国货轮在此靠岸，我同一些外籍工人一起监督数百名中国劳工卸下燃料桶并将它们贮存在港口附近。到1946年1月初毕业后，我将被调到油料处总部担任行政职务。这位官员希望我在一两天内作出答复。

这是一个难以作出的决定。我自问我能否经受得起这种压力：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在大学读书，4点到半夜工作，晚上1点后回家。然而，这一建议是很诱人的，既是一种挑战又能够获得

收入，尽管父母经营纺织品，比较富有，已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

最终我接受了建议，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工作。随后的3个月中，我既感到满足而又疲劳。毕业后，我被调至军需部总部。油料处负责为美军拟出石油消耗量的预算，从海外进口所有的石油产品，贮存并分配给所有部队。一俟战争结束，油料处还向国际石油公司出售石油产品，以分配给当地市场，直到他们重新恢复正常业务。

工作了1个月左右，我具有了足够的勇气就油料处的工作状况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令我惊奇和欣慰的是，建议被采纳了。半年后，我得出结论，向上海的国际石油公司购买石油产品以取代从海外进口在经济上较为合算。军需部采纳了我的建议，与报价最低的 Socony Vacuum 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

令我惊喜的是，1946年9月我被授予一枚驻华美军总后勤部颁发的杰出公民服务奖章和一份盖有美国国防部印章的嘉奖令。

坦率地说，当我看了嘉奖令的内容后更为激动，其中写道：“弗拉德金先生编制了所有的进货申请，并提出建议，对军队中的规章制度、通告表示赞同或反对；还对油料处的各种工作提出多份报告。弗拉德金先生对工作具有创新和全面的理解，这使他对油料处的协调而有效的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久，尽管我并不是美国公民，我还是被任命为油料处主管，一直到1947年2月中旬我辞职为止。

可以说，纯粹是机遇命运，我从石油起步，后来在以色列，我在这一领域工作了36年。

辞职前数月，为了进一步深造，我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并且被录取了。当我在美国领事馆填写签证申请时，被告知只有提交一份有效护照才能签发。美国当局希望持有

有效护照的人在完成学业之后离开美国。而我是一个无国籍者，没有任何护照，于是我去找我的一位有权势的中国朋友，他替我与中国外交部打交道，并取得成功。一两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份从外交部发来的文件，担保我在完成学业之后返回中国。这份文件使美国领事馆给我签发了签证。

那时，我本可以采取另一个步骤，向苏联驻沪领事馆提出申请，要求获得一份苏联护照，但我没有这样做。战后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项大赦令，这项大赦令适用于所有无国籍的俄国人，包括有可能获得苏联公民身份的俄国犹太人。我的一些同样为无国籍的以及计划去伯克利读书的朋友，除了向苏联领事馆提出申请以便获得一份苏联护照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1947年3月初我离开上海前，我告诉父母，共产党最终将控制整个中国，而美国在经历为期4年的战争之后，将不可能进行军事干涉以帮助国民党。当时的流行观点是“美国决不会舍弃中国”。父母拒绝接受我的建议：出售他们的资产，移民去美国。但是，1年半之后，1948年9月，他们最终还是离开这里前往旧金山，那时出售他们的资产只能得到原来价钱的一半。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了中国^②，主要去北美、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安家。然而，这些侨民间从没有断绝过联系，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密切，这应当归功于总部设在特拉维夫的前中国犹太居民协会，近20年来，该协会由特迪·考夫曼卓有成效地领导着，并得到鲍里斯·米尔金的积极帮助，他们俩以前都是哈尔滨的犹太居民。

1947年2月末，我去负责上海与旧金山之间定期客运服务的美国官方轮船公司办公室，购买3月初的船票。我大失所望，船票已出售一空，我除了预订下一趟船期的船票外，已别无选择。

正当我气愤而又沮丧地离开办公室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位女职员正朝我追来。这不是她有什么浪漫想法，我以前也没见过她。她告诉我，她曾看到我代表基督教青年会的特洛伊队打篮球，在她心目中，我是一位“球星”。不用说，我得到了一张3月初的船票，届时我将离开上海前往旧金山。

注：

① 贝塔(Betar)是犹太复国运动内修正派(见注②)的青年组织的名称缩写，贝塔犹太童子军是贝塔在中小学中建立的外围组织。

② 世界犹太复国运动在20年代发生分裂，一批激进派提出要修正犹太复运动的理论和纲领，被称为“修正派”，其领袖即齐夫·贾波丁斯基。约瑟夫·特伦佩尔道是早期犹太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被犹太复运动视为英雄，贝塔即用他的名字命名。

③ 哈加纳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组建的秘密军事组织，即今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之一。

④ 这里的说法不确，犹太学校、医院、俱乐部均不只一所。

⑤ 上海万国商团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已建立，后面提到的犹太连成立于30年代初。

⑥ 大卫王之星即六角星，为犹太民族象征性标志之一。

⑦ 迈克尔·布鲁门撒尔，1977—1979年任美国财政部长。

⑧ 1939年5月，巴勒斯坦的英属委任统治当局发表白皮书，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施加严格限制。

⑨ 中欧犹太人，特别是德国、波兰等地犹太人使用的语言。

⑩ 犹太教正统派主张等待救世主来拯救犹太人，反对在救世主来到之前重建犹太国家，具有强烈的反犹太复主义思想。

⑪ 当时苏联与日本没有开战，作为中立国的苏联在上海仍能公开搞宣传活动。

⑫ 新中国建立后，上海仍有数千犹太人安居乐业，直至“文革”爆发，几乎所有犹太人才离去。

经岚节译自亚伯拉罕·弗拉德金所著《流浪生涯》(Abraham Fradkin: Periods in the Circle, 1990, Israel, in Hebrew)

与日本当局抗争记

朱迪丝·本—埃莉莎^①

(Judith Ben-Eliezer)

—

一天，T. S. 王^②来找我，他说：“朱迪，我想请你做件事，如果你觉得难办的话，就请爽快地拒绝，我能理解你。”

“唉，这件事挺难以启口，但我想你即使不愿介入，也不会泄密。中国游击队已渗透到了上海郊区，经常出击扰乱日军。游击队员大多是蒋介石的部下，也有来自共产党的。现在，小打小闹已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打击敌人的最敏感部位，在农村随意地杀几个日本兵效果不大。游击队必须掌握敌军敏感地段的情报、特种兵团的部署以及重要的设备部署情况。汪精卫伪政府成员在跟日本人合作，尤其在帮助日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了解日军的防卫情况。我们已有一位同志秘密打入了伪政府，凭他的职位可以获取秘密情报……”T. S. 迟疑着等待我的反应。

“继续讲，”我鼓励他说，“你是什么意思？”

“这位同志把情报传给我，由我转送到急需情报的部门，困难在于他一旦被怀疑，就会被跟踪，而我是公开的蒋介石追随者……他必须跟一个中间人联系。”

“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中间人，让他把情报转给我吗？好，我愿意做这件事。”我立即回答。

“决定前你最好慎重考虑一下，你的想法很好，但你可能遭到

危险，如果敌人顺藤摸瓜逮捕你，后果你也清楚……。”我理解 T. S. 的告诫，每个人的意识深处都有恐惧之心。

“就目前来看，我至少可以按你说的去做，王先生，我不需要再考虑了，我很乐意接受任务。”我坚持说。

王微笑着说：“我相信你会如此反应，感谢你，朱迪。”

“我们如何着手工作？”我问。

“我多少也想了一些对策，”T. S. 王说，“如果他往你家或办公室送情报，将暴露他的身份，但如果他到煤场去，就可以迷惑那些对他怀疑的人。煤场是个大闹市，无数苦力在那里忙碌，有的装卸煤粉，有的将煤筛选分类，还有买主、卖主和同行在漫无目的地闲逛。如果他在高峰时间到煤场来，即使有人监视他，也搞不清他把情报转给谁了。只要你到时能在场，而且你确实经常在场，这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会跟我联系吗？”我问。

“他叫齐先生，他会给你电话的。”T. S. 对我同意他的计划颇感欣慰。

齐先生——肯定是化名——与我取得了联系，并按计划继续联系着。

一天，他警告我，我已被人盯梢，敌人一旦排除了其他对象，就会怀疑到我头上来，如果我偃于形势危急不愿继续干的话，他能理解我。我对他的忠告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我将一如既往。

我意识到即使日本人没有证据，也会找其他借口，比如指控我非法经营煤。我有一种预感，他们将找我麻烦。

二

正如我所料，日本当局的魔爪慢慢地伸向了我。一天，我正在

办公室工作，两个中国人闯了进来，自称是“经济警察”。情况很不妙，但我仍然坐着，对他们的粗鲁闯入显出一副受到伤害的样子。他们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威胁性地把枪攢在桌子上。

“你做煤炭生意吗？”其中一个问。

“从战前开始我就一直做煤炭生意。”我回答。

“但你现在的经营活动违反了规章制度。”

“我是在出售库存煤，”我回答道。

“你发的货不可能是从老仓库中来的，而是非法购进后再非法卖给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敌方工厂的。”另一个指责道，“我们要检查你的帐簿。”

我试图回避，但他们坚持要查帐簿。

我给了他们一个不聪明的回答，然而确实是事实：“记帐人外出，把帐簿锁起来了。”

“但你是商行经理，你不是要随时使用档案吗？”

我坚持我的说法。这时我的欧籍会计正透过玻璃门往里看，以为这二人是冲他来的，便不安地跑开了。我很高兴看到他离开了房间。幸好，这两个中国人是背门而坐的，没有注意到他。

不久，他们就对我不耐烦了：“拿帐簿还是不拿，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对你进行怀疑，并能证明你的行为。”其中一个边说边拿出我的发货单。这些发货单寄出时一式两份，盖章的归我保管，副本归客户存档。很显然他们已搜查了一些工厂，我的合伙人把发货单交给了他们，也可能是被逼迫交出的。

“你承认是你的吗？”他们质问我。

我无意否定这些货单的有效性。

“既然你拿不出帐本，就非得跟我们去经济警察特别总部接受审问不可。”

事情变糟了。但我还是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去不可，而且我也无意奉陪。

他们大发雷霆，想用武力威胁我。

我需要时间考虑，便暗示同事们离开。同时我站在原地，拒绝挪步。

他们怒骂我，而我仍无动于衷。为了避免强行将一个外国女人拖上警车，他们商量了一下，对我作出了一点让步：“如果你答应明天上午9点能到警察总部来一趟，我们现在就走，不过你最好不要失信。”

我同意了。

这是个难以成寐的晚上，我无法避开时时光顾梦境的恐怖场面，我已对朋友和同事们讲了与警察局“约会”一事，但没有向我母亲透露。

三

第二天上午9点，我来到经济警察总部，一个身着军装的日本人是主角，旁边坐着一些中国官员。

“你是哈什^③小姐吗？”

“是的。”

“你是做煤炭生意的，你的商行名叫‘敏伟’，情况属实吗？”

他们显得很一本正经，起初不得不弄清一些确切的细节，有时拐弯抹角地提一些不相干的问题来制造紧张气氛。当他们认为我已精疲力尽时才涉及正题，审问由低级的提问上升到高潮：“你知道你违反了日本皇军颁布的法令吗？”

“我没有在生意中犯什么法。”

“你认识你的发货单吗？承认是由你签发的吗？”

“是我签发的。”

“那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知道规章制度。”

“什么规章制度？”我问。

日本官员勃然大怒，不加思索地吼道：“不要装腔作势，你很清楚商业经营的现行法规！”

我坚持说我的经营行为是正确的。

他气得面红耳赤，大声吼道：“你很清楚煤炭应由政府垄断经营，分配给需要煤的工厂，你却非法购煤进城，再提供给那些被勒令关闭的工厂。”

“为什么要歧视那些工厂？”我问。

他显得很难堪，凶恶地盯着我，大声叫嚷：“你敢批评日本皇军和他们制定的决定法令吗？他们的决策是神圣的，是绝对可靠的，你是什么人？敢反对这些政策？”

我毫不示弱，因为直觉告诉我，表现得勇敢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也发怒了，脱口而出：“好一个‘共荣圈’！你们因此而使数十万工人失业。你们不可能创造繁荣，只会制造混乱和无政府主义，我真怀疑到时候你们能否控制局势！”

我似乎是在自投绝路！日本人捶手跺足，脸色灰青，用日语发出刺耳的惊叫，我没有听懂。周围的中国人被我的反抗惊呆了，一个个瞪视着我。我想这下子肯定要被送进黑屋子了。尽管如此，我必须保持镇静。我站在原地，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混乱一会儿就过去了，接着他们争论开了。讨论的内容，我一无所知。

过了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很漫长），有人对我说：“询问到此结束，你这个不驯服的家伙，现在可以走了，今后不要再做这种生意了。”

我获得了自由，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时，我几乎没有动弹。

过了一会，才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跑回办公室，跟我的朋友们讲了事情的全过程，我们聚在一起分析那个日本人的言行。有人指出，日本人总是杀戮无辜的百姓，于是老百姓看到日本人就惊慌地逃跑，或表现得十分恐惧。审问我的人被出奇不意的反抗弄糊涂了，气昏了头，以至不知所措。我并没有撒谎，我只是坚持自己的权利，不过也许我触及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共荣圈”，他们正费尽心机地向大众推销这一神话。

每个人都认为我应该为无罪释放而高兴，建议我不要再继续经营煤炭生意而冒犯经济警察。但我不赞成这种看法，并决定不再偷偷摸摸地做生意。即使再被抓住，也要表明我是在对日本人制定的“法律”公然反抗，而不是在偷偷摸摸做什么“违法”的事。

四

上海的境况明显恶化，大批商品被运往日本而没有任何进口，这种单向贸易给上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昔日丰盛的仓库被掏空了。日本人主要掠夺食物和金属，食物用来喂养日本人，金属用来制造武器；由于汉奸和告密者带路，日本人连城里隐蔽地段的小仓库也不放过；至于中立国的物品，日本人则按他们定的价格“购买”。

整个城市只得拿尚可动用的库存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屯积和投机导致物价上涨，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更加剧了价格的上涨。货币大幅度贬值，人们宁可要商品而不要钱币。每月650美元的巨额房租现在看来已不算什么，房东经常为与我们签定了固定的房租合同而后悔。工薪阶层受到冲击最大，薪水的增长幅度远低于价格的上涨。货主看到商品抢手，颇感得意，他们只需坐待价格上涨。

街道越发污秽，难民们饥不择食，露宿街头的人们死于饥寒之

中……，一片惨不忍睹的情景。

坏消息传来，盟国的侨民（“敌侨”）都被送往郊区的龙华集中营。集中营很大，可以容纳2000名难友。他们可与城里仍“自由地”生活着的朋友亲戚联系，也可以离开集中营去看专家门诊（如果集中营的医生不能治疗的话）。他们的信件由瑞士、法国等国传递。

集中营由一个日本司令官和十多个警察监管，他们还挑选一名难友监督营中事务，这比纯粹由军队管理要好一些。营内的行政管理是自治式的，难友们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了劳工营，专门负责劳动力的分配。有的人被派往厨房，有的被安排从事卫生工作。他们还为孩子们开办了学校，成立了自己的娱乐小组以及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一旦有难友得了重病，就被送进市内医院。他们的拘禁生活一直沿续到战争结束。

集中营地处市郊，难友们得以与游击队联系上，一些勇敢的单身年轻人率先与一支游击队碰了头并大胆地逃离了集中营，前往重庆或昆明，途中要通过大片敌占区，尽管他们是白种人而很难混入中国人中，但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

为了消除意大利投降^④对上海人产生的影响，也为了对抗苏联电台的广播，日本人拼命宣传希特勒演讲的内容；意大利退出战争没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在整个战争中意大利都由德国支撑。

比较苏联电台和日本新闻媒介两者广播内容之间的差异，我们得到了安慰和鼓舞。日本电台说，德国人的失败微不足道，他们的节节败退是“聪明的战略技巧”，而苏联的失败则是举足轻重的。

朋友们在晚会上相聚时，常演出滑稽小品，讽刺日本人的丑态和日本宣传机器的谎言。

苏联电台说，德军已调集了最后的后备力量发动猛攻，但进攻马上就被挫败了。我们曾为盟国遭受的损失难过，也为遭难的国

家悲哀,但现在听到战争已出现转机才松了一口气。

五

1944年年初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押送煤车的雇工打来的。运煤卡车在路上遭到警察的阻拦,说要审查票据,结果发现随货单据属于一家未经军队批准的私营商行,于是连人带车被拉到了警察局。

我曾指示过我的雇员,一旦有麻烦立即通知我,那个人在惊恐中从警察局给我打了电话。

我立即赶到,只见卡车停在院子里,我被领进一间房子,等待发落。一路上,我就暗下决心不要再发火,于是克制地坐在那儿。好长时间过去了,还是不见人影,我主动走进大厅,追问他们有关煤的事情,他们避而不答,只是叫我继续等。又过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动静。他们企图用悬而不决的办法让我沉不住气。如果我离开警察局的话,立即会遭到阻拦,如此受屈,那太没意思了。所以我只能竭力忍耐,而没有其他选择。

几小时后,终于有人来叫我去大厅。正如我所料,一个身着军装的日本人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些中国警察。他的英文很糟糕,却也够用。老一套的审问开始了,但我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客户的名字已清楚地写在发货单上了。他宣称我犯了一系列“罪状”,表明他很了解我的活动情况。最后他问道:“你难道还不知道你已违反了日本皇军制定的法律吗?”他又一次滥用那神圣的名词。

“我是在做正当生意,跟战前一样经营煤炭。”我简单地答道。

“不要回避我的提问。”他扯着嗓子警告我。

“我被搞糊涂了,你们曾声称欢迎中国出现新局面,要发展独

立的工业，鼓励合法的商业活动以改善整个经济。”

“我们不是请你来辩论的。”他嘲讽道，双方都有些沉不住气，“现在是战争时期，一切经济生活必须以计划生产和计划贸易为基础，日本皇军对煤炭有垄断权，你很清楚这一点。”

我去时还决定小心从事，但面对日本人帝国主义式的强权威逼，也因自己再无其他帮助，终于被激怒了，便抛开所有的谨慎回答道：“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商业竞争者，也不是日本皇军的对手。”

他听出了我对他的讽刺后，连英文也讲不连贯了。他极度愤怒，嗓门也提到了最高点，最后站了起来，指着我大声吼道：“没收她的煤！”说完，便大摇大摆地出去了。

中国警察不吱声，一个个惊呆了，其中一个跑到厅外传达命令。我等了一会儿，没有再听到有什么关于我的指示，才大胆地走出屋子。

当我走过院子时，他们已开始卸煤。那时产煤地区都在打仗，煤价很贵，而且货物很难搞到，做煤炭生意亏损，实在是巨大的损失，不过，这次的损失与本可能发生的灾难相比还不算太大。

六

我和朋友们都无法解释这次“宽大处理”的缘由，然而，他们极力建议我改做些不规矩的生意。当时很流行诈骗和投机倒把，有些人在沉重的负担下，变得精明而且诡秘，是无与伦比的诈骗能手。他们会巧妙地在进口罐头里装些垃圾后，重新焊接，搞得天衣无缝；或者在进口酒类中掺入有色水后，再狡诈地封好口；或者干脆制造假药。而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玩的一些小玩艺儿，他们在大笔买卖中也常耍花招。

煤炭是份量重而又昂贵的商品，一般按计划分配，但也有人通

过非官方渠道购进，待煤价上涨再卖出。煤炭不易移动，其买卖大多数是发货单的转手。煤炭的替代品日益稀少时，这种投机生意更赚钱，采用此法的商人自然能获得较一般生意更高的利润。我可以被迫采取这一做法，不是为了发横财而是为了对付面前的困境，然而那样做将改变我的初衷——一向被列入黑名单的工厂提供煤炭。鉴于此，我决定还是按老规矩做生意，尽管没有人赞成我作出的这种有远见的选择。

敲诈勒索日益猖獗，我不仅要对付日本人，还要对付黑社会的流氓。在我们运煤到黄浦江对岸的工厂的途中，海盗经常要收下“买路钱”之后才放行。他们放肆而狡猾，从未被日本人逮到。而且，船夫在装卸煤炭时，会故意将煤弄到江中，一到黄昏便潜入水中取出昂贵的煤炭。

日子变得非常无聊，世事变得相当不协调，目睹日本人所谓的“天堂”，我满怀忧伤。

集中营的食品配额日益减少，虽然不能说那里的人们在挨饿，但食物供应情况确实不如以前了；在贫民窟，食品来源很成问题，发病率不断升高。

战争不会马上结束，我们只能通过讲述有趣的故事来相互鼓劲。社会上流传着很多有关日本人的恐怖故事，他们的狂妄自大恰恰构成了我们取之不尽的话题，我们尽情地讲故事，以此逃避现实。

七

一天，日本宪兵传我去总部，这次面对的不是日军管辖的中国警察，而是可怕的日本宪兵，我想肯定是凶多吉少！

大厅里，一组宪兵怒目瞪视着我。问完例行问题后，宪兵头目

开始数落我的“违法行为”，说我无视法律，肆意违反法规。他们的把戏，我早就领教过，这种数落仅仅是前奏，在涉及正题前，他们总要拐弯抹角。

“你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已经同盟国一起反对我们正在创建的‘新秩序’，他是个叛徒，反对日本和汪精卫等中国盟友一心要实现的崇高理想，所以，你也是叛徒，你知道当叛徒有什么后果吗？”——最后一句话是含沙射影，他不是针对煤，而是暗指更严重的问题。

“你甚至在做更坏的事，你企图为敌人搜集情报！”

问题太棘手了！他们已掌握了我们的情报传递活动，我纳闷，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我现在显然处在不利的地位。在煤炭问题上，我还可以反抗，因为整个经营过程都是公开的。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示意我必须回答。于是，我大胆地站起来说：“我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想你清楚我的意思。”他立即反驳，眼睛里充满了恶意。

我昂首挺胸，一言不发。恶意的目光始终盯着我不放。

“既然你说不知道，”他说：“那就由我告诉你，你串通一伙人向敌人提供情报。”说着，他青筋绽出，一脸怒气。

“我有那么重要吗？”我笑着问，略带嘲讽的口吻。

“你不要装蒜，我要知道你们是如何勾结的。”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回答。

他猛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我的眼睛不自觉地眨了一下，但还是稳住了。接着，他便大骂我。

他开始缩小提问范围：“如果不了解整个过程，你该清楚跟哪些人联络，联络些什么。”

我意识到如果不回答，那将是默认。

“那实在令人为难了，我确实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能找话来应付他。

“你是不想坦白，”他阴险地说：“只要你全盘托出，你和你的同谋们就能得救，自己看着办吧……”他稍停顿一下，接着又恶狠狠地说：“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

他把话说穿，是为了给我提供松口的机会。如果我保持沉默，事情会变得更糟。

“上一次受审时，我就讲明了做煤炭生意的所有情况，我的商业活动很公开，给客户的发货单也登记得很清楚，煤炭从哪里来，也是众所周知的。你们已掌握了全部情况，再没有其他什么了。”

“不要回避我的问题，我不是在问你该死的煤。”他大声吼道，话里充满着威胁。

“那么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敢拒绝与宪兵合作！我们想引导你走光明之路，而你却陷于泥潭不愿自拔，这样非遭惩罚不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走阳关道！”

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假仁假义！

“对不起，我不能苟同尊见，因为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这下，我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又招来一阵毒骂后，宪兵司令命令我到侧厅去，好象永远不要再看到我。

我走进指定的房间，里面很黑，空荡荡的，就象个小囚房。我找了一张凳子坐下，使自己平静下来。

两间屋子的差异之大，让我不可思议。光线充足的大厅里，凶神恶煞的宪兵随时准备逮捕我；而阴暗的小房间中，只有我孤身一人。大厅里，我使出浑身解数保持警惕和坚强，而现在只能在内心独白。这显然是敌人设的圈套。我刚获得片刻的放松，但马上又

紧张起来。大厅里，宪兵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好象在讨论如何处置我。

一段时间后，大厅里终于沉寂下来。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恐怖之屋和刑室的幻影也离我越来越近。据说，酷刑前后，罪犯都被关在不到一人高的铁笼子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我感到现在的小房间就是通向铁笼子的过渡。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门忽然打开了，只见一个宪兵站在门口。我微微动了一下，意识到严峻的考验即将开始……

“你可以走了。”他说。

“走？”我大吃一惊，差点问去哪儿。

“走！”他回答很简单，就好象如果我不赶快走的话，他们会改变主意。他做了一个手势，叫我走通向街道的那个出口。

我穿过院子走到大街上，似乎从我走进这个院子到现在已过去了好多年，我感觉不到外面是冷还是热。我开始还觉得很奇怪，继而转入了迷惑，我真正自由了吗？他们为什么放我走？

我还记得宪兵们的激烈争论，我想他们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通过刑罚对我逼供；而另一派则认为我可以经常被找来“赎罪”，而立即对我施刑则会破坏他们的意图。显然是后者占了上风。他们断定我只是中间人，齐先生才是“敌人”的消息源，他们想知道齐先生还掌握哪些情报，该如何防止消息进一步走漏，然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抓到齐先生，只能在释放了我之后，当齐先生再次与我联络时抓住他。

回到家中，我庆幸总算逃过了可怕的灾难，但不知何时恶运会再临……

注：

① 朱迪丝·本-埃莉莎(Judith Ben-Eliezer)父母系俄国犹太人，出生

于上海,30年代初积极参加上海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后成为该组织领导人。日军占领上海后曾为抗日地下组织做工作。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同时,一直从事煤炭等货物贸易。1948年移居以色列。

② T. S. 王,朱迪丝的中国朋友,与重庆方面联系密切。

③ 朱迪丝娘家姓喀什,结婚前的姓名是朱迪丝·喀什。

④ 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向盟国投降,对希特勒德国是一个沉重打击。

陈晓平节译自朱迪丝·本-埃莉莎《上海失去,耶路撒冷重获》(Judith Ben-Eliezer: Shanghai Lost, Jerusalem Regained, ZBM Printing Press, Israel, 1985)

亡命上海杂忆

伊斯雷尔·基彭
(Israel Kipen)

一

在我寄居上海的最初日子里，可说是命途多舛，令人百感交集的。我经人介绍去一家制皂厂帮忙，在那里学到了一些有关肥皂制作的知識，我只在厂里干了很短时间。与其他难民一样，我也去难民赈济食堂，与他们一起消磨时光。他们的境遇让我触景生情，痛苦万分。我还只 23 岁，却已当了 2 年难民。我还没有以任何方式建立起我的生活或者说是事业有成，我只得随眼前的生活而逆来顺受——因为我几乎毫无选择余地，也没有积累起值得回顾或津津乐道的昔日成就和辉煌。这就和许多眼下在难民赈济食堂里度日的律师、医生、记者、企业家、商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已不再年轻，他们曾有过在言谈之间老爱重温的成功和引以炫耀的过去，现在却面临着自己无法适从的、被剥夺了往昔声望、尊严和自负的贫困潦倒的现状。

一天午饭后，莱德曼先生^①说他想找我去他办公室里谈谈。言谈之间他是那么地礼貌得体，但又带着些许悲观和惆怅。代表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②的驻沪领事馆已被下令关闭，其人员将前往伦敦，行程交通都已安排好了。莱德曼先生也接受了在那里的一项工作，他只有在物色到某个愿意接管这一难民赈济食堂的合适人选后才肯放心离去，否则他宁愿放弃去伦敦的机会。我率直地对他说，遴选一名继任者应该是没有困难的。他说我并没有理解

他的意思，他已选好了他的继任者，而那人就是我！我坐在那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 250 多名可供他选择的，争着要抢这份差使且又远比我更为适合的难民中，他为什么偏偏挑中我呢？我不住地问自己。何况，除了彼此在擦肩而过时打个招呼之外，我们根本不了解，中间还隔着年龄上的差异。我试图把谈话从我身上引开，但他不容我离题且主意已定，非我莫属！最后我们同意给我一些时间再全盘考虑一下。我开始寄希望于莱德曼的想法只是一时感情冲动，稍后可能就会淡忘并自然而然地消失，因此就有意回避他。几天后他径直前来找我，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的命运可是攥在我的手中。他已必须尽快回覆领事馆下达给他的指令，因此马上要我的准讯。以他对我的信任，加上我自己的良心——鉴于当时难民赈济食堂是那么重要的设施，我已无法回避了。我也知道，在他内心深处因自己将离难民同伴而去一直怀有某种负疚感。

在莱德曼即将启程前的几周里，我和他一起工作，并向他请教我该如何做这一切。我时时处处迎合宗教妇女团体的要求和认可，事实证明要适应该项工作不是容易的。1 周中 6 天时间里我得早上 3 点起床去市场采购。面对大量食物没有冷藏设施，而食物又得每天乘新鲜购置的现实，我必须学会区分识别各类肉食品，并逐渐成了优质活鸡的鉴别行家。市场上有个中国肉铺老板因做清真肉食买卖而学到了不少有关犹太教洁食的繁文缛节，即使宰鸡的小贩似乎也初谙此道了。买米也需要专门的诀窍。上海有条供作大米交易的专门路街，中国米贩们的摊点在路旁排成了行，并打开米袋以供挑选。人们很快就学会从米袋的底部抓出一把米与面上的米作比较。通常早 7 点，所有买好的蔬菜、肉类和大米都已被放上了一张手工刨成的平板上，食堂的炊事人员都已上班并相帮分检料理。他们有 5 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午餐。午餐通常是一

大盘营养浓汤，一道肉类主菜加上些蔬菜，最后是一杯茶。我的工作是全天的，除了上述食物采购和炊事以外，还包括账册簿记、钱款清理、人员管理，与每日前来领受赈济人员的关系，以及与宗教妇女组织应予保持的工作联系等等。晚上还时常被叫去商量专门的问题。哪天晚上我要是“赚”到了4个小时的睡眠就会感到很幸运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从容且不无成功地适应了在这赈济食堂中的工作。我时常惊异，如果妈妈见到我手提家禽并与精明的中国小贩讨价还价会如何感想。当我接手去市场买菜时还在秋天，不必多虑天气的影响。但到了冬天，由于每天要在半夜起床，还要在市场刺鼻的气味和令人心烦的嘈杂声中冻上3个小时或更久，我的身心不啻要受到考验。此外还有许多纯粹经济上的盘算和考虑。预算的拮据是显而易见的，但即便如此，还得顾及难民们日常伙食的起码营养。我不得不在充分利用每一元钱的同时，尽力确保中国厨师所用的所有主配料能被汲取出最大程度的营养价值。那位中国厨师可是个爽直而又和蔼可亲的家伙，并总是随时肯予帮忙，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重荷。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悠久文化的承袭者，中国始终被看作是热心助人、聪明、智慧、富有进取心且又谦让的民族。与他们接触交往很容易，我们深深懂得他们是怎样思想的，每每能预先得悉他们的态度。因为我们充分掌握了他们那种亘古以来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

在后勤辅助部门工作的女士们没有一个属于富裕的家庭，也没有人刻意掩饰自己。为首的波多尔斯卡娅太太，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她的丈夫是慈善机构的雇员，他们与唯一的女儿住在一套窄小的住房里。从保加利亚流亡来后，波尔多斯卡娅太太未作多大努力就得到众人对她的信任。另有两位拉宾诺维奇太太是

妯娌俩。一位又瘦又矮，她的丈夫是《俄国犹太人周刊》的编辑^③。她拥有一家儿童玩具商店，每当她在赈济食堂当班时，总要去那儿就商店的管理事宜作些特殊的安排；另一位身材高大并总是梳洗得很整洁，她是一位建筑家的妻子。至于拉多米斯特尔斯卡娅太太，她也是名志愿人员，与上述妯娌俩沾点儿亲戚关系，其丈夫是位律师，还担任着本社区内一个什么会议的主席。这位太太总是穿戴得俭朴端庄，反映了她生活的朴实方式。我和这些女士建立了亲密和谐的工作关系。我的职务给我赢得了不少好处，尽管其中绝无金钱上的好处。以我在犹太难民社区一个活动中心的有利地位，我一时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大家都认识我。同时，我不但得以结识来此就餐的人们，而且也结识了后勤太太们的全家，以及不断拓展着的俄国犹太人的社交圈子，并开始上他们的会所拜访走动。我的社会地位也由此得以提高。

一天下午，我在食堂当班时，来了两名日本官员，声称要和主管者谈谈。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料理一些文书材料，就请他们进来说话。他们出示了证件，原来是秘密警察。其中一个在询问了“有多少人在此就餐”，以及“本食堂除赈济难民外还涉及哪些其他活动”后，话锋一转，即称食堂事实上已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活动的庇护所，它原先依附于英国犹太人组织，根据日本的法规推理，构成了犯有从事敌对国活动的罪名。我竭尽全力就食堂在维持难民最低程度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作用予以解释，那位官员根本不屑理会，他一再重申他的那番指责，绝少松口。我一次又一次地力辩，赈济食堂的作用仅仅在于向那些力求生存的难民提供食物，而绝无政治因素，在波兰，许多人从民族角度看已被同化，他们对有组织的犹太生活已没多大兴趣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日陷孤立，事实上已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不同方式的抵制。显然这番话使其中

的一个感到厌烦不堪，他转身向我嚷道：“你难道指望我们会相信，世上竟还存在着不想拥有一个自己国家的犹太人吗？”我引述的事实对他显然是对牛弹琴。作为一名大日本民族主义分子，他感到这种可能性是难以想象的，不合情理的。限于有限的英语沟通，我无法以事实使他信服，只好在坚持立场的同时邀请这两名日本人过些天再来亲身体验一下自己的臆断有多荒谬。

当他们离开时，我已精疲力尽而又忧虑重重。这倒不是因为食堂被牵涉到了什么值得害怕的活动，而是我们已被置于政治监视和官方的怀疑之下。这件事给我们大家揭示了危险的凶兆。我越想越觉得此番的不速造访，不应与正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所有其他事件分割看待。那仅是一场正在向我们袭来的更加狂烈风暴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我向社区的负责人士专门提供了一份报告，并赢得了他们充分的共识。

二

在塞法迪犹太人难民社区中，与此类似的情况早已是屡见不鲜的了。自1941年年底日本侵占上海租界以来，构成该社区最大主流的英国臣民们早已被关照紧缩他们的业产，并为一旦在日军占领时期被作为敌对国的国民而遭囚禁作好准备。嘉道理先生一家在被囚禁问题上还遇到了一个额外的难题。他们为在虹口的德国犹太难民提供资助并建立了一所犹太人学校^④，共有大约550名学生。在遭囚禁的前夕，嘉道理先生前往俄国犹太人社区求援，要求他们帮忙接管这所学校。该提议在当时是个敏感的问题。而且俄籍犹太人中并无犹太教育方面的专家，对如何管理学校及评估这方面的工作茫然无措。当得知我是希伯来语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后，他们立即邀请我参加对该校的视察。

我们由艾利斯·嘉道理先生^⑤引导在学校里巡视了一周，那是幢带有宽敞教室的现代建筑，比我以前所见过的其他中国学校要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偶尔走过一个正在上希伯来文课程的班级，只见有个头带犹太无沿便帽，手执一本希伯来语启蒙读本的瘦矮老师正对着十来个头带同样小帽的学生授课，内容尽是一些树啊鸟啊之类的。我一时好奇，在这个教室前逗留的时间长了点儿，此举或许使陪同参观的主人感到了不悦。临走时我问主人，为什么唯独这个班级的师生头带犹太小帽，而别的班级里的师生却不然呢？再说上课的内容也非宗教，只是些花鸟树草等世俗东西。这一提问使我们的主人顿时感到尴尬并哑口无言，良久才喃喃地说道：“除了照搬在英国教授希伯来语的那套程式外，其余我们也说不清。”我听后心头一怔，旋又不禁怀疑起在不同大陆、不同形势下还在传授这类无关紧要的知识到底有多大价值。但不管怎样，最终我还是支持了由俄国犹太人社区接管该校的设想。

在虹口期间我们决定去拜访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并顺便参观一下离那不远，被称作“海姆”的难民之家。那里每天要供应大约5000客饭菜。随着形势的日渐恶化，饭菜的热量已下降到1350卡路里。该委员会还维系着一个争取社会声援的广泛网络，以各种方式帮助多达7000人的犹太难民，占聚居虹口犹太难民的一半。我们在那里受到了周到的接待，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周详的答覆，接着又被邀请参观了难民宿舍。被辟作宿舍的建筑原来是幢货栈仓库，现在挤满一个接一个的双层铺。大白天里，人们不是躺在狭窄的床上消磨时光，就是聚在下铺百无聊赖地玩纸牌。

三

1943年2月18日，又一个打击以战时文告的形式向我们袭来。文告命令所有难民都必须搬到许多德国犹太难民刚到上海就居住的位于虹口的一个狭小的指定区域里。那可是远东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论合法与否却实际存在的犹太人隔离区。虽然在新管制下日常生活变得更压抑更艰难，但与根据德国本土针对犹太人的更为险恶计划而在欧洲发生的一切比较起来，这还算是小事一桩。

负责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事务的盖世太保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曾是德国在华沙的秘密警察头目，被称之为“华沙屠夫”，素以凶残杀人著称。1941年他被派来远东督察非犹太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效忠情况。1942年年中，他来到上海协助日本人“解决”犹太人问题。抵沪不久，他旋即向日本驻沪副领事和犹太人事务专家柴田以及难民事务办公室主任久保田勤二人透露了有关难民问题的具体计划。有关梅辛格计划的详情，柴田有意向上海犹太人领袖泄露该计划的过程，以及随之而来旨在挫败该计划而采取的对策等种种惊险曲折的经历，在托克耶和斯沃茨合著的《河豚鱼计划》一书中^⑥有详细的记载。对此事的回忆使我回想起与我熟悉的俄国犹太人社区领袖鲍里斯·托帕斯，一位自尊自信且令人难以忘怀的汉子。他为使梅辛格计划最终付之东流付出了极高的个人代价。他与其他一些领袖们一起被捕，但却是唯一遭到关押并饱受日本秘密警察严刑拷打的俄籍犹太人。当他被释放时，我几乎已认不出他来，他的脸被打得变了形，整个身心被折磨得衰弱不堪。

现在我负责的那个难民赈济食堂只好解散了，它已经完成了

它的使命。但若以当初首创该食堂的莱德曼看来，许多每天来此领取午餐赈济的犹太人恐怕就难以捱过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寒冬了。

根据 1943 年日本人的文告，新的难民事务办公室在虹口建立，所有难民的登记、申领签证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务都必须在那里递呈办理。执事的日本官员表面上以文职的面貌出现，可均以绝少怜悯的军国主义野蛮行径处理事务。为首的家伙是个名叫合屋的虐待狂，总是怒气冲冲地嗜好皮肉暴力。他对难民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容不得他们对他一些突如其来的古怪念头，反覆无常的决定，乃至暴乱的行为有半点申诉的余地。他那个名叫大仓的助手更是专门拳打脚踢，动辄处人以监禁乃至死刑。难民们在监狱深受伤寒的袭扰，不止一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乃至死亡。

早先住在法租界时，波兰犹太难民曾制订了独立的计划，而在虹口，他们尚不足整个难民人数的1/10，只得依靠专为全体犹太难民利益建立起来的救援组织。然而，他们中许多人一再向众人表明了自己我行我素的独立和桀傲不驯的脾性。总体说来，波兰犹太人并未投奔或求助于难民社区的宿舍，而是因陋就简，竭其所能地建立自己的临时住地。他们在文告颁布之前即从与之有生意联系的本地常住居民处谋得了职业，并获取了到隔离区以外地方工作的通行证。

四

当时上海的俄籍犹太人有 4000 人，普通的医院都远离犹太人聚居的法租界，相当数量的犹太家庭不堪承受昂贵的药品和住院费用，为此需要一所能对穷人实行减免的医院。说到底，建立犹

太人医院和其他一些服务性机构是难民社区自我救助思想的产物。

我们刚抵上海不久，俄国犹太人曾在法租界开设了一家犹太人医院（今五官科医院）。医院座落在毕勋路（今汾阳路）上，原属天主教会，后来被波兰外交使团占用，当时因战争空关着。犹太人社区花钱租下，建立起一所拥有60张病床、1间外科手术室和其他辅助设施的医院。医院主楼四周环绕美丽而开阔的花园，环境十分幽雅。日本人颁布隔离区文告时，医院由一位波兰中年难民管理，董事会对其表现不满，加上凑巧赈济食堂关闭，于是我被委以医院总管。作为任职条件的一部分，我在医院享有一间住房，全部伙食供应以及现金支付的薪俸。虽然日军的迁移文告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包，但它也不得不允许一项例外，即在医院工作，且拥有医院住房者可得到豁免并留住在其工作原处。由此，正当大多数犹太难民被迫迁往限制重重、拥挤不堪的隔离区时，我却搬进了毕勋路的花园住宅，开始满怀热情地致力于新的工作。

医院由荣誉董事组成的董事会领导，董事长艾萨克·克利洛维奇·卡根，来自里加，住在对面可以俯瞰医院的一套现代公寓里。他确信自己是医院毋庸置疑的老板，每天早上去闹市写字间上班前总要在医院露一露面，随便什么事情只要引起他的注意，他都要到场，因此事无巨细都逃不出他的眼睛。副董事长西蒙·利伯曼为人谦恭且比卡根年青，曾是位专业会计师。他那平和的脾性与卡根的急躁形成鲜明的对照。董事会掌管钱财的是西特林先生，举措文雅却略显迂腐，他那盛气凌人的灰发太太则是医院妇女组织的主席，专门负责厨房和房屋维修。

医院医学主管斯坦曼博士，祖籍波兰，他充满活力，平易近人而又富有幽默感，每天查房两次，经常在跑动中连珠炮似地发布

指令。住院医生克林格博士和他的妻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战后回到德国。护士长维拉·亚历山大罗芙娜从西伯利亚经由哈尔滨来此工作，长得短小精悍，一头银灰头发，对护士管束严厉。出纳员尼娜是年青妇女，后来嫁给了希缪尔·伊雷，定居美国巴尔的摩。会计师库巴·克罗宁伯格，我曾同他及他的太太一起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开往日本的船上呆过，他后来改名库巴·克朗希尔，定居澳大利亚墨尔本。尼娜、库巴·克罗宁伯格和我，碰巧都来自波兰，这一点恐怕是十分有趣的。

医院汇集了许多杰出的德国犹太人外科医生。马库斯博士身材矮小，总是乐呵呵地充满了幽默，嘴里老用口哨吹着一段什么古典名曲，作为一名小有名声的业余音乐家和乐队指挥，他给人以音乐是他最大爱好的强烈印象。而他所作的外科手术就象是在制造一个新的生命。另一位出色的医生海尔博恩博士，一位沉默寡言而略显孤僻的清秀长者，他那儿似耳语的说话，使助手们得绷紧了神经，凝神屏息地聆听他的每一句话而唯恐疏漏一个字。两位布伦戴尔医生也很有意思，他们是兄妹俩，都未结婚，是上海的常住居民。哥哥趋于保守，而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妹妹却天性活泼。这倒不单由于她容貌如此，她总爱一身中国式的装束打扮，并以她专业上的某些问题开玩笑。放射科主任医生是位俄籍犹太人，药房间则由一位德国犹太医生及其助手，波兰小伙子勃拉特负责，他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

我在医院颇为顺手，只是干些有关房屋管理的杂事以及经常保持与医务人员的联络。此外我还得与董事会和妇女组织处理好公共关系。我得经管簿记帐册，留意库存积储，通过医院的督工监督中国雇员，并和负责厨房事务的厉害的俄罗斯犹太老太在厨房斩肉糜，当然她并未要求我这么干。那地方可是个流言飞语四起的

是非之地，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大家，给终日忙碌于日常琐碎之事的人们增添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与董事会、妇女组织成员的个人关系仅限于工作联系，绝少超越早先在虹口难民赈济食堂里的那种社交范畴。劳累了一天，谁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交际应酬。偶尔时间允许，在和煦的阳光下与姹紫嫣红芬芳郁人的百花丛里，我则躺在花园的长凳上偷闲小憩一会儿，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严酷事实。

五

在上海度过的犹太新年给我留下了很多回忆。波兰犹太难民波德拉比内克先生，曾是波兰比亚利斯托克·考拉尔犹太会堂的祈祷领诵人，那年被上海犹太人推举为领诵人。在那远离世俗尘嚣的难民社区里，他的出场被当作一桩大张旗鼓的事而张榜晓谕众人。新年前夜，会堂装饰得庄严肃穆，领诵人波德拉比内克那雄浑的嗓音，加上教徒们齐声的吟诵在整个会堂盘旋回荡。其中有些人从未体验过这种宗教的神圣。仪式结束时，人们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一位妇女神采飞扬地比喻道，领诵人的表现与其说是在主持一场宗教仪式毋宁说是在演出歌剧，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我也给深深地被带入了在家乡时那种曾经熟悉的同类仪式的动情之中。

波兰犹太人还以许多别的方式为上海犹太社区作出了奉献。意第绪语作家、评论家和散文家耶霍舒瓦·拉波波特先生，与我一样，也来自波兰比亚利斯托克。他操一口流利的俄语，与难民相处融洽，并经常给由拉宾诺维奇主编的《俄国犹太人周刊》撰稿，偶尔还上犹太会馆演讲。一次谈到历史上犹太民族种种特殊经历时，他兴奋地说道：“大家看看我吧！我是一个以犹太人通用语言进行

写作的意第绪语作家。然而，今天我置身喜欢阅读我作品的广大朋友之中，为了使大家容易理解，却不得不将它们翻译成一种外国语。那就是困扰着整个犹太民族的流离颠沛和文化同化悲剧的症结之一。”这番话语至今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其深层的确切性和意义并没有完全切中问题的要害。他后来移居澳洲，也卓有成就。

至于我与失散多年家庭的联系，只是保持了与母亲时断时续的通信。为了便于我的明信片能顺利通过检查，我都使用俄语。战时邮政和其他服务多陷于瘫痪，我对通信根本没抱多大奢望，我的俄语口语相当流利，而文字书写却是另一码事。当我八九个月后接到回信时，方才知我的那些信着实使邮检官和全家（母亲和弟妹）哑然苦笑。我在信中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天真无知和对他们境况的不了解。我曾问起他们怎样料理犹太教规肉食，这除了勾起他们的苦笑和眼泪之外还能有些什么呢？当时他们住在防空洞里，仅靠土豆和少许别的什么东西充饥。各人凭籍智慧和生存本能在听天由命的逆境里苦捱苦熬，更兼身处异国他乡，遭遇着不解人意的恶劣天气……。

1944年初，我在医院干了逾一年了。我工作得很勤奋，特别是有激励人心的消息说，战事正朝着更为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团圆……，这些都激起我要对他们多承担些义务的责任感。我的手头已渐宽裕，还能暗地里从事一些生意增加收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犹太皮货商制作的皮外套的褐色衬里缺货。我跑遍了南市的中国地界，与可靠的供货商联系，并在医院里囤积。我在生意上越是投入，也越益开辟了新的联系途径，从而带来了额外的机会。

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美国海军随即开进了上海，生活出现了转机，美元一下子成了流通的货币。美军急需货物补给，人们很快学会了勿失良机投其所好。我也不甘落后地卷入了这股风潮。医院放射科主任有他自己的诊所和实验室，一天我邂逅他的一位合作人，他向我提议，为解决业已上岸的数千名美国大兵对杯中物的馋念，可用蒸馏法提取酒精。实验室设备齐全，正好生产。为了不被人看到他们在从事不属本职的活动，他们有意请我去管理。我已记不清这一交易的具体条件，只记得我顺便还“搭”进了我的一宗生意。我每天要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蒸馏过程本身并不耗费多少时间，问题是在酒的提纯阶段必须使用一种特别原始的手工方式操作，即全部液体须流经一个装着木炭的帆布袋子筛杂提纯。这项工作我没干多久，但它向我提供了生存的另一种机会和在适当时机离开医院可具备的额外本领。

这时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战后难民振兴机构，帮助难民遣散或找寻去处。该机构工作得相当出色。我也需要为自己的去向作决定了。我1939年离家时，本意是要去巴勒斯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诸于自小的熏陶和信仰。1940年途经维尔纽斯时，我曾给希伯来大学寄去我在大学里的论文，希望该校能予录取。时届1945年，当降临在犹太人头上那骇人听闻的恐怖行径为举世所震惊，而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主张更为人们所接受时，巴勒斯坦再一次成为我的首选目的地。但当时意欲移居巴勒斯坦的移民却不得不等待，我被迫面对接下来的另两个主要选择：一个是去智利我的堂叔家；另一个则是去墨尔本我母亲的表亲里芙卡·多黑维奇家。我给两处都写了信，任由天命挑选第一个来到的回覆，

殊不料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澳洲，毕竟我不喜欢在南美生活，可冠冕堂皇的正式理由却是我不想通过与堂叔家的亲属团聚来接受恩赐。我给两家都写了回信，接受多里维奇一家的邀请，并以我的名义申请移民准许；同时感谢堂叔一家的诚意助人，请求他们对我父亲及全家在他们需要之时能及时予以慷慨的帮助。

来自澳大利亚的文件到得异乎寻常地快，同时附来包括购买机票等一切手续。总共有 27 人准备前往澳洲，多为中老年的德国犹太难民，唯一的一个波兰家庭是库巴·克罗宁伯格、他的妻子莉尔卡和他们的女儿伊莲妮。大家推选由我领队，把所有的文件都交付给我保管。随着启程日期的日益临近，突然有一个叫莫蒂·罗申斯基的来找我，他是上海的常住居民，娶了我的一位也是难民的同学为妻，坚持要借给我 500 美元，言明随便什么时候归还都可。我并未预料到他的这一姿态，但不管怎样还是高兴地收下了。有了这笔可以由我支配的钱，我灵机一动萌发了一个想法，即预先向澳洲方面订购一批价值 500 美元的绣花桌布，俟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再交验付款。我们的行程共分两个阶段，自上海飞往香港，再乘船去澳大利亚，至于船票只得听任香港方面航运公司的安排了。

我是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离开上海的。自从离开维尔纽斯以来，我所结识的许多朋友已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共同的命运使我们相聚在了一起。另外，还形成了象罗申斯基借钱给我的那种联结纽带。

在离开上海前的几周里，上海的政治气候更加蓄势待变。作为难民，我们虽然并不完全清楚当时正在演绎的中国内部事务的那种高度的利害关系，但我们确实领悟到旧政权现在已摇摇欲坠了。统治家族正充分利用它残存的权力，但这一切却丝毫掩盖不

了其地位已变得不稳定和岌岌可危的颓势。波兰难民中一些聪明乖巧的生意人此刻正以异样的目光在注视着我，我的影响力和从事过的职业长久以来使我成了个谜样了不起的人物。在有教养的和专业人士看来，我是个生意人；而在生意人看来，我则是个学校老师（严格地说是个名不符实的老式教书匠）。事实上他们的评价都有其合理之处，每一群体都感到能与我融洽相处。在他们各自的社交圈子当中，我都能尊重和顺应他们的规范和处事原则，即使在面临对生活中不同价值观念和理解的歧见时也是如此。仅就这一点上来说，他们都声称我属于他们中的一员。随着启程日期的日渐迫近，一些对我决意离去大惑不解的人开始想从我身上探询对时局的看法，愿意在不排除我的行动仅是年青人充满幻想草率行事的基础上，听听我经过反复思量过的计划打算。还有人要我抵达澳洲后给他们写信，详细介绍那里的情况。

上海的俄国犹太人社区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经历着战后百废俱兴的繁荣。尽管也不失对未来的疑虑，可他们却默守陈规全无应策。以我对时局的估计看来，冥冥之中远不至于悲观。我已领略了时局能如此迅速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经历。象先前站在自维尔纽斯开往莫斯科的火车车窗前，及后来离开日本时的心情一样，我内心充斥着一种浓烈的对上海的怀念之情。我将再一次告别我生活的一部分，在那里我度过了3年半^⑦的光阴。

1946年5月的一个早上，我们被指令于清晨5点钟在南京路外滩的拐角处集合。天出奇地冷，我们穿足了御寒的衣服，等了一个半小时，才乘上了去机场的公共汽车。我们搭乘的是蒋夫人拥有的国泰航空公司属下的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大家缄口不语，带着期待和迷惘离开上海飞往香港。

注:

- ① 莱德曼先生是难民赈济食堂的负责人。
- ② 1939年9月德军占领波兰后、波兰政府流亡到伦敦。
- ③ 此处指俄、英、意第绪文杂志《我们的生活》主编戴维·拉宾诺维奇。
- ④ 即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见本书《上海避难地》注⑤。
- ⑤ 劳伦斯·嘉道理勋爵的叔叔。
- ⑥ 此书已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 ⑦ 原文如此。从前后文看,作者应在上海度过了近5年。

陈无忌节译自伊斯雷尔·基彭所著《颠簸人生》(Israel Kipen: A Life to live, Chandos Publishing, Burwood Victoria, Australia, 1989)

特别使命——帮助犹太难民进上海

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①
(Zorach Warhaftig)

一

1941年3月7日，初到上海不久，我在给妻子的明信片上这样描述我对上海的印象：

“总的看来，上海是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地方。……在街头每天可以收拾到约40至50个小孩尸体，他们的父母为了逃避安葬费而把他们抛尸街头。在冬天，每天约有80至100个人冻死。上海的劳动力不值钱，一个熟练司机月工资为35元，合4美元，而一个店员月工资只有30元。

“白天经常能看到乞讨、偷窃和抢劫。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能看到如此明显而令人不安的社会差距。苦力与百万亿万富翁一起生活，街上到处有歌舞餐厅、夜总会等，穿着名贵服装、坐着豪华轿车的富人和衣着褴褛、打着赤脚的穷人混在一起。我走进一个中国家庭的住房，吃惊地退了出来，它还不如一个狗窝。

“想起我们打算把难民带到这个城市，我的内心就充满着不安。”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和港口，上海当时被划分成4个区：(1)华界，由中国政府管辖，居民都是中国人，没有外国人，也不允许外国人(包括外国难民)迁入；(2)日租界，由日本直接管辖；(3)法租界，是上海的高级地区，建有租金昂贵的豪华住宅。多数犹太人住在这

个区，有塞法迪犹太人，也有阿兹肯那齐犹太人。法国投降纳粹德国，并建立了维希政权以后，该区就不准犹太难民居住了；(4)公共租界，由包括几个西方国家领事在内的上海工部局管辖。

上海的犹太人在 1941 年组织良好。塞法迪犹太人有 700 名，俄罗斯犹太人约 4000 名^②。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巴格达等中东地区，其中有些人已得到了英国国籍。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是富有的沙逊家族，掌握着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维克托·沙逊领导着沙逊家族^③，是上海的富豪，也是远东最富的巨头之一，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举足轻重。他继承家族传统，为本国人做了很多事，也为上海的城市建设做了许多事。除沙逊家族外，还有哈同和亚伯拉罕家族，他们富起来后，就有能力去帮助那些伊拉克犹太移民。

塞法迪犹太人为他们那壮丽的犹太教堂而自豪，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拉比，宗教上的事务就委托给阿兹肯那齐拉比。

4000 名阿兹肯那齐犹太人来自俄国。俄国每次爆发战争或革命，都有零零星星的逃亡者穿过边境，进入满洲，再到达国际城市上海。俄国犹太难民在经济领域站稳了脚跟，成为有一定成就的中产阶级商人。他们也建立了运行良好的宗教和社会机构——会堂、俱乐部及一个浸礼池^④。上海的首席拉比梅耶·阿斯肯纳齐是个俄国难民，身为阿兹肯那齐社团的拉比已近 20 年，同时也被塞法迪社团承认为宗教权威^⑤。

上海的犹太教育水准并不高。当时有一所犹太经学校和一所犹太学校，但并没受到很大重视。较富有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国学校，甚至送到基督教会学校。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阿兹肯那齐难民中表现十分明显，他们有着强烈的修正派倾向。米兹拉基组织^⑥也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核心机构，并随着波兰难民的来到而日趋成熟。

二

上海有一个相当大的德国犹太人社团，人数约 15000 名，这些人在 1938 年年中开始进入上海。他们曾长期等候美国或拉美国家的入境签证，尤其在“打砸抢之夜”（1938 年 11 月 10—11 日）^⑦后，他们竭尽全力离开德国，准备去能居住的任何国家。那时，纳粹当局正在对犹太人施加压力，为了使他们早日离开，还提供有关日本过境签证、船票票价、付款方法及航期的详细信息。

1938 年年中，德国犹太人发现上海是个避风港，这里无需入境签证，于是他们开始朝上海进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39 年年中；其后就受到严格限制了。按照新规定，只有德国当局允许出境，在旅游护照上办过许可手续后，才能得到去上海的船票或赴日本的过境签证。

对成千上万德国犹太人来说，上海本来只是一个临时避难所，他们打算从那儿再到最终目的地。但 1941 年初，在上海的约 15000 名德国犹太难民离境受挫，只能滞留在沪。由塞法迪和阿兹肯那齐社团领袖领导的，得到以美国为总部的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大力资助的上海社团委员会，安排大部分难民居住在日本人管辖的虹口。那儿生活条件很差，一个月生活费仅 3.30 美元，只够每天吃一顿饭。虽然不少难民刚来时带着钱财，但一旦用完就赤贫如洗了。一部分人寻找能雇用他们的任何工作，其他人则干乱七八糟的活。这就是我们正在为成千上万波兰犹太难民寻找的避难所，这些难民还被困在立陶宛和日本而一筹莫展。

在我们到达上海之前，下列一些组织和人士就以电报形式给我们发来了介绍信：耶路撒冷的犹太办事处、纽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瓦德·哈扎拉营救委员会、神户犹太人社团、波兰驻东京大使

以及在东京的波兰救济战争受害者委员会。神户犹太人社团给了我一份介绍信：

“致有关人士：

“兹介绍瓦尔哈夫蒂格先生，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的一位可信赖的代表，代表我们前往上海，以寻求帮助欧洲犹太难民离境的渠道和可能性，特此证明。

“对给予他的任何帮助，我们将非常感谢。”

一封从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移民部发往上海犹太人社团的电报也具有相同的内容。

在上海，我们很受欢迎。我成了梅耶拉比家的常客，这位拉比在犹太人社团中受到人们的高度敬重，他风度极好，其整个家庭成员都参与社团活动。拉比的秘书塔根哈夫脱先生是经学院毕业生，也为救济活动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

我还与社团领袖托帕斯先生和托科钦斯基先生保持着友好关系，后者的儿子约瑟夫·托科以后曾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⑧。这两位先生在俄国犹太人中十分活跃，随时愿意对犹太人提供帮助。

我拜访了几位犹太人社团领袖，发现他们都富于同情心。我们与亚伯拉罕先生曾有一二次一起过安息日。亚伯拉罕先生是犹太人社团的一位领袖，是个观察力敏锐的、富有的犹太人。他的家充满着高尚的文化气氛，在他家过安息日令人难忘。犹太人社团的领袖们在我们与当局谈话时一直陪在旁边。

德国犹太难民组织平时开展充满生机的文化活动。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广播电台，用德语播音。我应邀对他们发表演说，介绍波兰犹太人的悲惨处境，离境时的艰难困境，他们的烦恼与希望，以及有关以色列的情况。德国难民显然被我的发言所打动，几星

期后，我又应邀访问了他们的住所。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患难兄弟似的欢迎。无论是在考纳斯还是在上海期间，我们都经常亲身体会到犹太教格言中表述的真理：“全体以色列人都是同志。”

三

同日本当局接触时，我们与负责上海犹太难民事务的帝国海军犬冢先生和负责治安事务的领事小拔上尉进行了会谈。谈判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让逗留在立陶宛的难民进入上海，另一个是将滞留在神户的难民接来上海临时居住。

犬冢对犹太难民的态度是暧昧的。据后来的报告证明，犬冢大佐是个对日本外交和国防事务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隶属于一个赞成日本与德国之间发展亲密关系的政治派别，该派别也赞同纳粹德国疯狂的“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犬冢本人翻译过反犹小册子，甚至匿名发表过反犹文章。当时，日本正在寻找一条与美国联系的途径，特别是在贸易方面，但这也许是一个假象，以便掩盖日德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犬冢深信《锡安长老议事录》中传播的荒唐说法，即犹太人是美国制订政策的决定因素，所以他试图利用所谓他与犹太人发生的关系，提高日本在美国人眼中的地位。当会见犹太人社团领袖们，尤其是美国犹太人时，犬冢总是尽量使谈话显得亲切和谐。他书桌上放着一个烟盒，上面刻着几行字：“向犬冢大佐致谢，感谢他为美国正统派拉比联合会的成员所作出的贡献。普珥节，1941。弗兰克·纽曼”。我们与他会见时，他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这句赞美语。

谈判中，犬冢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有关滞留在立陶宛和神户的犹太难民的要求。马文·托克耶和玛丽·斯沃茨写的《河豚鱼计划》叙述了我与犬冢其中一次会见的情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犬冢被起诉 1943 至 1944 年期间在菲律宾犯下了战争罪行。在为自己辩护时，犬冢出示了纽曼送给他的烟盒，以证明他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积极态度。最后他被宣判无罪，回到东京，甚至还加入了日(本)以(色列)友好协会。然而到 50 年代，迈克尔·科根揭露了他反犹太人的过去，迫使他中断了与该联合会的关系。1965 年他死于大森。1982 年 3 月，犬冢的遗孀访问了以色列，把她丈夫的烟盒交给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以此证明他对犹太人抱有同情心。我并没有对这种姿态提出抗议，因为我认为她这样做不会得到任何形式的承认。据我所知，犬冢帮助犹太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上海的日租界大门对犹太难民是关闭的，只能通过私下用钱通融，才能偶而得到一张迁入许可证。在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梅耶拉比和他的助手 J·塔根哈夫脱帮助下，我们用这种方式拿到过几张许可证，但每张证件的签发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四

这时发生了在维尔纳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的问题。进入华界是完全不可能的。法租界停发迁入证已很久了。现在只剩下公共租界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所有私人入境证都由公共租界签发。为了保证难民在上海生存，我们须为每个难民交纳 30 美元的手续费，有时还要交纳其它费用。入境证通常邮寄到立陶宛，再由上海的苏联国际旅行社通知其在考纳斯的机构，把入境证发给在那里的难民。

有艘轮船原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直接驶向上海。我要求梅耶拉比帮我弄两张入境证，以便转寄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两个难

民。拉比答复说有些困难，需谋求各犹太组织的支持筹集经费。上海的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领导人给我们写信，同样提及经费问题，说要晚些时候才能拿到入境证。最后，我们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拿到一大批入境证，以便经苏联国际旅行社快速转送到考纳斯。只需得到苏联出境证，难民们就会很快离境进入上海。

作为犹太办事处的特派代表，我们通知上海工部局：只要按我们的名单颁发进入上海的许可证，我们可给这些持证到达的波兰难民签发到以色列的证件。我们也将负责这些难民在沪的生活，直到他们到达以色列为止。工部局官员要我们提供这些保证的正式确认文件。我们打电报给犹太办事处：

“我们能够为至今在维尔纳的犹太人搞到 300 张上海入境证。现要求你们发急电给上海工部局的菲利浦，告诉他按我们的名单签发入境证，难民来沪路费由你们负担。”

我们还打电报给纽约的内厄姆·戈尔德曼博士，要求他通知菲利浦，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⑨将承担难民到以色列的路费。

犹太办事处和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都难以允诺我们需要的经费，因此我们成立了驻上海的巴勒斯坦办事处，3月18日写信通知上海工部局秘书兼督察长 G·G·菲利浦先生：

“耶路撒冷犹太办事处愿在联合巴勒斯坦呼吁会和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协助下，对于将转移到巴勒斯坦，但现滞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的生活费及以后去巴勒斯坦的路费承担责任。”

3月24日，阿兹肯那齐犹太人社团也发出类似的信件，其内容大致为：本社团将接济上海 300 名波兰犹太难民，直到他们去以色列为止。

那时，我们已与各国领事分别进行了会谈。一天，我们应邀参加了一次领事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我和楚帕凯维茨^⑩代表犹太办

事处到会，同去的还有几位上海犹太社团的高层人士。呼吁书由地方社团的一个成员递交，写得较平淡，似乎并未给领事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以一个难民的身份要求发言，想用我那拙劣的英语，为我们的特例再作一次呼吁。我描述了波兰被占领后犹太人突然面临的灾难，以及几千个难民成功地逃脱占领区后所遭到的困难。我泣不成声，几乎不能结束发言。我讲完后，大厅内死一般寂静。我觉得至少有几个领事已被感动。经过短短的商议以后，领事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我成功了！

这一决定由 1941 年 3 月 24 日的一封信所确认：

“先生们，

收到你们 1941 年 3 月 18 日的信，关于允许 300 个波兰公民进入上海，转道去巴勒斯坦的问题，鉴于巴勒斯坦犹太办事处将承担有关人士留在上海的生活费以及去巴勒斯坦的路费，本局同意给予入境证。

秘书兼督察长

G·G·菲利浦谨启”

我们立即准备好了 3 份名单，每份 100 个名字。第二天，我们把第一份名单交给菲利浦，副本交给警察局副督察长 J·罗伯逊。在给罗伯逊的信中，我们再次表明，这些难民将在上海住一段日期，然后去以色列，在上海期间，犹太人社团会向他们提供一切所需物品，不会给城市增加负担。入境证终于签发了。

经苏联国际旅行社，入境证转送到了在考纳斯的难民手里。在空邮入境证的同时，还发电报通知了他们。拿到入境证的人，在当地的旅行社代办处收到电报通知后，就可以安排离开立陶宛了。

办理入境证的费用和个人开支由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支付，但该组织负责人伯尔曼耽搁了提供入境证名单的时间，当时任

向拖延都可能丧失最后逃脱的机会，为此我们拍了急电。最后在我们搞到需要的金额并转送到上海以后，5月3日，组织才打来电报：“入境证费收到。100张入境证分4批空邮寄出……”

我们要求梅耶拉比和委员会帮助难民并监督发送300张入境证。与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协作极为困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回到横滨和神户，设法实行我们的下一步计划。

编制人员名单也不是件容易事。申请避难者人数庞大，我们在很大的压力下工作，不得不尽快作出决定。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入境证送到了拉比和经学院学生手中，但也给了一些立陶宛公民。我们从苏联国际旅行社那里得到某种暗示，一旦大多数难民离开立陶宛，苏联当局也可能考虑让立陶宛人出境。另外，我们在立陶宛的同事们要我们把他们也列入名单之中，有了外国的入境证，对他们最终离开苏联会有帮助。

从4月到5月，在办理过境签证申请高潮期间，许多人和机构要求拿到上海入境证，其中有以色列阿古达特组织^①领袖，有华沙的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前高级官员，有东京的波兰救济组织，有波兰的米兹拉基组织前领袖，有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神户办事处，以及其它许多组织。按照名单，共有400张入境证，其中300张基于3月24日的申请，约100张在上海由梅耶拉比和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取得。大部分入境证依照我们的明细单发放，包括40名流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难民，他们在4月底离开苏联，乘阿克地达号轮船到达上海。

考纳斯的苏联国际旅行社每次收到我们的名单，都会引起更多人来申请上海入境证。有些人离开立陶宛后打算到以色列或其它地方，至少他们可去莫斯科，这样也就远离了将在1941年6月22日开辟的战场。

我们在上海的第二个目标是安置那些到了日本但又不能呆下去的难民。这件事非常紧迫。我们的任务是适当地转移他们，以防日本当局采取我们难以应付的行动。我们需要决定是否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接收和救济波兰难民，向他们提供单独的住所，或者安排他们住在为德国犹太难民建的现成的房子里。

斯皮尔曼先生领导的援欧在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要求波兰难民住到向 15000 名德国难民供应伙食的临时宿舍中，资金由美国的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提供。但有一些重要法律和社会因素要求将波兰难民单独安置。现成的房子位于日本管辖的虹口区，没有日本军事当局的同意，波兰难民无法进入。我们与犬冢和小拔的接触已告失败，波兰难民只能居住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阿兹肯那齐犹太人主要住在法租界，他们极愿帮助波兰难民。此外，德国难民住房条件很差，不知波兰难民能否承受。在我们的支持下，阿兹肯那齐犹太人社团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⑫，下设几个小组处理有关接收难民的经济、财务、医疗卫生、法律及劳工等事务。

我们打电报给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通知他们：“据日本当局要求，转移持无目的地签证的难民是不可避免了，由于法律、技术及宗教上的原因，将他们安置在虹口（日租界）德国难民居住区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成立了一个援助波兰——立陶宛难民委员会，为 1000 名难民租用住房。立即电汇必要的转移费用。”

在给正统派拉比联合会的电报中，我们对马上从神户转移 1500 个难民，包括几百名拉比和经学院学生的重要性作了解释。我们指明了与德国难民住在一起的不利之处，并要求他们立即考虑转移难民的迫切性。

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在法租界租用了住房，并要求美犹

联合救济委员会同意为接收波兰难民而作的安排。此外，还要求为每个难民每月增加 6 美元的资助。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中负责德国难民事务的代表斯皮尔曼，打电报给委员会，强烈反对为波兰难民所作的任何单独的安排。他声称，难民之间的任何类似歧视的做法，都会遇到强烈反对。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坚决反对斯皮尔曼的主张。神户的犹太难民委员会联合上海的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表示完全支持特殊对待波兰难民的做法。

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最终接受了我们的主张，批准了特别委员会处理波兰难民问题的做法。我们着手租下了挑选后的房子，为接收波兰难民做了适当安排。

3月26日，我写信给在横滨的妻子，总结了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昨天，我们提交了 100 张上海入境证的第一份名单，明天我们交第二份名单，第三份名单我们将在日本提交。假如我们成功地从维也纳救出 300 个家庭，就说明我们俩没有白白地长时期分离。我们还做了一些别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我们成立了一个有效的委员会，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承认它，并调拨 3500 美元给我们作为第一笔住房租金。此外，我们把食物邮寄给在华沙和其它德国占领区的亲友们。”

我们回到日本时，明显感到我们的任务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

神户的波兰难民自 1941 年 4 月开始转移到上海。根据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的意见，第一批转移人数为 10—15 名，这样不会引起上海当局的注意。以后每批人数增加到 50 多名。转移于 1941 年 11 月结束，这时正好是珍珠港事变的前夕。

注：

① 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 30 年代波兰宗教犹太

复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与波兰犹太经济学院师生一起逃到立陶宛,后经苏联到日本。1941年以犹太办事处代表身份来上海,救助仍滞留立陶宛和在日本的犹太难民来沪。后经北美前往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全国宗教党领导人,1962年至1974年任以色列宗教部长。

② 大多数材料认为塞法迪犹太人约800—1000名,俄国犹太人5000名左右。

③ 维克托·沙逊(1881—1961),是新沙逊洋行的首脑,上海犹太商界之首富。

④ 浸礼池——正统派犹太教徒在安息日前或妇女行经期后举行洁净礼时所用的水池。

⑤ 梅耶·阿斯肯纳齐拉比(1891—1954),长期任上海犹太教首席大拉比,是上海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其姓也为“Ashkenazi”,为与阿兹肯那齐犹太社团有所区别,这旦译为“阿斯肯纳齐”。

⑥ 宗教犹太复国运动政党——精神中心党的音译,也有图方便干脆称之为米兹拉基党的。

⑦ 1938年11月10日—11日,纳粹党徒在全德捣毁犹太人的财产,到处是一片砸碎玻璃的声音,曾有人按德文译为“水晶之夜”,近来不少译作译为“恐怖之夜”或“打砸抢之夜”。

⑧ 约瑟夫·托科(Yosef Tekoah)后曾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校长等职。

⑨ 美国犹太人组织,专为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筹款。

⑩ 与瓦尔哈夫蒂格一起来上海的犹太办事处代表。

⑪ 正统派犹太教徒的组织,具有反犹太复国主义倾向。

⑫ 该委员会建立于1941年3月,英文简称为EASTJEWCOM。

章建兴节译自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所著《难民和幸存者》(Zorach Warhaftig: Refugee and Survivor, Rescue Efforts During the Holocaust, Jerusalem, 1988)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

威廉·肖特曼
(William Schurtman)

一

犹太难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维持最起码的生存。他们逃脱了纳粹的集中营和毒气炉，但如今面对着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谋生的问题。

在上海登陆的难民中，很多人实际上身无分文。他们没有亲戚或朋友；他们不会说中文；他们对这座城市或它的居民一无所知——事实上，很多人只是凭一时冲动才决定来上海的。如果不是因为迅速采取的援助行动，我毫不怀疑数百——或许甚至数千——难民将会死去。

按照西方的标准，上海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机构。一贫如洗的中国人在街上乞讨，有的在冬天默默地死于严寒。白俄和葡萄牙人社区有很小的赈济组织来帮助它们自己的穷人。在难民到来之前，几乎没有欧洲人处于贫困之中。

当难民最初开始涌入时，长期居住上海的犹太人迅速组织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来帮助他们，但委员会相对贫乏的资源很快就被用尽了，因此正规的犹太人救济机构，象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及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HIAS）等取代它做了很多工作。

最初，委员会曾为难民们寻找住房，但是在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①邮轮一次次卸下数百名孤立无助的难民后，情况变得严重

起来。有财力的难民只得自己寻找住房，较富裕的难民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搞到了房间或公寓套房，较贫穷的难民被迫越过苏州河在日租界的虹口定居，那里的房租更低。虹口在1937年中日淞沪战役中被日本飞机大肆轰炸，1938年年底我们到达上海时，虹口的很多地方已成废墟，几乎空无一人。不久，新的房屋建成以供难民居住。

当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大约是10美元。我的双亲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过着较为奢华的生活，在公共租界有一处公寓套房，甚至有钱去青岛等旅游胜地避暑。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②后，在过去曾是中国人的学校里获得了一间小单间。我们在这个又小（9英尺×12英尺）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被美国轰炸机摧毁为止，再搬入一间更小的房间。不用说，我们的房间没有独用浴室或厨房，甚至独用的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也没有自来水笼头。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做“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把它们当肥料卖掉。这幢建筑物也有一个公共淋浴设备，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里使用，大部分人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小盆洗澡。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小煤炉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搧风才能保持火旺。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至少在较贫困的地区）。

夏天气候炎热，我们没有空调器和电扇，穿着最少的衣服，但很快就因出汗而湿透，不得不一天换几次。冬天极冷。我们买了一个大肚盆状的小炉子，但燃料昂贵，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使用

它。幸运的是，我们的楼里有电，但它只能用来照明，而日本人则经常切断电源实施灯火管制。

食物极其不足且昂贵，常有无数极端营养不良的病人。买新衣实际上已不可能，大多数人不得不穿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衣服，很快就衣衫褴褛，甚至时常可见一些更穷的难民在冬天用破布裹脚，并把报纸塞在衬衣里。

还有数千名难民完全孤立无援一无所有，委员会——得到来自维克托·沙逊爵士和其他富裕的西方侨民的赞助（包括非犹太人）——建立了难民营。难民营由匆匆改造和重建的学校、仓库、兵营等拼凑而成。几十户人家挤在通风不良的小宿舍里，每个家庭要为自己及其财物划出几平方英尺，不断有划界纠纷，邻居们对一英寸地皮的争执，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美国的房屋所有人争夺后院篱笆的界线。

随后委员会被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取代，创办了临时厨房，供8000多人每天一餐，孩子们则多喝一瓶牛奶。

许多难民自己谋生，他们向富裕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兜售从牙刷到鞋带等各类东西，随着他们的人数日趋增加，生意就很难做了，最后只有很少几个人才能够用这种方式谋得足够的生计。

绝大多数难民仍留在虹口，他们修复了数十个被毁坏的街道，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虹口开始呈现出德国或奥地利小城市的外观，数百家店铺开张了，大部分迎合难民顾客的需要，其中有杂货店、药房、面包店、水管铺、锁匠铺、理发店、裁缝店、修鞋铺、女帽商店等。当然也有不可缺少的维也纳式“咖啡屋”，没有它们，普通的维也纳人会感到难以生存。一些具有创业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工厂，出产诸如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之类的产品，以及特具欧洲风格的食物——腊肠、糖果、软饮料等，其中不少产品在中国

人中也很畅销。

医生包括牙医开办了小诊所，营业相当不错，尽管他们人数过多，因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很多医生都是犹太人。工程师和建筑师在重建虹口方面出了很多力，但他们找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则无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了。一些人变成了小贩，另一些人卖报，很多人被迫在难民营里从事社区事务活动。

到 1941 年底，犹太难民已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取得惊人成就的社区，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估计至少 1/3 的人能在上海定居。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恶化了，难民的经济状况再次变得极为困难。日本人接管了整个城市，在花了一年时间学会管理这一复杂的大都市后，决定拘留所有的盟国公民，包括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侨民。他们不知怎样对待犹太难民。一方面，这些犹太人显然是反轴心国的，至少在感情上是同盟国的支持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同盟国的人，不能被安置在拘留营里。战后发现，上海的德国纳粹分子曾就如何处置犹太难民提出了建议，包括使用毒气炉和焚尸炉之类手段。幸运的是，日本人拒绝采用这类措施。如前所述，他们最终决定将所有在 1937 年以后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集中到虹口的隔离区里。隔离区被铁丝网和哨兵团团围住，全体犹太人都被禁止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监禁乃至处死。难民们处于类似被拘留的不正常状况中。

几百名在市里有工作或营业机构的难民被准许白天离开居留区，他们必须带上特别的徽章和通行证，每几周更换一次。负责发放通行证的日本官员合屋是喜怒无常的虐待狂，他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国王”，是虹口最可畏的人，他对那些要更换通行证的难民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屈辱简直难以描述。

塞法迪犹太人当然象英国公民一样被拘留，但俄国犹太人却争取到过着相对不受干扰的生活，可以不住在隔离区里。据说他们为了得到不受干涉的特别许可，向日本人支付了巨额的金钱，不管怎样，他们住在隔离区外就是幸运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美国的汇款被切断了，数千难民处境危险。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驻上海代表只能在俄国犹太人和其他未被拘留的外国人中募集钱款。这些借款——战后它们与大量利息一起被迅速付还——帮助维持了数千名难民的生存，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二

各种救济委员会是犹太人所有政治组织的核心，往往被日本当局视为犹太社区的正式代表。每个难民营有自己选出的官员，也有自己的准警察力量，通称 Heim Polizei，职责是维持秩序和纪律。住在难民营外面的难民往往组成自己的小行政单位。我们住过的那所旧学校里的居民，就选出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自己，其它地区的社团也同样如此。还有仲裁法庭，试图在不求助于日本当局的情况下，用友好的方式解决内部纠纷。

然而没有社区政府，当然也没有社区范围内的选举。日本人让难民们管理自己的事务，但不能妨碍他们的计划。日本当局挑选一些著名的社区领袖，利用他们控制整个团体的活动。这些领袖不得不帮助日本人组织专门的犹太人巡逻队，在隔离区内值班放哨，确保他们的同胞不得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离开隔离区。另外，建立了防空袭民防队和担架队，1945年7月遭轰炸时，它们发挥了作用。

日本人认为犹太隔离区的存在对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的益处。他们估计美国人对轰炸隔离区会有所顾忌，因此，他们在隔离区堆

积军火，存放油料，安置无线电发射台，驻扎军队等。显而易见，他们太过份了，战争结束前不久，一直小心翼翼避开虹口的美国人最终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多次空袭，许多房屋（包括我们自己的）被毁坏，一些难民（加上数百名中国人）丧生。

三

如前所述，大多数难民来自中产阶级和底薪阶层，他们被迫混在一起。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还是坚持保留他们的旧头衔，衣衫褴褛的报贩被尊称为“博士”，一位穿着破旧的老人坚持要人们以贵族头衔称呼他。

尽管有相当多的内部摩擦，但大体来说，犹太社区显示出惊人的团结。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经常互相争吵，也时常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瞧不起的波兰籍犹太人。常有吵架和斗殴的双方一般不去求助于日本或中国当局，而是由难民仲裁法庭解决。人们实际上表现得非常克制。远离祖国，正为勉强维持生存奋斗，还遭美国人的轰炸，犹太人依然保持了明显的稳定和平静。

大多数难民认为他们在上海逗留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临时插曲，他们仅仅是为了能够漂泊到美国、澳大利亚，或重返欧洲而活着。他们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战争，尽管大部分新闻由日本人的宣传机构传播，但他们几乎可以凭本能得知什么时候同盟国又赢得了一场大胜仗。

犹太社区拥有一份日报——《上海犹太早报》，该报登载本地新闻和日本当局准许印行的国际新闻。一些难民拥有收音机，他们经常收听由日本人控制的英语电台，也从上海的一家苏联电台收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俄国与日本没有交战，日本人被迫允许这家电台广播。收听短波被严厉禁止，但有一些胆大的人

仍在偷听，并将好消息秘密传给他人。虹口商业中心舟山路以“小道消息之弄”而著称，自然，最流行的小道消息之一便是“战争结束了”，而且有一天它终于成了现实——战争结束了！但小道消息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终止，1947年7月我们离开上海时，制造小道消息仍是犹太社区的主要行业之一。

四

难民中有一些反希特勒的基督教徒，还有非犹太人妻子和孩子^③，极少数难民改信了天主教和新教，并从传教士那里领取一些额外的救济金。

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人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犹太会堂，很难说是他们缺乏宗教热情，或是因为贫困，或两者兼而有之。原因在于，较正统的犹太人可以使用在这个地区的俄国犹太人小会堂，而改革派^④的信徒在学校礼堂、会议厅等地聚会。总体上来看，宗教好象在社区里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一个例外是波兰籍犹太人。他们大多数依然是纯粹的正统派，保持着若干经学院和学校，其中有一个经学院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经学院，500名师生作为一个整体从波兰一路过来，到达上海时没有丢失一个学生、教师或书本，甚至连一堂课也没漏掉。他们刚到上海就马上建起了学校，并继续教学，几乎完全忘记了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⑤。

五

1938年，上海有许多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学校及大学。其中有一所上海犹太学校，由塞法迪和俄国犹太社区共同建立，学校位于市中心，有一个英国籍校长和很多英国籍教师，并严格按照英国方式管理，即使战争期间英国籍教职员工被拘留，不得不由讲英语的

俄籍教员代替时也是如此。

来到上海的第一批犹太难民，包括我的父母在内，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上海犹太学校读书。但当数千名难民开始涌入虹口时，显然需要一所难民自己的学校。在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嘉道理的支助下，虹口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大部分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⑥。教师全部来自难民，用英语上课，英语很快变成了孩子们的第二母语。学校具有很高的欧式学术水准，太平洋战争期间，处于日本人监督之下，学校还是保持了这个水准。

除了这所初等和中等合一的学校外，难民们也创办了许多小的成人职业学校。当然，他们从未建立过大学，但据我看，犹太社区如果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他们准会办到这一点的。

六

对难民来说，可以忍受艰苦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较多形式的娱乐活动。

虹口有三四家中国人开的电影院，专放美国影片，难民们立即光顾。他们不仅渴望娱乐，还渴望有机会学英语。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影片当然被禁，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老片子还是使人得到相当令人愉快的享受。

难民中有许多专业演员，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这些人很快就组织了剧团。音乐家创办了管乐队和管弦乐团，几位歌唱家甚至还组建了一个轻歌剧团，上演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小歌剧。

当然，到处都有咖啡馆和桥牌俱乐部，甚至还有夜总会，其中一个设在虹口最高建筑物之一的屋顶平台上，在酷暑时期是个好去处。然而没有象样的酒吧或街角小酒馆，一直到战后，才有几家开业。以迎合美国大兵的需要。

在这人紧挨着人，十分拥挤的社区里，必然有大量的家庭娱乐，谈话艺术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由于缺乏食物，女主人通常只提供开水，客人们则自带咖啡（或代用品）、茶叶、糖或糖精。

难民们到后不久就组建了足球队，几个月后还建立了三区业余足球联合会，每年举办一次联赛，中国和其他外国球队也参加比赛，热情的观众可达数千。流行运动还有拳击、乒乓球，少数人打网球和棒球。

社区没有公共图书馆，一些有创业精神的难民却搜集了一小批图书，建立了流通图书馆，年轻人——如我个人经历过的那样——把交换连环画搞得十分红火。

七

总的来说，与中国人的关系相当好。当然，发生过中国人骂难民的事情。但我深信，这些中国人没有受到任何反犹主义的煽动，只不过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对白人进行报复，他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统治下曾不得不忍受耻辱。起初，我们家较宽裕时，雇用了一名中国男仆，一名“阿妈”（保姆），乃至一名干钟点活的黄包车夫，但太平洋战争一开始，这些奢华就完结了。大多数难民从未与上层中国人接触，他们生存的紧迫需要迫使他们平等地与下层的中国人（他们的邻居和顾客）相处。尽管他们与中国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却很少有几个难民真正熟悉他们。尽管许多人确实学会了几句必需的单词和短语，我猜只有不到1%的人学会了正确地讲中文。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学会了如何读写中文。大部分难民在试图掌握英语方面遇到了相当的麻烦，英语在这座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里是更重要的一种语言。与难民相反，很多中国人倒学会了讲流利的德语。虽然历史上中国人总是融合了入侵者和移

民,但这次却是他们极大地吸收了难民的风俗和品质,反过来,难民们却没有那么做。不过,难民社区毕竟只存在了几年,所以我认为根据这点无法改变上述论断。

注:

① 运送犹太难民来上海的意大利轮船。

② 指正常房租外加付的不合理费用。

③ 按正统派犹太教法规,母亲如果不是犹太人,即使父亲是犹太人,其子女也不是犹太人。

④ 指反对严格遵循犹太教规的犹太人。

⑤ 此处提及的即来自波兰的米尔经学院。

⑥ 即霍瑞斯·嘉道理创办的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

马嫫节译自威廉·肖特曼的《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报告》
(William Schurtman: Report on: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in
Shanghai, January 1954)

上海谋生记

——莉丝贝斯·洛温伯格采访录

史蒂夫·霍赫斯塔德
(Steve Hochstadt)

史蒂夫·霍赫斯塔德(以下简称“史”)：请谈谈你们到上海后的情况。

莉丝贝斯·洛温伯格(以下简称“莉”)：好的。我们坐了一个月的船，终于到了上海，父亲来接我们①。我们看见了海关钟楼、外滩。我还记得当时问母亲：“他就是爸爸吗？”他瘦了许多，我们一下子都认不出他来了。但他确实是父亲，他说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上租了间房子，让我们乘黄包车去。他叫了一辆黄包车并将地址告诉了车夫。当时我想他怎么可以这样，将人生地不熟的我们交给这个苦力，他怎能相信这个苦力？可是这个中国人确实将我们送到了那里，父亲随后也赶到了。他为我们租的那间屋子很不错，还有一个阳台。父母住的那间屋子有一凹型小室，放着一张大床。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安顿下来了。当然，父亲已找到了工作，才能够租下房子。他在虹口的嘉道理学校教书。

史：教什么？

莉：历史。母亲和我当然也试图找工作，但这并不容易。来沪之前我曾学过做手套和皮带这一类东西，因此我找到了一份做手套的工作。母亲也有了份替人看护孩子的工作。那是位小女孩，双亲都得工作，因此每天下午我母亲去看护她。在他们家，母

亲听说有人想物色一位秘书。我正好会打字和速记，在离开维也纳之前，我学过英语速记这门课程。

史：英语速记？

莉：是的。英语速记和德语速记不同。

史：我母亲也会速记。

莉：在华懋大楼，我找到份秘书差事，薪酬相当可观，高于一般水平。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

史：也有别的人申请秘书工作吗？

莉：不是很多。一个人可凭运气找到工作，但必须凭本事才能保住工作。不幸的是，不久以后老板就死了，他得了伤寒。我也得了伤寒，可我没死。这以后我又拚命地找工作。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转弯处，我找到了一个在收费图书馆的工作。我去应聘，结果成功了。

史：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莉：这个消息不是打听到的，或多或少有点偶然性。图书馆离我家很近，我经常去那里，认识了图书馆老板布鲁诺。有一天晚上在静安寺路，我遇见布鲁诺，那时我还没有为他工作。他问我：“你去哪儿？”我回答说：“想去买些杏子，母亲要做水果布丁。”我们就这样彼此开始熟悉起来了。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不妨来尝尝嘛。”结果他来了，但没吃到杏子布丁。他来时带着咖啡和粉碎机，他说：“我不论走到哪儿去都要带上自己的咖啡。”你可要知道，当时咖啡是很贵的。我们家没有咖啡，因为我们从不喝咖啡，只喝茶。他和我们住一条弄堂。事实上他只租了一个阳台，供睡觉用。通过相互交谈，我得知为他工作的那个女孩走了，因此我就申请到了这个工作。我们在那儿一直住到1943年2月，直到日本人强迫所有无国籍难民迁往虹口的犹太难民隔离区。搬入隔离区后，我们就

结了婚。

现在我想起了珍珠港事件。在那之前，警察都是印度人、锡克教徒，头上包裹着一块布，因为那是公共租界，警察和所有一切实际上都是英国人的。终于有一天战争爆发了，英国人跑了，来了日本人。锡克人和周围所有一切换成了日本警察，日本人和德国人联盟后，形势又开始有点严峻起来。我们再一次陷入了曾逃离出来的敌占区。一天晚上，有位日本顾客来买了许多书，我们的图书馆不仅可以借书，而且还是个正规的书店。我们有英语书和德语书，日本人非常喜欢看德语书。我记得他买的全是德语书。他在书库中翻到了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并问布鲁诺，“你怎么会有这类书？”他接着又说，“不过它确实是一本历史性著作。我不该在书店里问这种问题。”他买下了这本书。他又说：“这是个安全的地方，其他人不会看见我买这本书。”他还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让布鲁诺一块儿送到他家去。布鲁诺以为大祸临头了，不是立刻进监狱就是重进集中营。当他将书送至那个日本人家时，日本人对儿子说：“这本书（《共产党宣言》）不是你看的，”并解释了书中内容和书中的激进观点。一切平安无事，布鲁诺活着回来了。布鲁诺曾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②呆过一年多，他姐姐替他弄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他才设法逃离。他是在德国被捕的，对士兵、警察，或一切类似的东西，总有一种恐惧感。我之所以讲这些，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他怕日本人看到《共产党宣言》后会把他送往集中营。

史：他从哪儿来？

莉：柏林。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和母亲搬到一个专为同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的难民开设的招待所，因为我父亲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你知道，房子里有抽水马桶和淋浴设备就算是豪华

的。弄堂内的房子一般没有抽水马桶。

史：你和母亲住，那父亲到哪儿去了呢？

莉：哦，我忘了说。1942年2月父亲去世了。当时，犹太难民可去的医院只有华德路（今长阳路）上那一家。上海肯定还有许多医院，但没有人付得起钱。父亲死于肺癌。1943年2月以后，布鲁诺跟我们一起搬入隔离区，并在华德路开了家书店，不是在监狱正对面，而是在离监狱三条马路的地方。

他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书搬入新开张的书店，并住在店后。这是幢大房子，是我找到的。可惜你没亲眼看过。屋前有个花园，还有个内庭院。左右两边各是一间大房子，中间走道厅很大，书店就要安置在这个大空间之内。后面有许多房间，共三层高，住着多户人家。我们结婚后，在内庭院的右面租了间有卫生设备的大屋子。

史：能否谈谈婚礼？想必很不寻常吧。

莉：没什么不寻常。我们是按世俗方式结的婚。当时上海的世俗方式结婚就是请一位律师，在公开场合，如饭店门口，大张旗鼓庆贺，是一桩公开的事情，没什么可隐瞒的，所有在场的人都是见证人。就这样，我们在舟山路的一家饭店结了婚。饭店很漂亮，饭菜也很好吃。我们那张中国结婚证书上有花鸟图案，这些图形象征健康、好运、发财，我不懂这些，你可能知道。在所有的结婚证书中，中文字看上去最可爱最漂亮。其他语种则显得简单、单调。后来，我们在其他地方又开了书店，生意不错，日子也过得很好。后来战争结束，美国人来了，生意兴隆起来，其他一切也变了。

史：我能问有关书店的问题吗？

莉：可以。

史：人们借书要付钱吗？

莉：是的。

史：这样开支就够了……

莉：是的。按当时的标准，我们俩的收入已很不错了。可以买咖啡和糖。由于战时上海被封锁，各种供应奇缺，人们也没什么钱用于娱乐消遣，那么人们干点什么呢？阅读。这就成了人们唯一可作的消遣，我们也因此为生。我们在战时的生活水平略高于一般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干黑市买卖，赚很多钱。我们并不算富裕，只是比一般人好，当然不能与干黑市买卖的相比。

别以为战时大多数人都呆在家里，其实那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跑出来谋生路，做裁缝，开杂货铺，当电工，修自行车等，尽其所能。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其实，每一个逃出来的人都没有钱。只有极个别人在逃出德国时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带了点钱。但90%的人一无所有。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每一个人都从同一起点、同一水平开始，根本不可能吃老本。例如，我们在维也纳的有钱朋友来到此地后也是人地生疏，一愁莫展。其他人也是白手起家，顺应事变，苦度难关。这样不论男女，大家都很快成熟起来。大家都在同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零开始。然而人们的能量令人吃惊。后来我们迁入在淞沪战争中被炸成一片废墟的“隔都”^③，你简直难以相信在短时间内那里会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给自足的小社区。因为大多数人有能力，有事业心，他们充分发挥潜力，重整房屋，开设小型商店、餐馆、酒吧。有许多妇女、女孩子在酒吧工作。人们常说在那里工作的女性会跟顾客上床等等。我不认识在酒吧工作的人，自己也未曾在那里工作过，因此不知是否属实，只听人们这样说。但是确实有一种比妇女去找工作更容易的事情。当这样做成了养家糊口的唯一办法

时，有的妇女只好如此。我想有一件事应说一下。我结婚时需经合屋先生的特别批准，他是无国籍难民事务局的日本官员，负责签发犹太人离开隔离区的通行证，所有走出隔离区的犹太人都要站在那儿等几小时。我结婚要改姓名，也须得到批准。我所办理的文件得到了合屋的签名，我想我已把它送给某个博物馆了。我改姓名的事很顺利，没费什么周折。

史：那时您姓什么？

莉：我结婚以前姓爱泼斯坦，婚后改姓洛温伯格，很滑稽，不是吗？布鲁诺必须到“隔都”以外的地方去买书。只有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才能采购到好一点的书，因为“隔都”内实在无货供应。他只能经常去领通行证，有效期仅一个月，每次都得同合屋打交道。布鲁诺实际上完全处于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但合屋从未拿他怎么样，这得益于布鲁诺身材矮。合屋身材矮小，因而他最恨长得高的人，往往跟他们过不去，叫他们在他面前跪下，而对矮的人却比较友好。布鲁诺常常提心吊胆。刚结婚时，他总梦见自己在集中营里，半夜尖叫着惊醒。到达美国以后，他才恢复正常。当他第一次遇到美国警察向他走来并说“你好！”时，他简直难以相信不必害怕警察了。美国治好了他的创伤。

史：我还能问一些有关买书的问题吗？你们是在你们的那个图书馆收购书吗？他就是在那里向其他人收购旧书吗？

莉：是的。很奇怪，有许多人逃离德国时带着书，布鲁诺就是从那些带着大量书的人手中收购来的。以后他又从中国图书商手中订购书。

从中国人手中买到的书大都是非法翻印的，因此人们能得到最新出版，但还不曾进口的书籍。这些盗版书数量不大，销路很好。后来美国人轰炸上海，毁坏了“隔都”的一角。我们住的房子

四周尸体遍地，墙上千疮百孔，弹痕累累。夜间，如果遇到轰炸，那声音就使人觉得整幢房子要倒塌了，玻璃和所有一切似乎都掉下来了。房子虽然丝毫未损，但声音很恐怖。记得有一次，我站在窗前看到空中飞过的炸弹，别人说看见炸弹飞反而好，因为炸到你的炸弹你往往看不见，它们就在你头顶上。还记得那个监狱吗？人们说那是“隔都”唯一安全、防弹的建筑。许多人听到空袭警报后马上跑到监狱那儿，当然那里无任何掩体或类似的防空洞。上海的房子都没有地下室，好像直接建造在水面上，没有基础。另外还实行灯火管制，电灯只准在某段时间使用。实际上煤的供应已中断，而发电要靠煤。我记得晚间开灯大约只能从7点到9点。当然我们有小油灯等各种代用品。这也很正常，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在战争时期都会有空袭，因而也有灯火管制。突然在一天晚上，人们纷纷传说战争结束了。几乎在同时，人们的反应是开灯，取下遮光布。我们住的那条华德路上，每个人都为摆脱黑暗重获自由而欢欣鼓舞。第二天传闻说，战争已结束两天了，而日本人要惩罚我们。本来，外国移民和无国籍难民在空袭期间表现出色，在街上开设急救站帮助中国人、日本人和所有伤员。但现在由于我们开了灯，所以要受罚。好在只罚了一天，第三天战争真的结束了，我们可以开灯了，美国士兵和水手进来了。

史：就在第三天吗？

莉：是的。确实在一二天内，日本人撤走了，美国人进来了，就像某一天英国人撤走日本人进来一样。经济也一下子随之振兴起来。

注：

① 莉丝贝斯的父亲先从奥地利到上海，安排妥当再将妻女接来。

② 纳粹在德国设立的关押政治犯和犹太人的集中营。

⑧ “隔都”系“Ghetto”一词的译音，原意指欧洲一些国家设立的犹太人居住区，这里指日本人在虹口建立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

韩建军节译自史蒂夫·霍赫斯塔德的《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口述历史项目：莉丝贝斯·洛温伯格》(Shanghai Jewish Community Oral History Project: Lisbeth Loewenberg, Shanghai, China, April 21, 1989. Interviewer: Steve Hochstadt)

战时上海纪事(1945年)

瑞娜·克拉斯诺^①

(Rena Krasno)

1945年1月

在公共租界的海伦家里参加了一个极愉快的除夕聚会。我们总共是7对,每人带来了他们最心爱的唱片,跳舞至天亮。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1945年!战争就要结束了!”晨6时半,海伦的母亲起身了——想来我们大声喧闹使她没有好睡——她为我们炸了一大堆金黄色的面包片(法式吐司)。吐司里松外脆,十分可口。吃过早餐后,杰塞斯、里瓦、杰基(一个可爱的犹太男孩)和我决定回家。我们走到哈同路时,治安队吹着警笛,把我们赶到路边。戒严了!不过没有日本兵在场,过路行人很稀疏,我们就依偎在哈同花园^②外围的红砖墙上闲谈。我讲给朋友们听,我母亲小时候曾和一批同学一起去过哈同花园,里面有盖着弯曲的中式屋顶的楼宇、佛殿、假山和拱形桥,仆人无声地走来走去,和尚身着飘逸的长袍在园中踱步,母亲和她的朋友们被引导到哈同家里,哈同夫人穿着朴素的中式服装招待她们,吩咐下人替他们“看茶”。

杰基对叙述哈同家慷慨大方的这番话发出讪笑,告诉我们他的朋友有过一段完全不同的经历。他与哈同的一个螟蛉子是同学。小哈同邀请他和他弟弟去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明确提出他盼望得到一架柯达方镜箱照相机作为礼物。后来兄弟俩带了小哈同想要的礼物来到公馆,仆人领他们去见小哈同,然而那里没有其他来宾,没有东西招待,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小哈同则自顾自地急

忙打开照相机的包装。两位客人觉得十分荒谬可笑，就回家去了。

上海人对欧司·哈同相当熟悉，他是伊拉克犹太人，1873年来到上海，最初在沙逊公司的河滨堆栈（仓库）当看守人。哈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青年，很快就熟悉了仓储和会计等业务，他与中国人相处融洽，学会了上海方言，在洋行里迅速升迁，不过他认为自己薪水不足。

当时上海的发展惊人之快，外国资本源源流入，房地产业迅速崛起，沙逊公司大班劝他“投入这场赌博”，用相当低的代价买下未开发土地，哈同很乖巧地听了上司的话，逐渐买下一小块一小块的地皮，日积月累，取得了连片的地产，获得租金后进行再投资，最终离开沙逊公司，转而从事大规模的地产投机生意，成为上海最富有的财主之一，一个英国记者称他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有钱的人”。

“你知道哈同是怎样遇到他的妻子的吗？”杰基问，“他们说她是个女裁缝，替人改改衣服和缝缝补补，哈同看见她从街上走过，因为有些衣服急需缝补，就从窗口叫住了她。那时哈同很穷，住在弄堂里。”

“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欧亚混血儿。”我大胆地说了。但杰基言辞激烈地否认了这一点。*

“不！她是中国人。他们是在英国领事馆结婚的。哈同声称他们也举行了犹太宗教仪式，不过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相信这事。尽管她给自己取名‘丽莎’，但她始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是啊，”我肯定了他的说法，“我爸爸曾告诉我，丽莎·哈同完

* 1990年，一位中国教授告诉我，现在中国人相信哈同夫人的父亲是上海的一个爱尔兰警察，中国孩子跟随父亲的籍贯，所以哈同夫人现在被中国人认为是“爱尔兰人”。——原注。

全受到住在哈同花园里的一个和尚的影响。”*

哈同夫妇没有子嗣，他们收养了 11 个小孩——有些是欧洲裔小孩，有些是欧亚混血儿小孩——并收留了 100 多个中国养子和养女。为了觅到“外国”儿童，哈同派人到中国各地的城市中去，嘱咐他们优先寻找犹太裔小孩。关于这件事，流言蜚语比比皆是，如说哈同夫妇喜欢金发小孩，一些被派去寻觅儿童的人不顾信誉，把他们找到的小孩的头发染成金色，然后带回上海！

哈同的“犹太”孩子在家里吃中国食品，也可能穿中装，但在外面总是穿西装，他们都上外国学校。次子腓力 1939 年死去时年仅 19 岁，按照严格的犹太教礼仪葬在犹太公墓里。哈同的中国孩子正相反，他们都遵循中国的习俗和礼教，在哈同产业内特地为他们建造的中国学校读书。杰基知道一些关于哈同的“犹太”儿子的事，说他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兄弟之情，倒是一些女孩还算亲近。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哈同的子女乘坐式样古旧的栗色“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来校上课的情景。汽车装有擦得锃光闪亮的黄铜饰物，车厢在司机座位后面，司机就像马车夫那样露天坐着，身边坐着开门人，天下雨时，就把一个帐篷撑在两人的头顶上。开门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到达目的地后跳下车来，让孩子们下车。

哈同对犹太人的事业很少关心。穷亲戚从中东来时，他唯一的帮助是买三等舱船票让他们回家！20 年代中，为了帮助一小批从俄国去巴勒斯坦途经上海而陷于穷困潦倒、动弹不得的犹太复国运动成员，阿兹肯纳齐犹太人社团劝我父亲去找哈同。父亲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去拜访。他惊奇地发现，尽管哈同拥有巨额财富，

* 这个和尚名叫黄宗仰，他说动哈同夫人发行了 8416 卷佛经，由他自己编印。在佛经的卷首第一页上刊登了他的女施主丽莎·哈同的肖像。——原注。

但他的写字间里没有火炉取暖，没有地毯，没有窗帘，墙壁粉刷成白色，父亲好像进入了和尚苦修的房间。当时天寒下雨，父亲穿着单薄的外衣直打哆嗦，身材敦实的哈同无精打采地坐在未上釉的木制书桌后，他身穿一件厚实的中式棉袍，两手笼在宽大的衣袖里。哈同毫无表情地默默听完父亲陈述，明确回答“不能”。爸爸讨厌募捐资金，而且性情急躁，可以想象当时他所遭受的挫折、愤怒和屈辱，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同意去寻求哈同“帮忙”了。

然而在1927年，哈同确实为塞法迪犹太人社团建造了一座会堂——阿哈龙会堂*。这座被誉为“建筑的瑰宝”的大厦是一种棱角和曲线的和谐结合。母亲在乔治六世加冕时带我去看了它的灯彩。一次，阿哈龙会堂委员会在财政上有了问题不能支付维修帐单，请求哈同帮助，他干巴巴地回答：“要是你们无力照管这座建筑物，那末把它还给我吧。”

这座外型优美的新会堂从未在公众中赢得巨大的声望，部分原因是由于哈同的态度，也因为许多教徒已习惯于在他们常去的老教堂里与朋友见面。这种相当冷落的局面在1941年发生了变化，300名从立陶宛到达上海的宗教难民在会堂的办公室和其他房间里得到了住宿和学习的场所——这一用途是哈同（此时他已长眠地下多年）永远也不可预见到的③。

1927年，即哈同建造阿哈龙会堂的这一年，令上海人惊奇的是，哈同为英国守备军第一分队免费提供食宿，直至他们作好永久性的安排。此举可能是出于外交目的，哈同是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任职的为数极少的上海人之一。

* 阿哈龙会堂现在是一家工厂的一部分。原来的建筑的美观已不再看得到。——原注。

哈同夫人罗迦陵对他有强烈的影响，在罗迦陵的劝说下，哈同资助了几所学校，并开办了一所既教古文经典又教现代科学的学院。他捐资成立了老人协会和文学社的组织，他是唯一付款的会员。早在1920年10月，中国政府为了感谢他在上海地区为500名中国儿童建立寄宿学校而授予他二等嘉禾章。同时，他的夫人也被授予三等一级慈惠章。授勋仪式在哈同花园举行，上海督军府的军乐队演奏了乐曲。

当饥荒袭击中国大地夺去大批人的生命时（不幸这是定期发生的现象），哈同向几百万人捐款赈灾。1924年，中国政府授予他一等大绶嘉禾章。后来他又成为获得一级饰带军事勋章的第一位外国人。

尽管功绩显赫，哈同仍对他往昔锱铢必较地收取房租着魔。他依旧亲自探访中国房客，确认他们已经按期交了房租。这一特性使他树敌甚多，以致他身边总要有个保镖陪伴。

“哈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人物，”杰基说。“他的写字间如此简陋，但他却在北京买下原属中国将军的豪华府第，共有200间房间，里面摆满了贵重的家具和古董。哈同说他到北京办理政务需要一个合适的公馆。”*

父亲曾经告诉我，哈同已开始实行一个惊人的计划，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经全部译成中文，他雇用了一个年轻的佛学家，就住在哈同花园内。古兰经由一个穆斯林专家翻译，3年以后出版了3卷，每卷印了2万册，免费分发各教育机构，包括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由于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此项目就中断了。

杰基告诉我们1931年他11岁时他叔父带他去参加哈同葬礼

* 哈同在1924年以22万墨西哥银洋——当时是天文数字——的代价从一位“帝位拥立者”的将军手中买下这幢宫殿般的府第。——原注。

的情况。罗迦陵称哈同曾嘱咐，他去世时举行佛教和犹太教两种宗教仪式。杰基永远不会忘记公众瞻仰时的令人生畏的场景，哈同遗体的四周几千支线香闪闪发光，他收养的子女叩头后，送葬行列行进到哈同花园的下葬地点，一支乐队演奏传统的中国音乐，另一支乐队接着演奏军队进行曲。冗长的佛教仪式结束后，又举行了犹太教仪式，哈同的犹太籍长子朗诵了卡迪什——哀悼死者的犹太教祈祷文。

“你们想得到吗？”杰基笑着说，“赫夫拉·卡迪沙（犹太丧葬协会）主席后来愤怒地宣称他受骗了，以为只举行犹太教仪式。结果他提出了辞呈，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哈同把他的财富留给了罗迦陵，其他亲属企图染指而发生争斗，诉讼一直拖到3年前罗迦陵死去时告终，她患病和失明多年后于1941年去世，享年78岁。

路障移走后，我们择路乘有轨电车回到了家里。

我们的菲律宾邻居高兴地告诉我们，她从有短波收音机的朋友们那里听到美军在她祖国最大的岛屿吕宋登陆的消息，西德尼（他能接触到不公开的消息）特地跑来告诉我们缅甸公路④已经重新开放了。看来战争将在今年结束。1945年愉快！

1945年3月

星期四晚我和父母一起到犹太俱乐部去。俱乐部位于法租界，1932年成立，作为联合不同派别的在沪犹太难民的媒介，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犹太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中心。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加紧迫害犹太人时，俱乐部里成立了犹太人保卫同盟。父亲是犹太俱乐部文化委员会的秘书，我的朋友珍妮的父亲鲍里斯·托帕斯是犹太复国运动卡迪马组织⑤的创始人和主席，他被关入虹

口巡捕房拘留所前总是在俱乐部内召开会议。

俱乐部每周四有文化之夜活动，这是埃尔哈卡社——俄文文学艺术圈的字母缩写——组织的。这个团体是一小批渴望探索创造性表现手法的人——其中包括我父亲——在12年前建立的，目的是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发挥才能。倡导人希望俱乐部予以支持，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每周四晚上俱乐部向埃尔哈卡社开放，尽管埃尔哈卡社的某些成员并非俱乐部会员，甚至不是犹太人。为了报答俱乐部的慷慨大方，埃尔哈卡社就利用空余时间帮助布置会场餐厅，进行音乐和戏剧小品演出，帮助组建俱乐部图书馆。这种合作相当成功和活跃，吸引了一批最优秀的专业人员，他们无偿演出各种剧目。

父亲曾写了一首《埃尔哈卡赞歌》，被配上高亢激昂的乐曲。不论是欧洲的纳粹还是上海的日本人，都不能使埃尔哈卡社的理想受挫。

我们坐在为埃尔哈卡社保留的长桌旁，许多人围着我们，向我的父母问候，并对我这样一位年轻一代成员的到来表示祝贺，我感到很害羞。拨给埃尔哈卡社使用的房间呈长方形，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悬挂着巨大的幕帘使人感到协调和谐，这真是日本军装与刺刀间的一片绿洲。文娱表演在进行，父亲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首俄语诗。表演结束，大家围坐在桌旁闲谈，品茗热腾腾的柠檬茶。谈话又转向这些日子的老题目：战事的发展。看来盟军一直在欧洲推进，占领了德国科隆。日军也在败退，美国空军正在狂炸东京。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马上结束啊！

1945年4月

我跟随一批精神病科学生去疯人院，听医生讲解病例。有一

对孪生姊妹，医生说她们是曾畏罪潜逃的美国罪犯杰克·里利的女儿。里利靠经营酒吧、夜总会、餐馆和吃角子老虎机致富，后因赌窟案件被捕，又逃入日本控制区，最后被捉拿归案。里利有两家酒吧开在声名狼藉的“血巷”（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条紧靠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长110码的小街被记者称为“罪恶中心”，每当华灯初上时就成了花天酒地的世界。如果有外国轮船泊港，酒吧就顾客盈门，通宵营业到黎明。

血巷聚集着各种国籍的妓女。一次，母亲提到两个在那里营生的犹太妓女：“一个高身材，瘦个子，酱红色头发，外号‘莉莎·蚊子’，常与水手厮混，另一个又胖又大，外号‘哈娃·公牛’。两人相处得很不好，不过她们还算是好犹太人，向社团捐款，救助孤儿。”

回到家中，家人神情沮丧，我焦急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啦？”

“难道你没有听到那可怕的消息吗？”母亲答道，“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我觉得受到了重击，坐倒在沙发中。我从未看到过勇敢大胆的母亲这样嗒然若丧。尽管我们抱怨盟国未尽最大力量营救犹太人使之免于落入纳粹魔爪，但仍尊敬睿智、大胆、诚实的美国总统，这位强有力的人物使我们感受到保护。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好像被完全遗弃了。

几年来，日本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肆诽谤，说他“权欲熏心”，并散布纳粹造的谣言，说他是一个名叫“范·罗斯福”的荷兰犹太人。日本对罗斯福的憎恨可追溯到1937年10月5日这位美国总统发表后来称之为著名的《隔离演说》的那次讲演。当时日军正迫近南京，罗斯福愤怒地抨击了“国际不法行为”的发生，提议把传播瘟疫的国家隔离起来。他虽未点日本的名，但全世界都知道他的话锋所指，当时日本电台就攻击罗斯福“背叛美国人民”和他

的“犹太血缘”，现在纳粹和日本人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该多高兴啊！

4月份重大事件层出不穷！格列布告诉我白俄社团起了骚动。红军在向德国迫进，上海的白俄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地位了。他们对自己同胞的勇敢和取得的胜利有一种从内心自然流露的自豪感，有些人甚至考虑有一天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有几个人把沙皇及其家人的像片从墙上取了下来。其他白俄则认为这类行为是背叛，仍公开支持纳粹，宁可选择除共产党胜利以外的任何结果。在上海这个地方政治热情经常激化到沸腾的程度。观点对立进而摩擦，导致冲突甚至暴力。许多人预期战争结束时将被遣返，这看来是不会发生的，但他们的愿望值得同情，人们渴望回到自己的祖国，看到故土大地的自然风光——尤其是这些俄国人阔别已久、深切思念的森林、白桦树、浆果和蘑菇。甚至从未到过俄罗斯的我，在父亲朗读俄国作家描写的章节片断时也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思乡之情。加之上海的俄国移民实际上从未飞黄腾达，在日本占领下他们的境遇更是糟糕。

绝大部分不肯妥协的反苏俄侨经常光顾法租界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圣尼古拉教堂。这不奇怪，教堂外墙上巨大的大理石牌上用俄、法、英文书写着：“纪念殉难的尼古拉二世皇帝及其可敬的家属。”

圣尼古拉教堂富丽华贵，美不胜收，洋葱头状的圆顶，珍贵的神像，墙上交叉缠结的花纹，不知俄国人社团在1932年是怎样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完成这一辉煌的建筑的？格列布在俄国复活节带我去那里看做弥撒的情景，他说这是体验一种文化的机会，对此我同意。唱诗班的歌咏如同听到天使的声音，男童女童互相亲吻双颊，互道：“基督复活！”我觉得很激动。一个犹太女孩处于这样的氛围

中，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涌上心头，但能欣赏大量的艺术品与和谐的乐声，即使有不自在感也是相当值得的。

罗斯福逝世前一周，消息传来苏联政府将不再续订与日本的中立条约^⑥，在白俄社团中犹似爆炸了一颗炸弹，引起了对这一历史性行动的后果的热烈辩论。万一日本战败将会发生什么事？现在时局十分紧张，俄国人也十分紧张，他们内部在进行争论。

1945 年 5 月

所有的房主都接到命令，必须在自己的房屋前挖防空洞。高低不平、年久失修的人行道已是满布洞孔，现在又进一步遭到破坏，增加了出事的危险。一旦遭到美国 B—29 型超级空中堡垒飞机的轰炸，这些防空洞能顶什么用？战争接近尾声，上海的紧张气氛加剧了。我们希望盟国获胜，但不知道能否活着看到。白俄害怕苏联报复，惶惶不安。但总的说来，上海人怀着巨大的希望等待着大战的结束和日本的失败。

今晨，在我父母和姊妹出去后，我也准备离家去震旦大学上课，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声，我抓起书本冲到楼梯间里。炸弹呼啸着加速向地面溅落爆炸，发出巨响，爆炸震撼着墙壁，窗帘猛烈地摇晃着，我坚定地温习起功课来……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响起了全面解除空袭的警报声，我收拾起书和笔记本，把它们叠放在自行车后的铁网架上。天气暖洋洋的，树上绽出了春天的嫩芽，麻雀在自由自在地振翅飞跃。生的喜悦蓦地充满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向大学驶去。

我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遇到红灯停了下来，一眼瞥见我熟悉的俄国姑娘莉迪娅。她比我大 3 岁，高而苗条，长得很好看，

只是嘴小了些，秋冬季节总是穿着金钱豹皮做的大衣。一次我要归还她我借阅的书籍，偶然路过她家就顺便进去了。莉迪娅和她母亲一同住，房间里塞满了家具杂物，墙上挂着一帧骑在马上俄国军官的巨幅油画。莉迪娅指着画自豪地对我说：“这位将军是我的父亲。”她母亲始终漠无表情。我对自己作为不速之客颇为窘迫，此时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两个穿便服的日本人，我咕哝了几句就告辞走了。我琢磨莉迪娅会不会是间谍，从此我就避开她，不过心中很内疚，因为她总是那么热情友好。后来我发现她是个应召女郎，这是我从未想到的，战争期间一些穷得无以为生的俄国女人成了娼妓。绿灯亮起时我继续骑车前行。

在班上，学生们都觉得不能专心致志，这是显而易见的。战事接连不断地迅速发展，周围有一种热切盼望的气氛。5月7日，德国屈服了，宣布无条件投降。现在日本象一头受伤的野兽一样在单独作战，对抗着占明显优势的力量。听说日本国内在谈论，如果这一灾难——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是灾难——真的发生了，就用竹子削成的长矛抵抗美军入侵。这可能是真的吗？

吃晚饭时，母亲告诉我们，她碰到一个熟人马克斯·谢德林。此人是德国难民，原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后被日本人征用，强迫搬入隔离区。马克斯还算幸运，他的虹口分店正好在日本人指定的难民居住区内，总算没有全军覆灭。不过，现在人们只买生活必需品，店里几乎一点生意也没有。马克斯偶而搞到一张当天出入的通行证，到外面去做些生意。他说申请当天出入通行证比接触签发每月出入许可证的、残酷成性的合屋先生更可怕，签发当天通行证的日本人是那个面带笑容的“愉快”的大仓先生，出于除他外无人知道的理由，他常横蛮地把申请者送到可能传染伤寒的牢房里去关几天！传染上这种病意味着几乎必死无疑。马

克斯未有这可怕的经历，也许是因为他的顾客之一是一位名叫艾哈德的德国人，他住国际饭店（一些重要的纳粹分子在那里住宿）。马克斯在公共租界开店时，艾哈德总是在他那儿定做衬衫。日本人发布“通告”后不久，这个德国人出主意要他常打电话接受衬衫定货。马克斯保存着艾哈德的尺寸，加工他的定货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斯与中国朋友有联系，可买到剩货——他们信任他，赊帐卖给他商品，从来不要借据，对他很善良，公平交易。他非常喜欢中国人。近来，艾哈德要马克斯把难民家庭准备卖掉的黄金和贵重的珠宝带出来给他，马克斯靠这些途径赚来的钱才使家人不致饿死。马克斯知道艾哈德也与其他犹太人做生意，因此他们也能离开隔离区，挣一些钱使家人活下去。^{*}

这次马克斯告诉母亲一件惊人的事情。几星期前，他坐在自己的男子服饰用品店里——店名气派十足地叫做“王家”——无所事事地与几个朋友玩牌，因为店里既无商品也无顾客。突然，他看到臭名昭著的合屋带着一个小孩走进来，一见这个令人憎恨的日本人，马克斯就感到浑身上下布满了压抑不住的怒火，迎上前去大声叫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的货架都是空的吗？我没有货物，一点也没有！不管怎样我也不卖东西给日本佬。”

合屋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可能是因为当着他孩子的面，把他的狂暴性情强行压了下去，说了一句：“明天到我办公室来。”

合屋离去了，马克斯的朋友们已吓得愣住了，转过身来怪他：“你疯了吗？他会杀了你的！”

这件事像野火一样在隔离区传开了，马克斯被看成是一个将

* 1991年我在旧金山遇到马克斯，他告诉我艾哈德具有高级官方职位，战后被作为战犯送交审判，受他善待的犹太人的证词使他免于判刑。——原注。

死的人。次日，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来到合屋的办事处。合屋没有提前一天发生的事，问了几个一般的问题，接着蓦地从办公桌后冲过来，残忍地打他耳光，揍他。合屋最后住手时，马克斯正面逼视着他的双眼说：“合屋先生，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事。”①

马克斯告诉我母亲，他在这时刻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了，躺在地板上等待再挨一顿打，但合屋回到了他的座位上，挥挥手让他离开。*

我们就这一事件在餐桌上进行了讨论，对这个日本人出乎意料的做法议论纷纷，确信战争真的快要结束了。因为否则的话，合屋肯定是会把那个德国难民杀了的。

1945年6月

几天前父亲访问了虹口隔离区，采访德文日报《黄色邮报》发行人施托费尔博士。施托费尔博士是心理学家，曾在维也纳学习，师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1938年纳粹兼并奥地利后，弗洛伊德离奥赴英，施托费尔也意欲前往英国，但未成功，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唯一可能的另一避难港上海来。

除《黄色邮报》外，隔离区内还有两家日报，《上海回声报》*②

*①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1991年我们在旧金山会面时，马克斯告诉我，1945年8月战争结束后，一个美国士兵——他的一位远亲——顺道来到他的虹口店铺，马克斯述说了合屋对他和其他犹太难民的所作所为，那个美国大兵听后很生气，立即拉着马克斯去找合屋。当时，日本人都被安置在一个营地里等待遣返，合屋看到他们时就跪在地上求饶，他已经在街上被愤怒的难民揍了一顿，两人不为恳求所动，又狠揍了他。马克斯说：“当时我怒火燃烧，我们打他时，合屋不断地喊叫：‘我从未杀过一个人！我从未杀过一个人啊！’这倒是真的。”——原注。

*② 《上海回声报》发行至1949年。——原注。

和《八点钟晚报》。施托费尔博士又拿出用德、英、波兰、俄和意第绪文出版的周刊和月刊给父亲看。有些出版物是多语种的，如《波兰回声》和《意第绪年鉴》是用意第绪、英、俄和德文出版的。几种专业性的出版物收入了用中文写的文章和评论。

今天，父亲坐在餐厅里整理记录时，我把他从虹口带回来的报纸样张从头至尾翻了个遍。我们谈道，尽管受到日本人限制，犹太难民前途莫测，几乎完全缺乏资金，他们仍从事着杰出的文化活动，父亲说，这反映了犹太人的理想主义、勇气和永不泯灭的希望。

突然，警报的尖啸声划破了长空，伴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一定是美国飞机在未觉察的情况下进入了上海。我们的房屋在颤抖，书籍从架子上翻落到地下，玻璃窗当啷一声碎裂了。恰巧母亲和姊姊都在家，这样就不用焦虑不安，彼此为家人的安危担心了。解除空袭警报声刚停下来电话铃声就响了。编辑部来电通知父亲，炸弹落到了虹口隔离区。^{*}

“主呀！”父亲惊呼，“难道这些悲惨的人受的苦还不够吗？”他推开茶杯说，“我必须走了，也许能做点什么事帮助他们一下。”

“小心啊！”母亲大声说，“别与那些日本人多啰嗦！”父亲一言不答，骑上自行车出去了，母亲、姊姊和我留在家里紧张地等他归来。

我们没事干就听收音机。如同往常那样，日本人声称他们击毁了几架“企图杀死和恐吓平民的”美国飞机。几小时后父亲回来了，脸色阴郁憔悴。我们几乎不敢问他，过了一会他低声咕哝道：

^{*} 后来得到官方发表的伤亡数字，31名难民死亡，200人受重伤，700人无家可归。——原注。

“情况很糟，糟透了。好几十个难民被炸死了，几百人受伤，无家可归。许多中国人也遭到了重大损失。”

深夜，我的朋友马克斯从虹口打电话来。

“我很好，”他要我放心，“别担心，空袭很吓人，但是没有出现恐慌现象，急救站立刻设立起来了，难民中的医生立即照料伤员，不分犹太人还是中国人，对乞丐也一视同仁！”

马克斯描述了犹太难民是如何把最后剩下的一些台布和床单撕开做绷带的，中国人是如何在瓦砾堆中来来往往帮助抬伤员的，他们还把帆布床、垫子、水桶之类重物运送到急救站去。

“现在我们都是兄弟了！”马克斯洋溢着青春热情大声说道。

当我把马克斯的话复述给家人听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真好啊！”他重复说了好几遍，“希特勒没能摧毁犹太人的精神，几个世纪的压制也扼杀不了中国人天生的美德！”

后来父亲透露给我们一个使他担忧了很长时期的秘密：日本军方在隔离区对面的街上集中堆放了上海数量最大的军火和汽油储备。*

次日清早，我父母的朋友杰克从隔离区与他们联系，空袭时他被玻璃碎片割碎，流了大量的血，幸好只是表面皮肉受伤，他还看到两个中国人被倒塌的楼房压死的可怕情景。杰克跟马克斯一样，为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亲密合作感动不已。

“你知道虹口的中国人是多么贫穷，”他说，“但他们仍拿了食物甚至还有钱到急救站去，他们对受到不分种族的医疗救护充满

* 有些人说，日本人本以为美军轰炸机不会去碰这些堆放物，因为“美国犹太人”会阻止美国政府危及犹太难民的生命。后来我们获知，7月17日美机轰炸的目标是为军舰导航的一个日本海军无线电通讯站。——原注。

感激之情。”

晚上西德尼来我们家，与我们分享他从短波中听到的最新消息，美国飞机在日本 11 个城市里洒下了几千张传单，美国人说，除非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否则它将遭到史无前例的轰炸。英国方面也报道了日本人民受到当局的警告：接触传单的人手会烂掉，看传单的人眼睛会瞎掉！

今天的英文报纸中有一份转载了日本《每日新闻》登载的声明，表明日本战斗到最后的决心，并重弹“美国人民士气低落”、“反战情绪”、“美军伤亡人数增加”等老调表示对“敌方的和平提议”不予理睬。

1945年8月7日

是今年夏天比去年热还是战争侵蚀了我们的耐力？电力不足，电风扇一直不会动，叶片上积满了滑腻腻的污垢，蚊子和苍蝇折磨着我们，深受欢迎的“弗利特”杀虫剂在市场上也久已不见了。

今晨各报转载了东京《每日新闻》的惊人电文：8月6日晨8时刚过，一群B-29型飞机在广岛投下炸弹，大批房屋被毁，“敌方投掷了系在降落伞上的新型炸弹，爆炸力不能等闲视之。详情仍在调查中”云云。日本陆相阿南睦大将估计损失“相当大”。在上海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广岛熔化了。”

晚上电台播出俄国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的消息，以往言语流利、信心十足的播音员，此时的声调也颤抖了。

1945年8月10日

另一颗新型炸弹爆炸了，这次是在长崎。电台声称损失没有广岛大。尽管日本贬低第一颗新型炸弹的威力，对它遭受的沉重

打击仍不免会有所流露。我们处于长期盼望的盟国全面胜利的边缘了！

1945年8月11日

电话铃响了，父亲的朋友伏洛佳高兴地对我喊道：“和平了！和平了！”

其他电话接踵而来。人们极度兴奋，讲话也不连贯了。杰克从虹口隔离区来我们家，告诉我们最新消息：犹太难民把各种各样的隔离区标志都扯了下来，日本兵没有干扰。入夜，姊姊和我将灯火管制使用的严实的窗帘拉开，多年来第一次看到邻家的窗户灯光齐明，我们激动地尖叫起来。人们打破了宵禁，在街上大声说话（珍珠港事变以来我们不是一直在逆来顺受地小声说话吗？），他们的香烟头像萤火虫般地飘游浮动——夜幕降临后户外抽烟本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禁止。母亲开了两听准备重大喜庆时用的菠萝，父亲稍带克制，他着重指出还没有公开宣布官方的和平宣言。我们生气地指责他这种不恰当的悲观主义，父亲承认，由于盟军明显的军事优势，抱有希望确实是有根据的。交谈时，我们的菲律宾房客前来告诉我们，盟军的广播电台正不断敦促日军在未被全部歼灭前投降。

从日本的观点来看，局势肯定是极端危急的，但在我们最初的狂喜过去后，怀疑和不肯定的感觉又一次包围了我们。深夜，当地电台报道日本人逮捕了6名苏联公民，没有说明理由。

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日本人全面失败的话，他们是否会向无依无靠的平民进行报复？上海人会不会被扼杀在最后一次突发的暴力事件中？

1945年8月12日

今晨报上刊出了陆相阿南陆的宣言，称“苏联终于以武力进攻帝国了，它要征服和控制大东亚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对这一现实，我们不再浪费言词。唯有顽强地把圣战进行到底。我们坚信，虽然这可能意味着嚼草根，吃泥土，但决心战斗肯定能得到摆脱绝境的出路……”

暑气逼人，热浪穿墙入室，使人变得迟钝。

“嚼草根，吃泥土……”这些话缠绕着我的心。我试图阅读一本儿童畅销读物——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使自己镇静下来，但是不能集中注意力。日本会接受失败吗？他们该不会战斗至死以慰战死军人的灵魂吧？人人都说下一个新式炸弹将投掷在东京。

日本宪兵在虹口巡捕房拘留所外架起的巨大篝火堆里烧毁文件，也许是要毁掉他们实施恐怖政策的证据吧。西德尼来电告知他看到穿着平纹卡其制服的宪兵乘军用卡车离去，他们把所有的宪兵队标记都拿掉了。

1945年8月16日

上海人在静静地听着前一天日本天皇在东京发表的讲话。NHK(日本国家无线电广播台)宣布“天皇陛下”将“向日本人民宣读他的敕令”。在奏完《君之代》(日本国歌)后，天皇的“良好忠诚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了鹤(皇室的象征)声。旨谕十分明确——最高层承认日本战败。

上海所有的电台都重播了天皇讲话的录音，在我听来这篇讲话是用高音而单调的语言宣读的，接着播出正式的英语译文，与通

常急促和听不清楚的语言相反，英译语法正确，用词优美，我不知道敕令是否也用中文广播了。

姊姊和我听完新闻后激动地穿上我们最喜爱的镶着雅致花边的红衣服，来到霞飞路，大街上挤满了欣喜若狂、纵情欢闹的人们，陌生人之间相视而笑，握手拥抱，笑逐颜开。胜利属于盟国！上海光复了！

途中遇见格列布和他的朋友，他们讲述了一小时前他们目睹公开宣读天皇敕令的情景。一个骑在蒙古马上的军官厉声发出命令，日本军人匍伏在灼热的柏油路上纹丝不动，军官摊开一卷纸轴，用粗暴而不自然的声调朗读了敕令，他就像一个具有语言功能的木头人。

今晚，街灯大放光明，焰火噼啪作响，经历了多年恐怖和前途不明的日子后，上海人在庆祝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和平到来！

1945年9月2日

今天，在停泊于东京港湾外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外相重光和日本皇军总参谋长梅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美国国旗在美国使馆升起——这正是恶名昭彰的偷袭珍珠港的那天在美国国会顶上飘扬的同一面旗帜！

美军已进驻东京，日本市民在仔细阅读警方公布的有关对待美军的行为的指示。

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注：

① 瑞娜·克拉斯诺(Rena Krasno)，192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俄国犹太人家庭，毕业于震旦大学，现定居美国旧金山。其父戴维·拉宾诺维奇是著

名编辑,上海犹太人中有影响人物,见《亡命上海杂忆》注③。本文节译自克拉斯诺女士根据自己战时日记写成的著作《始终是陌生人: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译者保留了原注。

② 哈同是上海著名的犹太富商,下文详细介绍了他的情况。哈同花园系哈同化费巨资修建之庭园式宅邸,解放后拆毁,位于今上海展览中心之原址。

③ 此处即指前面几篇文章提及的来自波兰的米尔经学院师生,他们战时就在阿哈龙会堂内继续学习。

④ 指连接云南和缅甸的公路,战时远东盟军主要补给线之一。

⑤ 阿兹肯纳齐(东欧和俄国)犹太人中的犹太复国组织,此处指卡迪马组织在上海的分支。

⑥ 1941年4月,日苏签订中立条约,规定缔约一方卷入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苏联不再续订该条约表明将对日作战。

邓新裕、衍庆节译自瑞娜·克拉斯诺《始终是陌生人: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Rena Krasno: Strangers Always, A Jewish Family in Wartime Shanghai. Pacific View Press, Berkeley, 1992)

闯荡上海纪实

弗兰克·塞莱格^①
(Frank Theyleg)

一

中国人很快形成了对我们这批新“外国人”的看法，他们感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与以前他们所看到的外国人不同，后者均是成功者亦即富人，而我们则是失败者。他们知道犹太教是一种宗教，于是我们就被称作“犹太人”，后来还加上“瘪三”这样的称号。

我父亲开的店在法租界，生意不错，雇了一名会两种语言的年青中国人当助手，这样我便可以去找工作，并在虹口租了一间房间，独自居住。我当上了公共汽车公司夜班加润滑油的领班，公司是一个名叫埃费里(Avery)的英国人开的，他是上海万国商团的一名军官。我的工作是从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带领一群机械师为200多辆单双层公共汽车的柴油发动机加润滑油。万国商团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由英国人发起建立的，但所有在沪的外国人均参加，以保卫他们在上海的利益。主要由英国人担任军官，服装、装备、车辆全部是英国的，足以打一场小型战争^②。

后来埃费里回了老家，我失去了工作。我第一次与大家合住的场所是河滨大楼中的难民救济所，20个单身汉合住一间房间，有少数人(包括我本人)还得睡在铺了床垫的长凳上。几个月后，我找到了新的工作，在英国人开办的远东最大的一家公司中当工程师，报酬不错，和公司中的英国人享受同样待遇。老板是苏格兰人，与他80岁的母亲，一位原中国快船公司船长的遗孀住在大西

路上壮观的总裁公馆里，我在那里曾度过很多星期天，很欣赏那里的英国式家常小吃。我们设计并建造了一种用于英军在印度和澳大利亚作战的机械装置^③，这样我终于找到了参加反纳粹斗争的途径。我为此废寝忘食，日夜奋战，不久我们每月就能生产 100 套机械装置了，我也有机会坐飞机去香港，从那里再坐快班飞机去孟买，看看这套机械装置的性能如何。

1941年中，公共租界的英国高地师和美国海军陆战师撤走了，在外滩进行最后一次检阅时，在我边上有一位欧洲人边擦眼泪边对我说：“记住我的话，年青人，这是西方对中国影响的终结！”我们接到建议，把钱从中国人的银行里取出来，放入办公室里的保险箱，由我们自己的职员看管。不久，公司要求我加入第一批遣返者队伍，到澳大利亚去。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的工作对于战争来说太重要了，不能走。我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好几次这样的要求。

日本人发出了明显的危险信号，虹口到处是日本军人，日本哨兵守在外白渡桥口及其他通往虹口的入口处，进入虹口变得很困难。日本士兵也看守着码头，我们的机械装置就是从这些码头往外运的。我的英国朋友很清楚，战争就要来临了，问题仅仅是何时，在哪儿打。我们的生活还不错，我积蓄了约 1 万英镑存在公司的保险箱里，一辆公司的汽车归我使用，并且身负使命，任务压倒了我的一切。我从无线电中听到了欧洲的消息，我清楚地记得当大家听到英国打了一次胜仗时兴高彩烈的情景。英国朋友骄傲地解释说：“是雷达起了作用。”什么是雷达？当时谁也不清楚。

二

1941 年 12 月 7 日，我被枪声惊醒，“这是轰炸！”我的女朋友吓

得哭着说，她以前曾经历过一次。她怎么回家呢？我们爬上屋顶，看到日本人正轰炸停泊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英国和美国炮艇，看上去英国船正在往下沉。那位女孩子回家了，我翻出了我那印着卐图案打上了J字的老护照④，骑着自行车往办公室飞速而去。到处都是手持刺刀步枪的日本士兵，他们已占领了全部租界，包括英国的企业。日本士兵多次盘问我，刺刀直指我的胸膛。我小心地向他们解释我那本带卐字符号的护照，宣称自己是德国人，这办法还管用。

我终于到达挤满了士兵的办公室，寻找军衔最高的军官。幸运的是，他懂得一些英语，我努力向他解释那些肮脏的英国盗贼窃取了东西，他让我进去找。我奔向保险箱，箱门敞开，里面空空如也。他们是见什么要什么。我办公桌内尚有300英镑，我知道老板的办公桌里也有1000英镑，但怎么才能拿到它呢？我决定最好还是公开把它们取出，我获得了成功，然后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市区去看看我的老板和他母亲情况如何。在我的护照掩护之下，我到了那里，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日本人将美丽的餐厅变成了马厩，在其他房间安放了一个偷来的小便池，未接通下水道就照用不误。我发现我的朋友在仆人的房间里，我设法将他们的钱塞给他们，不久他们就被日本士兵赶走了。我希望他们能保有这点钱。此后我再也未见到他们，甚至也未听到他们的消息，只知道我的老板最后到了新西兰，他的母亲则死在集中营中。

自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后，战争已经使上海的经济接近瘫痪状态。一般地说，希特勒制造的难民生活于这个城市的经济之外，他们的生活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均与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联系，他们在虹口地区建立了一个小柏林或小维也纳，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屋、餐馆，甚至应召女郎。

中国货币一直在贬值，尽管它是银元，其大小和美元银币一样，甚至更精致些，1角金属币也同样如此。我们到上海时1美元兑换6元中国货币。我的工资为每月100英镑，可兑换2400元中国货币，而1元中国货币的购买力和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等，因此就购买力而言，等于我一个月赚2400美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积蓄。但现在我是彻底破产了。我不得不一件件地变卖我的衣服，最后搬进了联合难民营。

难民营的食品是最低限度的，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把美国的资助设法搞进来的。有人说是通过瑞士银行安排的，不管怎么样，所得配给大大低于生活必需，而且我们认为当地的食物如大白菜不能吃，并尽力保持犹太烹调，除猪肉不吃外，黄豆——中国饮食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也是禁食的。这样，难民的体重很快下降，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恶化，医疗只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到战争结束时，仅因此就夺去了20%—25%难民的生命。

就我自己而言，一到上海，我就尽量使自己“当地化”。我开始吃几乎所有的中国食品，并无不良反应。我向任何一个碰到的中国人求教所见的事物的中文叫法，去看中国电影，还学写中文字。我获得了成功。在电话里，人们以为我是中国人，我大体上已能看懂中文报纸。

三

接着发生了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我认识了一个中国街头小贩汪，他和别人一样在人行道上铺一块床单，上面放些弯了的铁钉之类的东西，其中有崭新的美国尼克尔逊牌的锉刀，这是一件真正的宝贝，摆在地摊上卖的是8英寸长的一种。在闲聊中，他请我去他办公室看看，那儿有整套锉刀的样本，他说，如我能替他卖出一批

锉刀，他会给我丰厚的回扣。我们穿巷走弄，最后到了一个装修得很好的会议室，整间屋子被一台比冰箱还要大一点的保险箱占去了大半地盘，箱子里面是塞得满满的金条，最上一层是一套保存得完好无损的尼克尔逊锉刀。他给了我一张锉刀存货清单，并答应在收到我的回音之前一直保留它们。我很快找到了一名买主，这个中国人想把它们买下作为一种投资。带着这个好消息，我回到了那位朋友那儿，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个主顾，他答应了我的要价，其中包括给我10%的佣金。他又加给我10%的佣金让我帮助他把所有东西装了两辆黄包车运去，同时还给了我一只大袋子用来装现钞。这样，在仅仅知道我的名字，而肯定既不知道我的住址也不清楚买主身份的情况下，他把价值超过3000美元的商品托付给了我，这些钱意味着一套漂亮的房子和我未来几年内的生活开支。带着我的宝贝东西，我来到了买主处，他检查之后，把这些东西搬进了住处。我们坐定以后，他给我沏上茶，拿出一本式样奇怪的中文本子，我认出那是支票簿，他仔细地签了支票并盖上他的红色印鉴。现在怎么办？我原指望得到现金，不管是仍旧通行的中国货币还是日军发行的临时通货都行。我以前从未处理过中国支票。但我还是相信了他并去银行兑现了这些钱，现在我手中的大口袋正好派上用场。带这么多的钱，坐着黄包车穿行在这贫困的被日军掠夺过的，没有法纪的大上海，实在是一种冒险，然而，我还是安全抵达了我的朋友汪的卧室。我将一切都给了他，包括我的600美元佣金，还有银行出示的证实支票金额与购买价钱的证明。我这样做是显示我的信用，而并不是我不要我该得的那部分。而且我与几个人同睡在一间房子里，根本无处保存值钱的东西。因此当汪提出为我提供保险箱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又一次成功了。

很快，汪和我成了朋友，我发现了他的真正身份：他实际上是一个技工协会的头头，那间会议室就是他们协会的总部，密藏的黄金显而易见是协会的财产。我不久就领教了这个人是多么神通广大。一天，我正在为他向一个日本买主推销一套崭新的德国造气焊机时，警察逮捕了我和汪，气焊机是汪从日本人那里偷来的，我们被关进了杨树浦警察局。几小时后我们就未受指控地被释放了，这是因为汪手下的人贿赂了警察局的头目。另一件更有趣的事是关于美国造高速钢钻的。这些钢钻确实不错，而且找到了一个现成的日本买主。但不久那个日本人大大抱怨了一番，他发现那些钢钻实际上都是日本仿制品，真正的美国造应该刻上“U·S·A·”，而非“Made-in-USA”。不过他也承认那些工具对他的店确实有用，这也就是他买它们的原因。而且那时仿制品也是非常希罕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因为供应来源短缺，1942年，我们做的相当赚钱的工具生意结束了。就在那时，我遇到了吴兴县一家小机器店的老板，他以前做过供应商。当时没有汽油与柴油供应，与日本人无关的企业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电力供应，我们设计了一种利用木炭或废物的煤气发生器来为卡车和小工厂提供动力的装置。日本人也要我们改造城里的公共汽车，但我们发现那不过是日本人想偷我们的技术，因而一口回绝。不久，我们被勒令停业，转而为日本军队生产手榴弹。不管以什么借口都推托不掉，我们只得这样做。后来我们发现另外还有许多厂也在造手榴弹，而且产品都没有标记，放在一起区分不出。这就给我们一个极好的破坏机会：让造出的手榴弹一颗也不会爆炸！这可以通过稍微缩小引线尺寸来实现。可是有一天，走进来一个警备队的人，他问最靠近的工人谁是老板，然后就一枪把老板打死了。我的“J”护照上的卍符号再次救了我的

命。在“巴格牙鲁”声中，我乘着混乱逃走了。不久，所有犹太难民不得不搬到位于虹口的一块约2平方英里的区域居住。我们被不体面地拘禁在这块犹太人隔离区，只不过没有人特别看管而已。

四

如果说以前生活是艰难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是面临绝境了。这一小块地方已经挤满了难民和中国人，大多数是全家挤在一起，屋子里堆满了借来的简单家具、烧饭器具及卫生设备等。难民营里人满为患，近100对夫妻挤在一间房子里，仅用一些毯子隔一隔，毫无个人隐私可言。大部分人的食物由营地的厨房供应，只维持最少的配给量，幸运一点的人可以买到额外食物，但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通货膨胀有时每月高达100%，我仅剩的一点财产，经过这样的蚕食，很快就所剩无几了。我那铺床单摆摊的朋友，刚好也住在这个难民区，他买卖停了后，那个协会也如同那些密藏的黄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日本人聪明得很，他们引进一种保甲制，邻里间24小时互相监视，日本人指定的难民组长竟然与“大东亚共荣圈”的狱卒们勾结起来，尽管那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变得重要了。管理当局被人格化为由合屋与大仓所代表的“好警察”与“坏警察”。据说合屋是个精神变态者，至少是个精神病的优秀模仿者。他负责签发长期或临时通行证。难民区入口处由保甲守卫，当班时戴着袖章，实际上也有一些假的袖章在流传，尽管它不是官方制作的，但也凭借着出入难民区。

我有过一次很能说明问题的个人经历。我在难民营操场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大的铸铁炉，有400磅重。当时废铁相当值钱，这个宝贝足可供我和必不可少的帮手过三个月的日子。我知道一个

买主，但他在城市的另一头，要想与他联系，非得有通行证不可。我似乎只有排上四个小时的队，然后才轮到走进合屋的办公室去请求这个大人物发慈悲。我的帮手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一张两个星期的通行证，但我却吃了一记耳光，打得我眼镜飞到屋子的另一头。“我知道你，”合屋咆哮道，“你是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快给我滚出去！”有人把眼镜递给了我，我赶紧走开了。第二天我又去了，这次我惴惴不安地向大仓申请，结果他给了我四个星期的通行证，说两个星期太短。我要离开时被合屋叫住了，但他只是说祝我找工作一切顺利。我们很快借来了铲子、锤子等东西，把我们的战利品砸碎成为可携带的小块，又借来了劳动车以把这些东西运到要走四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去，居住区边界哨兵看到两个找工作的人拖着一车废铁感到惊奇，幸好，可能是他对这一车货物的价值不清楚，也可能是因为通行证上有大仓和合屋的亲笔签名，使他不致刁难，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送完了货，收到了货款，拉着空车回去后，我们着实富了几天。但以后又怎样呢？老天知道。我们可能甚至不得不穿由红十字会分发的面粉袋改制成的衣服，上面还带着红十字会的标记，实际上很多难民就穿这样的衣服，其它好点的衣服都卖掉、当掉或穿破了。

五

日本人造的一座4层楼高的神秘建筑，就在我住的汇山难民营附近，引人注目的是那上面的尖塔，高射机枪就在那上面，我们很怕它，但比较起来，我们更怕B-29轰炸机，现在它每天来轰炸上海，而且常常是空袭在警报响之前。飞机的高度超出了高射机枪的射程，上海地下水位太高，防空洞太少，我们只能躲在屋子里祈祷上帝保佑。

一天，在《上海犹太早报》或类似的什么难民报纸上登出了一则招聘启事，要招聘工程师和设计师到那幢神秘的大楼里工作，并注明无须申请通行证。这消息看上去好极了。虽然我到得挺早，但已有一屋子的求职者了。我们每个人分到一样东西，要求画出该物体的技术图。我分到的是个完整的汽化器。大约过了一小时，我完成了作业，一个日本文职官员把我的东西收去，领我在另一间屋子外等候面试。几个小时过去了，到我等得实在觉得没有希望时，那人才来叫我进屋。桌子上放着一份好像是日本版的纳粹德国的臭名昭著的报纸《冲锋队员报》，“这是些什么人？”他以一口标准英语问我。我告诉他报纸上所说的那些坏人并不存在，他碰到的只不过是一屋子的德国犹太人，那份破报纸尽是一些胡说，即使你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你也不可能将他们与坏人想到一块去。“那希特勒为什么要把犹太人赶出来呢？”我把我的家庭背景告诉了他，说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荣获过奖章，他能够明白这些，因为在那次大战中日本和德国是敌对国。他还想知道我以前做过什么，我把我的过去统统告诉了他，当然那次蓄意报复的经历除外。最后，他告诉我，我被录用了，薪水看上去不错，更重要的是每天供应早中饭，外加每月一袋大米。那时我已经从过去的150镑重降到仅100镑重了，我没有考虑这是在为敌人工作，所想到的仅是这里有可供我生存所需要的食物。隔离区建立后，我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在法租界的生意，在虹口与我的继母及同父异母的妹妹过着清贫的生活。这份工作可能也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当时已经是1944年了，我们清楚日本人将被打败，种种迹象显示日本人情况已不妙了，每天的空袭根本没有战斗机的还击，在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里雇用我们这类人来工作也是一个明证。我很清楚，生存是最重要的。在剩下的这点时间里，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我们的设

付诸实践，不管他造什么样的产品。

第二天我就去报到了。3名犹太人难民工程师及中国技师协助我。穿过大厅还有更多的中国人，包括一位漂亮的小姐。除了在一个瓦盆里有用来取暖的燃烧着的木炭外，办公室空空如也。日本上司坐在隔壁房间里毫无主见，束手无策。一个着海军制服的人进来，友好地自我介绍说他叫“希罗”，英语是英雄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可能我给他的印象是个工头的模样，他告诉我绘画板和文件柜还没有到，他领我们到整幢大楼转了一圈。我们用了餐，一种像野草似的蔬菜，还有鱼和大米饭。日本人都是吃的这种饭，当然要比营地里的伙食好得多。我们参观了装备得极好的机器制造车间，现在闲置着。相当不错的汽车修理车间也空着，停车场上停着几辆缴获的英式双层公共汽车，几年前我的同事们曾为这些车子加过油。我有一种印象，不久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整个基地除了为日本官员提供避难所外无所事事。

参观完毕返回后，每天例行两次空袭中的第一次开始了。美国空军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为了提醒老百姓，它事先派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中划了一个大的“V”字，接着开始轰炸江湾空军基地及其他一些军事目标。我们楼顶上的防空机枪已被搬走，日本人知道它们够不着B-29轰炸机的高度。办公室的设备已经运到，都是崭新的，质量极好。希罗告诉我们，要设计的东西就在下去4层楼梯的大堂里，是一辆崭新的日本仿制的哈莱-大卫森式带斗摩托车。希罗要我们画出图纸。我告诉他这辆车子应该移到楼上办公室去，须要一张大台子以便摆放拆下来的零部件进行测量。我们每天坐在火炉边，一点不受干扰画设计图，按时吃早饭和午饭，我们在懒汉的天堂里，干活不必太紧张。

我们招来了许多人的羡慕和忌妒，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定量

配给的粮食先是减少继而就取消了，由于通货膨胀，工资变得毫无意义。我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那样可享受一顿有大米蔬菜和鱼的晚饭，我的体重维持在100磅，随着关于战争的好消息不断传来，生存下去变得可能了。在营地里，我们开始商量怎样庆祝胜利。

我们的设计没有一个付诸生产，什么也没有造出来。那些冒牌机械师什么也没有维修过，但他们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他们的中国同事，还有日本人，用他们中午装饭的桶偷汽油，然后送到一个中国人那里，那人有个55加仑的桶，装满后就去卖掉，收入平分。还把铜杆截成可藏在口袋里的小段后偷走。其它一些值钱的东西也这样消失了，最终甚至一辆双层巴士也变成碎片消失了，只剩下轮胎和其他一些太大不便于偷偷拿走的东西。

六

1945年7月，那致命的一天终于来到了。白天的空袭还是象往常一样，我们懒懒散散地下楼躲在一块锅炉钢板下面，由一个55加仑的油桶支撑着，那是我们的防空洞。这次炸弹似乎比以前落得更近，整幢大楼都摇晃了。空袭很快结束了，我们的《冲锋队员报》读者⑤把我喊上屋顶，指着在燃烧的一些地方说，那似乎是我家住的地方。我请了假步行回去。我经过一个户外市场，这地方被击中了，每个人都还保持着临死时的姿势。除了市场中央有一颗50磅重的“小常规炸弹”炸出的弹坑外，只有很少几处遭到损坏。70多个人被炸死了，尸体一动不动，就象蜡像馆里的展品。我一时分辨不出我父亲的房子在哪儿，整条巷子都是破砖碎瓦。我找到了父亲和家里其他人，他们占据了一张床垫，躲在难民营地（今高阳路）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他们似乎都还好，父亲在教别

人时臀部受了伤，已用绷带包扎了起来。再也没有其他的医护手段了，即使医院也不过如此。官方的数字是30个难民死于这次空袭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这次灾难呢？后来我从一名参加这次带来巨大灾难的空袭的飞行员处得知了情况。我甚至还看到了目标图，整个犹太人居住区同其他战俘营一样标着叉叉，注明“非袭击目标区”。这天多云，轰炸机由我们营地后面的一个无线电台指引路线。其中一架飞机投弹装置出了故障，大约有3颗50磅重的炸弹提前扔了下来。飞行人员根本不知道炸弹曾提前投下及造成的后果。这里我要特别强调：1)美国轰炸机投弹命中率极高，2)他们仔细侦察过所有民用建筑，尽管由于战争的需要而不得不将其中的一些如供水站等加以摧毁，3)他们对犹太居住区曾遭袭击毫无所知，尽管通常他们有优良的情报手段。

我们逐渐不再磨洋工了，因为不需要那样做了，除非要防备一小撮很容易认出来的战争狂（其中一个人声称他想到美国华盛顿去参加胜利大游行）。中国助手从某天起就再也没有露面，我们的日本监工，那位少校也是如此。有消息传来，广岛被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彻底摧毁，上海报纸报道，所有剩下来的东西都象“原子般的尘埃”。我们那里的日本人什么也没有说，可能除了广岛不再存在以外，他们对其他也一无所知。此后不久，日本人被命令在餐厅集合，回来以后他们眼中都含满了泪水，天皇告诉他们一切都完了。第二天，整幢大楼里的日本人都走了，中国人开始拆卸所有的东西，甚至拍卖能找得到买主的任何机器和工具，用金条成交。中国人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这看来是真的。居住区出入口再也没有哨兵站岗了，也没有保甲了，再也没有日军巡逻队了，再也没有合屋与大仓了。所有这些鬼子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中国人自发形成了一个团体，搜寻和处死日本人及其帮凶。

大多数都是从脖子后面开枪击毙的，身上再挂着标明他们所犯罪行的牌子。跑马场变成了即时审判的场所。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队先暂时维持秩序，但是不许携带弹药。

日本人投降那天，我在营地大门口升起了我们保存的美国国旗，每一侧还有两个大的“V”型胜利标志，但盟军士兵并没有到来。我所见到的第一个盟军士兵是坐在难民营酒吧台旁喝得醉醺醺的一个家伙。

美军在外滩南京路转角处的大饭店^⑥建立了临时总部。在饭店大堂里，我遇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们的日本少校，但现在他着美军制服，负责所有的平民事务，我去那儿是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想找点事情做，二是想为车库里的车子找点用途。车子主要是双层巴士和一些显然是用雪佛来改装的丰田军用2.5吨卡车。我的朋友使我相信这些车子根本派不上用处，因为美军装备精良。但我的工作却找到了，他把我介绍给一位战地工程师华金斯少校，我成了他的第一个上海平民雇员，月薪是令人难以相信的100美元，且现金支付，第二天早上我要在惠罗大楼向他报到，协助建立起他的工程办公室。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楼到大堂的，我简直是飘飘欲仙了。100美元是笔无法想象的巨款。我举家迁出难民营地，找到了一处住所，该处以前是日本人的住所，那位日本人正与他的同胞一道，不带任何财产，等待着尽快乘坐登陆艇或其他类似的船只遣返回国。

我的新工作比较简单：进行设计，寻找将现有的民用大楼转换成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方法。在寻找一个适当的遣返部队的场所时，我建议使用我们以前的“懒汉天堂”，但它已被新的“懒汉”们，蒋介石的部队占据了。华金斯少校认为我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这帮家伙撵走。我把少校带回办公室，然后脱下我那没官衔的制服，

身着便装又折回去，我很快就找到了那些“懒汉们”的头头，与他达成协议。我们可以使用 70% 的房屋，但要付租金，当然是给他，每月 200 美元。不久这笔交易结束了。我们仅使用了几个月，我们的“房东”和他的队伍开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为我们省了不少“租金”，而且只要需要，整幢大楼我们想用多久便可用多久。

靠我的工资，我们生活得相当不错，有时我和父亲还抽抽香烟，继母每月替我存 70 美元。一年以后，美军在上海已没有什么项目了，我被派往美军在北京的空军基地任工程师，该基地将为马歇尔将军的和平使命而重新启用⑦。

注：

① 作者于 1939 年随全家从德国避难来到上海，至 1947 年移居美国。本文节译自作者的回忆录，略去作者离德来沪及在沪初期的叙述，着重选择了作者在上海 9 年闯荡谋生的曲折经历。

② 有关上海万国商团的情况，可参见《一个俄国犹太人在上海》一文。

③ 当时德军并没有打到印度和澳大利亚，英国与日本之间尚未开战，这些装备可能是英军在印澳两地备战所需。

④ 纳粹当局在德国犹太人的护照上均打上了表示犹太人的“J”。

⑤ 指前面提到的那位录用作者的日本官员。

⑥ 即今和平饭店

⑦ 指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

王寅通节译自弗兰克·塞莱格的个人回忆录《我的一生》(Frank Theyleg: The History of My Life)

难忘的岁月

莉莉·芬克尔斯坦^①
(Lilli Finkelstein)

一、初到上海

我们怀着希望来到了上海。我们带着些钱，弗里茨还有一些商业上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些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船在上海港停泊后，犹太社团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到船上，他们把上海的局势说得十分可怕，以至我是哭着走上岸的。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河滨大楼，这是一幢位于苏州河畔的雄伟的7层住宅大楼，是有钱的沙逊爵士的财产之一，他把其中的一些房子借给从欧洲来的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我们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就在那儿过了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弗里茨和B先生就出去寻找房子，卡尔和我则呆在住处。傍晚，弗里茨和B先生回来了，说他们找到了一套合适的房子。次日上午，我们便搬到了位于虹口舟山路上的那套房子里。

当时找一套住房并不很困难。淞沪抗战时，虹口区内曾发生过几次战斗，不少房子被破坏了。人们（主要是俄国人和中国人）只要化一点钱，就能买下这些部分损坏的房子，修复一下即可出租。我们的房东是1917年十月革命时逃出来的白俄。我们就在这样的房子中住了下来。

供电线路已经修复了，但只能供照明用，我们只好在一只煤油炉上做饭，自来水是从底层的一个公用水笼头里打来的。最艰难

的问题是没有卫生设备。我们不得不使用马桶——把它放在走道上，与别家的马桶一个挨着一个。每天清晨4点，中国工人把这些马桶里的东西倒在停放于外面街上的粪车中，工人们的谈话声，刷马桶的铿铿声就把我们吵醒了。粪车装满后便开到上海郊外乡下去肥田。人们告诉我们说不要吃生的蔬菜，令人不放心的栽培技术可能传染霍乱。每年，我们都必须注射抗伤寒、副伤寒和霍乱的预防针。

我很快就学会了去附近街道的菜场买食品。小贩们说着洋泾浜英语，我能很好地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友好、乐于助人，并颇为自豪地为我服务。他们不常看到许多白人妇女出来买东西，他们至今看到的所有白种人都是有钱人。

富有的犹太人社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尽可能地向穷苦犹太人提供援助：住房、食品、药品和医生。

有一次，我们得了猩红热传染病，这是由一艘难民船带进来的，在我们中间很快就传染了开来。沙逊爵士拿出他的一幢房产改作医院，他雇用弗里茨操办，配备了医生和护士。

到达上海的难民往往两手空空，他们不会说商业语言——英语，更不用说汉语了，因而很难找到工作。为了不让任何一个欧洲人被迫上街乞讨，沙逊爵士建立了一个难民居住楼。把这幢大楼中的大房间用帘子隔成一个个小间，一户户人家就被安置在这样的一间间小屋中。尽管条件很简陋，但他们至少有了固定的住处。救济所供应富有营养的膳食。B先生在一个专门照应难民的办事处里找到了一份工作。9个月后，弗里茨在一家进口美国汽车的美国分公司中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了这份报酬丰厚、用美元支付的工作后，我们便能够离开原来那处陋室了。我们搬到了一所有4间正房并带独用厨房与卫生间的公寓中。

二、龙 华 塔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与几个朋友一起到有着近 2000 年历史的著名的龙华寺和龙华塔去作了一次远游。我十分喜欢那些美丽的瓷瓦，它们似乎在诉说着佛祖的生涯。寺内有一间大厅，里面有几百个菩萨和罗汉的镀金塑像。正如在这种环境中经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我观赏着，赞叹着，渐渐把我的朋友们甩在了后面，一个人漫步到了龙华塔的门口。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头，在出售着供佛的香烛。我看了看他，他便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内心的忧虑。我说：“是的，我兄弟远在已被纳粹德国占领了的法国，我听不到有关他的消息，他可能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我不知道这个老头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但他说：“买根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吧，菩萨会保佑的，菩萨会保佑一切。”我按照他的话去做了。

我不知道这根香烛或是菩萨是否保佑了我。不过，战争结束后，美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找到了我兄弟。他又重操旧业，现在是维也纳一个很成功的古董商。

三、嘉道理学校

上海只有一所犹太学校，它不够大，因此无法接收新到来的犹太家庭子女。嘉道理先生^②自己掏钱创办了一所专门接收犹太难民子弟的学校，由一位从柏林来的女校长管理。起初，她请了一些英国教师，但他们后来进了战俘营^③。最后，大部分教师都来自我们自己的社团，他们努力工作，所有的孩子都极其喜欢这所学校。学校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操场，用于体育活动。教室成“U”字形围绕着操场，后面是大礼堂。每星期五晚上，学生们都去那儿做

安息日祈祷^④，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家长也都喜欢参加。我记得经常看见嘉道理先生坐在学生中间，和他们一起唱诗祈祷。

学生们组成一个戏剧小组，不时在大礼堂中举行小型戏剧、音乐演出。

我们很幸运，因为学校开办的时候，卡尔正好 5 岁半。就在我第一次送他去学校的前一天晚上，一阵可怕的响声惊醒了我们。我们跑到了街上，所有的邻居也都在那儿，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我们才知道是日本人空袭了停泊在上海港口内的美国和英国船只。那天是 12 月 8 日，正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晚上。

四、日军占领上海

我们看见许多日本兵行进在上海的大街上，我们的生活也立即受到了影响。弗里茨失去了工作，他所在的美公司被日本人关闭了。但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会仍继续给我们的社团寄美元。日本人考虑到有一天美犹救济会可能会查询钱款是否收到，因此也就没有怎么打扰我们。

几个月后^⑤，日本人命令难民迁往上海最肮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虹口。它位于码头后面，有一所大监狱和许多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附近几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间。我把那间房子好好打扫了一下，终于很满意我们能够太太平平地住在里面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居留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失去了自由。嘉道理学校离这里只有两条马路。孩子们和教师们被允许到学校中去。每天早上，我把卡尔带到马路口，看着他走进学校。生活变得十分单调，我们仅仅希求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但我们生活在朋友中间，他们也处于同样

的困境。我们从未丧失希望，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在新居住下来后，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二个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

德国大使馆宣布我们的护照不再有效，我们不得不去日本当局那里领取身份证。在上海市中心工作或有重要生意需要经营的人必须申请特别通行证，以便白天能离开这个特别居留地。申请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不得不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许多人辞去了工作或放弃了自己生意，他们不能忍受日本办事员的敲诈。弗里茨也辞去了他后来找到的工作，差不多整天呆在家里。有钱的犹太人社团竭尽全力提供帮助，因此没有人挨饿，我们也没有大难就要临头的感觉。日本人不准许我们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但俄国电台例外，因为日俄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我们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国际形势。

一天，日本人强迫我们和许多其他犹太人家庭一起集中到一块空地上，处在枪口的监视之下。同时，他们搜查了我们的住处，他们没有说要搜什么东西，但从我们家的照相册中拿走了一张照片。

卡尔每天按时去上学。他做完作业后，我们就出去散步。我们是被禁止进入美丽的汇山公园（今霍山公园）的，但我们发现了一条两旁都有大树的优美街道，便经常去那儿呼吸新鲜空气。卡尔在那儿与他的朋友们一起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则喜欢聚在一起聊天。

五、战争结束

我们终于得知欧战结束，希特勒被打败了。但日军仍是强大

而有实力的，并没有投降。他们在街上挖起了战壕，企图继续顽抗。美国人现在想结束战争了，发动了远东战役。他们猛烈地轰炸上海，许多中国人逃到乡下，我们不能离开居留地，只能希望那些炸弹不要落到我们头上。

7月17日，我们遭到了一次可怕的空袭。卡尔像平常一样在上学。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炸弹掉下来的声音，并看见远处起了火。爆炸声和火光是从嘉道理学校那个方向传来的。卡尔和所有的孩子们都在那儿，他们可能已中了弹！弗里茨通过电话与校方联系，后者告诉他中弹的是一所日本人学校，而我们的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他们很安全，并得到很好的照料。后来我们得知，嘉道理学校对面的那所日本人学校确实中了弹，因为它已作无线电台之用了。其时日本小孩也都在家中。

傍晚，卡尔回来了。他告诉我，他看见许多大人和小孩的尸体躺在大街上，犹太人中有些人也给炸死了，许多房子被炸坏。从那时以后，学校就为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8月，一颗可怕的原子弹在广岛落下，造成了极为悲惨的后果，但它却迅速地结束了战争。我们又获得了自由。

成群成队的人们涌上了街头。我们向黄浦江畔走去，走进了久违4年的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外滩一带宏伟的建筑，以及其他所有的漂亮房屋了——我们很可能会再次搬到其中的一幢居住。卡尔、我和我的那些女朋友们走在欢乐的人群之中，巨大的庆功牌楼树立在几乎每一条街道的街口，每幢建筑上都彩旗飘扬。我紧紧地拽着一位朋友的臂膀问她：“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彩旗飘扬？”她说：“当然是因为战争结束了。”我说：“不！今天是8月16日，我的生日！”

六、战后的上海生活

战争结束了，但我们在上海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我们又在那儿呆了4年多。弗里茨很快在美国空军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又得到了用美元支付的丰厚薪金，我们的生活又重新变得充实了。嘉道理学校重新开了学，卡尔又上学了。我们打算尽可能快地到美国去。美国领事馆相当迅速地办好了手续。出生于德国，与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的B先生很快就得到了签证，马上就要去美国了。失去他，对我们说来是个打击。他是位忠实的朋友，是我们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的好帮手。我们全家都站在码头上看着他远去。他去了纽约，在那儿他有一个富裕的家庭。我们希望能很快地像他那样离去，但事实上却没有。

B先生走后，我们租下了一套比以前更为舒适和干净的住房，它离汇山公园不远。弗里茨继续在美国空军中供职，但很快中国政府就不再允许用美元支付他的工资了，他只能拿到不断贬值的中国货币。市场上的物价日涨夜增。中国政府要老百姓把他们的黄金储蓄拿到银行中去换钞票。政府许诺要稳定通货，使食品和其它商品的价格不再上涨，这被称为限制物价。有一天，弗里茨和我路过外滩，看见许多人，有些人甚至穿得很寒酸，在各大银行的门口排着长队兑换黄金。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市场买东西，使我吃惊的是没有一家商店开门。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只有几个人还呆在店里，无所事事。其中有一个人走到我跟前，因为我是这里的熟客，他便与我攀谈，并问我想要干什么。我说想买些东西，他便问道：“有钱吗？”我说“有”，从钱包里掏出一些钞票给他看。他说：“这不是钱，而是不值钱的废纸。”最后，他向我指了指后门，我走了进去。他把

我想要买的东西卖给了我，但价钱要比我那些钞票的面值高得多。他用一张纸把我买好的东西盖了起来，要求我别告诉别人。最后政府不得不放弃了限制物价的措施，通货膨胀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丈夫拿回家的工资再也不能养活我们一家。我们知道，是该离开上海了，我们等待着到美国去的签证。

.....

奥地利政府当时在上海也开设了领事馆，我们重新获得了奥地利护照。领馆人员劝我们赶快离开上海，中国内战已经临近。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了去那不勒斯的船，再从那儿去维也纳。我们决定听从他们的忠告。1949年1月21日，我们登上了轮船。这是一个寒冷和刮风的日子。天空是灰色的。我们最后一次看了看外滩和那一排大楼。当船开动时，卡尔和我都大声哭了起来。我们又向外滩的大楼楼影看了一眼，船渐渐地远去……。

注：

① 作者全家于1938年逃离奥地利，1939年初辗转来到上海。文中提到的弗里茨是作者的丈夫，卡尔是作者的儿子。下文出现的B先生是作者家的密友。

② 此处指霍瑞斯·嘉道理。

③ 指珍珠港事件后，英国公民被日军作为“敌侨”关押。

④ 犹太人每周过一次安息日，自星期五日落开始，到星期六日落结束。

⑤ 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12月8日，而日本当局发布命令建立犹太隔离区是在1943年2月，其间相隔约1年多，作者这里说“几个月后”不准确。

张家哲节译自莉莉·芬克尔斯坦所写《我的四十年生涯》(Lilli Finkelstein: Four Decades of My Life)

